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空军实录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中国空军实录

这是一部以我国空军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向读者介绍了中国空军与人发共和国一起成长，从弱到强的光辉历程。一场场生死搏杀的激战；一位位血染碧空的烈士；中共最高当局的决定；高中神话的破灭；第一枚原子弹的空投……中国空军，已创造了击落敌机 1474 架，击伤敌机 2344 架的辉煌战绩，以第一批装备部队的米格—15 到今日歼—7、歼 8 及其他先进战机。本书将为你破解多少谜团，拉直多少问号，将使你徜徉于苍穹，流边于历史，给你亢奋，引你思索。特别是寓战机知识于生动的情节中，不仅会唤起青少年朋友对蓝天的向往，也是研究空军历史的参考材料。

序 言

在很久以前，中华民族就开始做起了自己的航空梦。

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时代，鲁国的鲁班曾研究制作过能飞的鸟；楚汉相争时期，就把风筝运用于军事斗争之中。汉代的张衡曾经制造了一种会飞的“大鸟”，能在空中飞行数里之遥，东晋时代的葛洪把鸟的飞行原理详细记载于他的《抱朴子》书中。遗憾的是，创造了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迟迟没能摆脱封建社会的羁绊，工业文明从中国人身边擦身而过，将我们祖先征服蓝天之梦留给了后人，留给了外国人。

当比张衡晚出世一千七百多年的美国莱特兄弟把木制滑翔机送上天空后，工业革命后的西方便迅速把人类的航空梦变成了现实。

自从世界上第一架载人动力飞机问世不久，欧美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竞相研制飞机，并将其用于军事。这时飞机的主要用途仅仅是用来侦察敌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法、英、俄、德、意等国在陆军中组建了飞机连、航空营或航空队，用来执行侦察和校正炮兵射击的任务。1911年10月23日，意大利的皮亚扎上尉驾驶一架“布莱里奥”式飞机对土耳其阵地进行侦察时，投下了几枚炸弹，于是飞机成了军事争夺的制高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成为更多国家的作战兵器，一些国家逐步建立了侦察、轰炸、歼击、攻击等不同机种的航空兵，编有中队、大队和联队（师）等作战建制。各交战国投入大量飞机，使战争由陆上、海上扩展到空中，形成了立体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空军飞速发展，交战国双方建立了庞大的歼击、强击、战术轰炸、战略轰炸等航空兵。有的国家组成若干个航空队或空军集团军，组织过相当规模的空中战役，协同陆、海军进行激烈的攻防作战。战争实践证明，空军既是强大的空袭力量，又是有效的防空力量；既能消灭战场上的敌人，又能突击敌后战略目标，直接破坏其战争潜力。空军不仅能协同其他军种作战，而且可独立执行战略、战役任务。空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

中国，这个最早产生航空梦的民族，虽然制造飞机还是近些年的事，但是使用飞机打仗的历史却并不落后。自清朝晚期起，历届政府和地方军阀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惜重金购买军用飞机，因此中国也成了建立航空部队较早的国家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后，武昌、上海都督府分别成立了航空队。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南苑创立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

1920年以后，东北三省和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省的军阀陆续组建了航空部队。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设立航空署，1931年在杭州览桥创办中央航空学校，而后逐步收编各省军阀的航空部队，建立了统一的空军。

蒋介石拥有了飞机以后，除了在抗战初期用飞机同日本人交过火以外，国民党空军被蒋介石驱至国内战场，刘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军队进行轰炸扫射，成了为反动派服务的工具。

代表着中华民族未来的红军战士们，不仅要同围追堵截的敌人进行浴血奋战，而且还时常遭到空中飞机的侦察轰炸，此时，他们多么想拥有自己的飞机呀！

所以，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是富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梦寐以求的事情。早在20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中央就

多次选调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航校和赴苏联学习航空技术。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的一批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迅速做出了建立人民空军的英明决策。

四十多年来，人民空军先后在抗美援朝、国土防空、解放沿海岛屿等作战中，敢打善战，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 3818 架的辉煌战绩，戳穿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首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战例……

为了帮助广大青少年以及关心国防建设的人们了解人民空军（包括海军航空兵）成长壮大的历史，我们组织编写了《中国空军实录》一书。由于受到篇幅和水平的限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教。

作者
1994 年 8 月

中国空军实录

第一章 红军首架战机——国民党“送”上门的礼物

天上掉下一个大怪物，晃晃悠悠地降落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列宁号”升主参战，旗开得胜
中国工农红军的蓝色梦想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从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诞生了。

蒋介石的大屠杀，不仅没有将共产党斩尽杀绝，反而手出了一支武装起来的工农队伍。就是这支队伍让蒋介石寝食不安、坐卧不宁，他不仅四处派兵围剿，而且动用了当时为数不多的飞机进行侦察、袭击、轰炸，妄图将中国工农红军扼杀在摇篮之中。

用小米加步枪同拥有先进装备的国民党作战的红军战士，望着敌人的大炮、飞机，他们多么想有一天红军也能拥有自己的飞机，同敌人展开空中搏斗。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到来的是这样突然。

1930年3月16日中午，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陈家河。

一位担任警戒任务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赤卫队员，突然看到一团阴影掠过山顶，仔细往天空一看，发现一架国民党的飞机，像醉汉一样在山谷中盘旋。一圈、两圈，飞机越飞越低，眼看就要同山峰接吻……

突然，飞机向上一跃，打了一个转弯，沿着竹竿河的河滩自北向南飞行。飞机离地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接着是一声巨响，飞机在河滩上滑出几十米远后稳稳当地停了下来。

河南罗山县第一区第十乡赤卫队大队长陈国清在派人向上级报告的同时，立即带领赤卫队员冲向飞机的降落点，迅速将飞机控制起来。

机舱里的驾驶员也自然成了赤卫队的俘虏。

“天上掉下一个大怪物，就在河滩边上。”消息很快在当地老百姓中流传开来。

前来观看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当人们看到机尾上那枚国民党党徽时，才明白那不是天上掉下的怪物，而是蒋介石用来对付工农红军的飞机。

第三天傍晚，一群身着长袍，头戴礼帽，举着“汉阳造”的人，悄悄地向河滩停放飞机的地方围拢过来。他们是当地国民党民团，想乘机把飞机抢走。抢不走也要将其彻底破坏掉，决不能让它落到红军的手里。

罗山县地方武装营营长郑猛子带领三十多名红军及时赶到，同国民党民团展开了一场以争夺飞机为目的的厮杀。国民党民团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走了。

中央鄂豫皖边特委和特区工农民主政府接到陈家河赤卫队缴获一架敌机并生俘飞机驾驶员的报告后，立即命令驻扎在陈家河附近的红军和陈家河苏维埃政府，不但要保护好飞机和飞行员，而且立即将飞机运送到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集（现河南省新县）。于是，当地的红军和赤卫队员，将飞机大卸八块，用马车装，用驴驮、用人扛，翻山越岭、披星戴月，四千多人忙碌了半个月，才将这个“怪物”运到新集。

听说红军有了自己的飞机，偏僻的新集立即沸腾起来。人们纷纷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亲眼看一看这个空中“庞然大物”。

“这家伙不吃草，也不吃饭，专门喝一种带有怪味的水，只要喝了那个东西，它就能煽动翅膀飞上蓝天。”一个留着长长胡须的老人，在向乡亲们介绍着。

“听说，当它在天上飞行时，就像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一样，地上的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是吗？”一个好奇的小伙子问道。

“不然，它‘下蛋，为什么下得那么准呢？！’”

“这下，我们红军有了飞机，也到南京蒋介石的头上下上一串黑炸弹……”年轻人的一席话，把在场的人全都逗乐了。

鄂豫皖边区军委负责人徐向前得知飞机运到新集后，心头一阵狂喜，特意跑到飞机前上上下下端详了好一会儿，然后又仁立在机翼前，望着国民党党徽思索了好一阵子。此时，他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把飞行员教育过来，我们红军不是就有了自己的飞机了吗？

回到军委指挥部后，他立即派入找来被俘的飞行员。

这个飞行员叫龙文光，是国民党航空署驻汉口第四侦察机大队飞行员。那天他驾驶着美制柯塞式轻型侦察轰炸机执行任务，因大雾迷失方向，汽油耗尽，被迫降落在沙滩上。

他来了，看见院门口有两个持枪的警卫，心猛然战栗回来：“完了，这一定是最后的审讯，共产共妻的红军，是不会饶过我的。”

他战战兢兢地走进指挥部。一位小红军将一碗冒着热气的茶水摆到他的面前，他那颗悬着的心才稍微平静了些。

“你叫什么名字？”这是一个和蔼的声音。

“尤文光。”他仍然低着头。

“在哪个部队供职？”

“航空署第四侦察机大队。”

“怎么飞到苏区来了？”和蔼的声音中包含着关切之意。

“那天，从汉口飞往开封执行任务，返航时，因为雾大迷失了方向，汽油耗尽了，只能迫降……”尤文光悄悄地抬头看了看眼前这位共产党的大官：他瘦高的个子，身着灰白色的军装，微笑着给人一种安全感。

这场谈话像拉家常一样轻松自如，特别是当尤文光得知和自己亲切交谈的那位和蔼可亲的“大官”，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第一期优秀毕业生、蒋介石曾经悬赏10万大洋购买其首级的徐向前时，更是激动不已。

他不敢相信眼前这和谐的一幕，但又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于是，在他的心目中，国民党关于共产党的种种欺骗宣传，被事实一扫而光。共产党和红军的吸引力逐渐增强。

经过一个昼夜的思考，龙文光最后作了果断而明智的选择。

飞机有了，飞行员也有了。红军的飞机上天有希望了。

龙文光找来了帮手，把拆散的飞机重新组装起来，并在机身上涂上一层银灰色的油漆。飞机尾巴上那枚国民党党徽不见了，取代它的是两颗醒目的红五星。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就这样诞生了。

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以表示对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深深敬意。

不久，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航空局，任命飞行员龙文光兼任航空局局长，任命曾经在莫斯科航空学校学习过的钱钧同志为航

空局政治委员。

航空局设在新集北侧的普济寺院内，并在普济寺院外修建了一个占地一百多亩的飞机场，同时还在黄安（现红安）与麻城交界的紫云区和皖西的金家寨修建了机场。

机场修好了，但是到哪能弄到汽油呢？此时的苏区，正被国民党部队包围着，连点灯的煤油都没有，更不要说开飞机用的汽油了。凑巧，国民党 34 师师长岳维峻在一次战役中被红军俘获，他的女婿是个大商人，并时常来苏区探望其岳父。红军抓住这个机会，从这位大商人手里买到三千多公升汽油。

7 月初，红四军政委陈昌浩要去英山执行任务，准备搭乘飞机去金家寨。飞机起飞的那天早晨，密集的人群拥挤在新集机场附近。随着隆隆的马达声，“列宁号”呼啸着飞上天空，人们用草帽和双手祝贺红军第一架飞机首航成功。

从新集到主家寨航程约 200 公里，飞机一会儿就飞到目的地地上空，由于新修的金家寨机场雨后遍地泥泞，飞机无法降落，“列宁号”改变航向，飞往固始。

固始县城里的敌人听到飞机的马达声，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飞机，部仁立街头观望，当他们看到飞机上的红五星时，吓得纷纷逃命。接着，“列宁号”又飞向潢川、光山进行侦察和投撒传单。敌人发现是红军的飞机，都龟缩到掩体内，不敢露头。

1931 年 9 月 8 日，“列宁号”又从新集机场起飞，远征华中地区敌人的心脏——武汉，进行侦察和示威。飞机飞抵京汉铁路南段和武汉郊区上空，投撒了大量传单后安全返航。

“列宁号”的这一举动，使武汉三镇的国民党政府惊恐万状，迫使一些重要的军事要地实行灯火管制，惟恐成为红军飞机轰炸的目标。

武汉政府的《扫荡报》惊呼：共军飞机近日连续骚扰潢川、汉口等地，我方幸无死伤，现有关军方已通令各地严加防范。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东七里坪宣布成立，旋即挥师南下攻打黄安县城。黄安守敌 69 师赵冠英部一万多人，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固守待援。我军围困黄安一个多月，打退了敌人多次增援，但县城仍然久攻不下。

红四方面军军部决定用“列宁号”进行轰炸、掩护，配合地面红军攻打黄安。

没有炸弹就用迫击炮炮弹代替。

轰炸黄安县城的前一天，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与飞行员尤文光一起到黄安城南高地上观察敌军阵地。确定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和轰炸目标。

第二天拂晓，红军开始发起攻击，敌军仍在顽抗。上午 9 时，从东北方向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了一个移动的黑点，渐渐逼近黄安县城。

黄安守敌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飞机，毫无戒备。当“列宁号”俯冲下来，朝着敌人阵地投下一枚枚炸弹后，敌人如梦初醒，可是此时躲避已经来不及了，爆炸声中，我红军发起总攻，赵冠英率部弃城南逃，红军乘胜追击，在长岭全歼敌军一万余人，活捉了国民党第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

“列宁号”飞机创造了成功地配合地面部队总攻的光辉战绩。

1932 年 7 月，蒋介石又调集 50 万大军，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

大“围剿”，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红军被迫放弃大片革命根据地，进行区域性战略转移，由于部队频繁地转移和飞机缺乏零配件，刚刚在战斗中显示出威力的“列宁号”，无法适应游击作战。“列宁号”在根据地群众的精心爱护下，将其拆卸开来，随红军转移了几个地方，终因战斗频繁，环境日益恶化，红军战士不得不含泪将它埋藏在大别山区一个偏僻的山沟里。

第一任红军航空局长兼飞行员龙文光也在赴武汉途中被敌人杀害。

“列宁号”消失了，红军的航空局也随之解体了。

中国工农红军的蓝色梦想，在经历了一个小小的辉煌之后，便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国民党军队占领鄂豫皖根据地大部分地区，他们千方百计想找到那架红军的飞机。在根据地群众的保护下，他们连飞机影子也没找到。直到 1951 年 9 月，王树声同志率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来到大别山时，群众才将“列宁号”的部件从山沟里挖出来，献给国家。

当年的老红军望着锈迹斑斑的飞机残体，感慨万端此时，人民空军已经建立，然而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和她在艰苦岁月创建的光辉业绩，仍然在激励着人们发奋图强，攀登飞机事业的高峰。

第二章 军阀航空队中的共产党学员

周恩来：陈云办了件大好事，借鸡下蛋，培育空军的种子
奇特的招飞

转战沙场的营团指挥员心甘情愿地受连排长指挥
一群面对漂亮小姐不动情的“木头人”
为搭救我被囚的飞行骨干周恩来夫妇精心斡旋

1937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任驻新疆代表陈云利用我党与当时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督办盛世才在新疆地区建立的统战关系，将西路军失败后的余部四百余名红军指战员援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利用盛世才的军营以及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装备和教员，学习特种军事技术，其中学习航空飞行是陈云所走的一步妙棋。

盛世才原是南京政府参谋本部的一个作战科长，强烈的权力欲使他来到新疆。不久迪化发生政变，他便登上了新疆督办的宝座。

他深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会得到委员长的信任和重用。于是他目光投向了与新疆接壤的苏联。为了骗取苏联的信任，他还提出了“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这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区别。正因为如此，西路军才敢在迪化安营扎寨。

1937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陈云把“新兵营”（在盛世才军队中学习的西路军指战员）干部队的支部书记吕黎平叫到身边。

“你对今后工作有什么考虑呀？”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

“我要求到抗日前线去。”吕黎平回答得非常干脆。

“把你留在新疆学习飞行怎么样？”

“学飞行，这可能吗？”

“有可能！盛世才的航空队现有6架初级教练机，9架侦察轰炸机。他们已经办过两期飞行班，一期机械班，教官是苏联人。明年要开办第三期飞行班。”陈云胸有成竹，越说越兴奋。

“我们的同志文化都不高，学飞行成吗？”吕黎平虽然很高兴，但又担心自己难以胜任。

“我们在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吃了国民党空军多少苦头呀！许多英勇善战的同志，没有倒在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中。你知道王稼祥、叶剑英、贺子珍挨炸受伤的情景吧！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用飞机对我们华北地区狂轰滥炸，制造了许多惨无人道的血案。如果我们有了空军，就能从空中打击敌人，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空军是很复杂的军种，要建设自己的空军，必须及早培养人才，因为培养一名飞机驾驶员比培养一个炮兵难得多。”陈云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学习飞行的重大意义。“你才20岁，身体又好，有一定的语文基础，集中一段时间补习一下数理知识就可以解决。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就这样，陈云经过一个多月的摸底、奔波，在西路军中物色了30名年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干部，准备进盛世才的航空队学习。

后来周恩来在谈到此事时曾多次说过：陈云办了一件大好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

1937年11月27日，陈云乘苏联飞机离开迪化，飞抵延安。飞机一阵落，

他立即赶到城关向毛泽东汇报了选派人员学习航空飞行的设想，不久，中央批准了陈云的计划，决定从延安抗大和摩托学校抽调一批优秀干部赴迪化学习航空。

一场特殊的招飞在延安这个红色根据地展开了。

古朴的窑洞里，人群鼎沸，川流不息。

这里正在进行验收飞行员的身体检查。远涉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的马海德医生，身穿白大褂，颈挎听诊器，是这次飞行员体检的“主检官”。

测量身高用的是竹竿；检查视力用的是报纸；检查听力就像小孩子在玩捉迷藏……

检查平衡机能的时候，考官让被检查的人不停地在地上画圈儿，然后又突然让他停住，并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判断出东西南北……

文化考核更是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一张粗糙的草纸，随便写上几个字，只要能认上几个，能流利回答出几个不同的问题，主考官就会在体检表中文化程度栏目中填上“初中”二字。因为，盛世才要求参加飞行班的学员必须具有初中文化水平。

原始的简陋的手段，更加表明了共产党人对自己空军的渴望！

1938年3月3日，飞行训练班开学了。众多的学员中，有西路军派来的25人，延安来的19人，我军学员共44人。

从入学的那一天起，我党选送的那些经过长征、转战沙场的连、营、团级干部，竟然佩带上了士官军阶，由指挥员变成一个受人指挥的军士，过着处处受约束的士兵生活。他们没有任何怨言，有的只是那个蔚蓝色的梦。

这还不算，困难还在后头。

第一节课是《机械物理学》。

教室的门开了，教官王应其高做地走了进来。肩膀上扛着少校军衔，用冷冰冰的目光扫视着这些土里土气的学员，嘴角掠过一丝淡淡的冷笑。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机械物理学》，诸位都是初高中毕业，我想请同学回答一下什么叫物理三变态？”冷不丁的几句话，把学员们弄懵了。

过了半天，也没人举手……

方华、陈熙、吕黎平……

王教官把我党派的学员叫起了一大串，可没有一人能回答得出来。

是的，如果说是端日本鬼子碉堡或者开荒种地，难不住这些人，但是让这些没有机会进过学堂的汉子回答类似“物理三变态”的问题，一时还真能把他们难住。

“这课我没法上，花名册上都是初中、高中毕业，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还想学开飞机？没门！”王教官发了一通脾气后，挟着讲义扬长而去。

面临文化基础课这一难题，这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们，开始了一个新的征程。

教室成了攻破理论难点的“战场”，许多同志常常通宵达旦，学而不倦。

“奇怪，前两期学员自习时总是迟到早退，经常要从教室外面往教室里撵。现在反过来了，每天晚上都泡在教室里不走，不赶，他们就是不出来！”很快，理论教官的态度有了改变，钦佩这批共产党人的顽强求知精神。

他们苦学、巧学，连长征路上起鼓动作用的快板书都用上了。

一个脑袋两把刀（机头上的两叶螺旋桨），四个翅膀往上翘（四个机翼

有上反角度），三条铁腿踏飞轮（三个起落架），横竖尾巴在后梢（水平安定面和垂直安定面）。

一个令人头痛的《飞机构造原理》，就这样在快板书中变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

实际操作考试。

教官指着一架开车时冒着一缕缕黑烟、发动机转速却上不去的飞机说：“为什么冒黑烟？原因在哪里？”

盛世才部队的学员没有一个能回答上来。

“这是发动机汽缸被划伤引起的！”我党学员汪新民果断地回答。

拆下汽缸一看，果然如此。

教官惊愕了，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毛泽东、周恩来对在疆学习航空的同志关怀备至。1939年8月，周恩来去苏联治疗摔伤的胳膊途径迪化时。特意接见他们的代表。对大家说，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你们表示慰问。我不便直接去航空队看望大家，请你们转达。

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他们学习的情况，当听说大家的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已能操纵、维护飞机时，非常高兴。

次年2月，周恩来伤愈路过迪化，再次接见了他们的代表们，勉励他们说：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你们四十多名同志既有会飞行的，又有搞机械的，一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的希望，你们要珍惜目前的学习机会，争取用更好的成绩向党中央汇报。

1940年以后，新疆地区经济恶化，物价飞涨，学员伙食很差，体质明显下降。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经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请示，决定从新疆的共产党组织历年结余的党费里，每月拿出120元作为他们的伙食补助。这是一种少有的照顾。

1941年秋，按照原来的教学大纲，飞行学员平均每人飞行约1000个起落，三百多小时，飞行技术达到了作战水按照当初同盛世才商定的协议，这批学员可以毕业，授予中尉军衔，月薪一百多元，相当于陆军中校，可以结婚，过上富裕的生活。

可是，当了飞行官以后，飞行时间将减少很多，技术上只能保持，不能继续提高。为了能学到更多的飞行技术，这批共产党学员经过反复商量决定：为了党的航空事业，我们要提高飞行技术，不要军衔、高薪，暂时不结婚、不成家，请求推迟毕业时间。

中央代表陈潭秋同意并赞扬了同志们这种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经过苏联教官的协助，盛世才批准了第三期飞行班改飞战斗机，飞完该机种的“战斗”科目后，延期到1942年4月毕业。

新疆航空队的军官们，听说共产党飞行学员主动要求推迟毕业，百思不得其解。迪化社会上的人们也议论纷纷：“新兵营”来的这批飞行员真傻，有钱不要，有官不当，女子中学的小姐找上门来求爱不动情，岂不是“木头人”？

他们当然难以理解这些共产党人的蓝天之梦。

1942年春，德国侵略者深入苏联腹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困难时期，蒋介石加紧拉拢盛世才，给了盛世才国民党中央委员、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等头衔。曾经高唱亲苏联共调子的盛

世才，此时公然撕下伪装转向亲蒋反共。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突然把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工作、学习和从苏联归来路过新疆的人员分几处软禁起来。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这批学员，始则被囚禁在迪化市北门里教导队驻地，继而转移到迪化市南门里的“刘公馆”，完全割断了与外界的联系。1944年11月6日，又将他们投入监狱，实行残酷折磨。这些在艰苦环境中磨练出来的共产党人，坚贞不屈，同盛世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身陷囹圄，还组织起来学政治、学文化，复习航空理论，徒手模拟飞行，以待日后为创建人民空军做出贡献。

中共中央得知这批人员被盛世才关押后，曾经多方设法营救，并请苏联出面向盛世才要人，均无效果。

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了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协议，并正式写入《双十协定》。

1945年冬，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以老朋友身份，亲自登门拜访国民党政府新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托他设法营救被盛世才关押在迪化市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张治中慷慨承诺。张治中到任后，首先派迪化市市长屈武作为他的代表到狱中对大家进行慰问，并发给伙食补贴，改善生活待遇，然后3次电陈蒋介石，提出放人。经张治中向蒋介石再三敦促，这批被关押了3年9个月之久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1946年6月10日得到释放。

为保证返回延安的安全，张治中特意为他们准备了车辆，并委托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一路护送。7月11日顺利回到延安。

延安党政军民隆重集会，欢迎他们胜利归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亲切接见了从新疆航空队归来的全体人员，关照他们好好休息，早日恢复健康，以迎接新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这批存在于盛世才航空队中的航空骨干力量终于保存了下来。

第三章 人民空军的提前报到者

汪精卫的专机降落空塔山

国民党刚从美国买来的新型轰炸机向毛主席报到 杜道财、郝子仪首开台湾到祖国大陆的“新航线”

1945年8月15日，这是中华民族捂着渗血的伤口，仰头大笑的一天。

中午12时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太平洋西部岛国，日本东京“帝国广播电台”突然打破了全天的播音程序，一个沮丧、绝望的声音从太平洋上空传到世界各个角落：“……察世界之大事及帝国现状，朕决定采用非常措施，收拾时局。……帝国政府已接受并通知美、英、中、苏四国政府，我帝国接受彼等联合宣言之条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

汪精卫伪政权和国民党空军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在中国共产党的爱国行动和革命政策感召下，毅然摆脱反动当局的严密控制，接连驾机起义，投向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1945年8月20日，扬州机场上一架立川“99”式双发动机单翼运输机“建国号”已经整装待发。

根据预先约定，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蔡云翔）、少尉飞行员赵乃强（张华）、管序东（顾青）空勤机械师沈时槐（陈明秋）、黄文星（田杰）随即登机。飞机开始了滑行……

这时，黄哲夫（于飞）还没有到来。

当飞机滑行到调头对风向时，埋伏在跑道旁边的黄哲夫突然跃起，迎着飞机跑去。周致和等看见黄哲夫，立即停止滑行，打开舱门，黄哲夫飞速登上飞机，立即说道：“快起飞！”

马达轰鸣，汪精卫的专机“建国号”像一匹骏马，在跑道上飞驰、加速，很快进入云端，告别长江，展翅北飞。

云海茫茫，一望无际，成了“建国号”的空中保护伞。

飞机过了黄河后，浮云渐渐散去。胜利在望，周致和、黄哲夫、赵乃强、管序东等思绪万千，眼睛紧紧盯着机翼下的大好河山。

到了洛川，飞机转向正北飞行，宝塔山已经遥遥在望。

“延安，延安到了！”黄哲夫高兴地喊道。

飞机在山头上盘旋了两圈，在河边的土机场安全降落。

周致和、黄哲夫等走下飞机，对走上前的八路军干部说：“我们是飞来投向光明的，昨天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打了电报。”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延安机场勤务股股长油江同志连声说。

周致和等人起义后，受到朱德、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人的热情接见。

因为这架飞机是8月20日飞到延安的，后来改名为820号。

这次起义行动，开创了从共产党的敌对阵营中驾机起义投奔革命的先例，在汪伪空军和国民党空军中引起很大震动。

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毅然驾驶刚从美国接收来的B—24轰炸机1架，从成都飞抵延安。这是国民党空

军第一起驾机起义投向人民、投向革命的正义行动。

刘善本，1915年1月出生在山东省安丘县的一个财主家中。1935年9月，刘善本考入国民党航校。1938年12月，刘善本在国民党航校第8期轰炸组毕业。1943年，蒋介石用租借的办法组织了一个以八大队为基础的重型轰炸机部队赴美受训，刘善本在美学习成绩突出。日本投降后，八大队接到“火速回国”的命令，于1945年10月15日回国，驻防上海。

刘善本回国后不久，得知国民党真的要发动内战。他想：难道我能够把美制炸弹扔到无辜的中国同胞的头上吗？不！我绝不能当历史的罪人。

正当刘善本筹划起义，苦于难找机会时，蒋介石下了一个手令，限八大队于6月23日前将昆明美军移交的全部无线电器材空运成都。八大队派出7架B—24型飞机执行这项任务。刘善本主动要求参加这次飞行，大队长批准了他的请求。

1945年6月26日上午，刘善本驾机从成都起飞，开始他把飞机对着昆明方向。今天，飞机上除机组6个人外，后舱还有5个人搭便机。飞机起飞不多时，搭乘便机的成都无线电修造厂少校副厂长陈泰楷（刘善本的老熟人）来看刘善本开飞机。

“老张，你开，我到后舱去看看。”飞机起飞不久，刘善本对副驾驶张受益说。

“老陈，我们前面几个人要飞到延安去，你站在前面，他们会怀疑你的！”刘善本严肃而关切地说。

“老刘，你知道，我才结婚呀！求你借个降落伞，我跳下去。”老陈一听，脸色惨白。

“不行！我们在云上飞行下面是山是水根本不知道，有伞也不能跳。”刘善本指着窗外说。

“糟了，糟了！后边那几个人全是共产党，刚才他们拿着手枪、手榴弹威胁我，要我们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否则，同归于尽！”接着刘善本回到驾驶舱，故意装着惊恐万状的样子。

与此同时，刘善本悄悄地将副选手枪中的弹匣取了出来。

“管他的，去就去！反正延安也不是外国的地方。”副驾驶张受益叹口气。

“没有西北地图，这可没有办法呀！”领航员李彭秀坚决反对去延安。

“我到后面告诉他们。”刘善本心想，后他的人一来到驾驶舱，那就全完了。

“老陈，你们千万不能到前面去，他们手里的家伙可都顶上门了，如发生生命危险，莫怪我做朋友的没有关照。”

刘善本稳住后舱的人员后，立即赶到前舱：“他们说地图就在你们的包里，让我们自己找。”

“嗨，共产党人真有办法！你们瞧呀，他们啥时候把地图塞到我的包里来了！”刘善本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地图巧妙地拿了出来。

张受益配合刘善本驾机飞过了秦岭。

1945年6月26日下午，延安是阴雨天。这一天，正是蒋介石调动30万大军进攻解放区的日子，延安是一片战斗紧张的气氛。

午后3时，一架美国新出产的B—24重型轰炸机突然飞临延安上空，延安卫戍部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突然，这架飞机一个俯冲——降落在延安的土机场上。

守卫机场的指战员荷枪实弹冲到飞机跟前。

机舱的门开了，一位高大的青年军官走出飞机：“我们是反内战来的！请各位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报告。”

6月29日晚上，中共中央在中央礼堂举行欢迎晚会。

许多人在中央礼堂门口迎候，毛泽东主席握着刘善本的手说：“欢迎你到延安来。”

“毛主席，我终于到您这里来了！”刘善本把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

1945年8月，八路军总部任命刘善本担任航空教员。1946年3月，刘善本被任命为东北航校副校长。

1949年4月23日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宴请起义的蒋陆、海、空人员会议上，周恩来高兴地宣布：“我百万雄师已经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在蒋介石的空军方面，第一个驾机起义反对内战的是刘善本！他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蒋空军起义人员的一盏明灯！”

此后，刘善本多次带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1949年11月，军委任命刘善本为我新组建的某航空学校校长。1951年3月12日，军委空军任命刘善本为新成立的某轰炸机师师长，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斗。1954年刘善本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64年4月，周恩来总理下令晋升刘善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少将。

1968年3月，林彪死党吴法宪指使人员抄了刘善本的家，并将其关押。3月8日晚，这位为对党和国家无比热爱。为新中国空军创建做出卓越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刘善本，被连续批斗10个小时，最后被专案组人员失手打死，时年53岁。

二十多年的起义英雄，国民党特务多次谋刺没能得手，结果被强加上“特大特务”的罪名，迫害致死。

1975年10月14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给刘善本平反昭雪。邓小平对空军领导人说，刘善本同志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对他的家属要照顾好。还要做个决定发给部队。

1978年10月19日，《解放军报》公开为刘善本平反，《人民日报》等相继报道了这一消息。

在刘善本行动的感召下，1948年12月16日夜，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三十三中队中尉飞行员俞渤、郝桂桥、陈九英、中尉领航员周作舟、张祖礼共谋起义，他们驾驶一架载有5枚炸弹的B—24轰炸机从南京起飞，计划先轰炸南京大校机场和总统府。后因投弹系统发生故障炸弹偏落于南京城外燕子矶附近，正在南京国民党空军俱乐部慰问和嘉奖驻宁飞行员的蒋介石闻听爆炸声大吃一惊，俞渤等人随后驾机飞往石家庄，投奔解放区。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于1949年1月28日从南京大校机场转移到台湾新竹机场，2月3日，该大队在上海执行任务的中尉飞行员张雨农、任永荣、黄友寿、中尉空中射击员黄文刚驾驶一架B—24轰炸机起义飞往北平。

一时间，八大队的起义事件令国民党当局十分难堪。国民党空军不仅痛惜失去3架B—24重型轰炸机，更害怕这种起义势头继续发展下去。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迅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许多被认为不可靠的飞行员被调离机组，军中特工活动也大大加强。

杜道时作为刘善本的同乡、同学和挚友，也受到上司的怀疑，被调到大队司令部情报资料科“帮忙”，失去了接触飞机的机会。

在此期间，刘善本辗转来信，催促杜道时早日驾机飞往解放区。此时的刘善本并不知道杜道时的处境。

一个星期天，心情苦闷的杜道时陪着妻子女儿到海滩上散心。在海滩，他与故友郝子仪邂逅相遇。郝子仪是国民党空军二十大队的中尉机械师，他所在的运输机部队于1948年撤至台湾，与八大队同驻新竹机场。两人略作寒暄，都表露了想飞回大陆的心愿，并决定设法搞到飞机，尽快行动。

1949年4月16日，正在机场值班的郝子仪突然接到通知叫他到中队部领受去上海换三十中队驻防的任务。

郝子仪内心非常高兴，搞到飞机的机会到来了。

他回到机场后，立即同其他地勤人员为15架飞机检查加油。停在跑道头上的那架333号C—46运输机被郝子仪选中，暗地里加满了油并悄悄地把飞机钥匙拿到手。

一切准备好后，当天晚上，郝子仪找到杜道时，约定了行动时间。

第二天凌晨3点，郝子仪和化妆成机务人员的杜道时趁着夜色，直奔机场而去。

俩人刚要走进机场，一位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出现在面前：“干什么的？”

“我们是来工作的，为明天飞行准备飞机。”说着，郝子仪递上了证件。

警卫不再盘问，看着俩人登上跑道头上的飞机。

杜道时、郝子仪进入驾驶舱后，立即做飞行前的准备工作。C—46型运输机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先进的飞机，最大航程4140公里，可运载50名士兵，其操纵系统也比较复杂。

杜道时虽然有十多年的飞行经验，但没有飞过此种型号飞机。郝子仪也只是会维修，不会驾驶。俩人对于能否顺利驾机升空，感到把握不大。

“万一一起飞出了问题，你就冲着我这儿打，别让他们捉活的。”杜道时把自己的手枪文给郝子仪，指着自己的太阳穴说。

“明白，我也不能让他们捉活的！”郝子仪表示了同样的决心。

1946年4月17日凌晨5点，新竹机场处在浓雾的包围之中，杜道时发动飞机滑进跑道，加大油门，飞机经过一段滑行，顺利升空。

“你们起飞为什么不报告？”机场调度员发现有飞机起飞，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在当天的飞行计划中，这个时间没有飞机起飞。

杜道时不理睬机场的询问，继续操纵飞机爬高。开始他转弯向南飞行，随后降低高度，贴着海面向北飞行，以躲避地面雷达的跟踪。很快飞机到达了厦门上空。

国民党空军获悉这架运输机飞往我解放区后，立即部署驻扎在长江以南的战斗机进行截击。当时解放军尚未渡过长江，江南还是国民党统治区。

杜道时及时把飞机升入万米高空，借助浓云胜利避开了国民党的歼击机。

国民党的飞机失去目标后，接着对解放区内的一些机场进行侦察扫射，试图找到杜道时的飞机并将其击毁。

躲过国民党的飞机以后，杜道时降低高度，钻出云层，沿着铁路线直飞徐州。

守卫徐州机场的解放军防空部队刚把两架敌机赶走，突然发现一架临空，以为还是前来扫射轰炸的国民党飞机，立即猛烈开火，见此情景，杜道时赶紧摇摆双翼，郝子仪也向外面丢出降落伞，并放下起落架，向地面发出联络信号。可是解放军的防空部队曾经被国民党飞机诓骗过，并未停止射击。

杜道时冒着弹雨在空中盘旋一周，决定强行降落。他驾机对准跑道，按下机头，飞机平平稳稳地降落在徐州机场。杜道时、郝子仪在空中飞行了七个多小时，终于成功地完成了从台湾起义归来的壮举。

在徐州，杜道时、郝子仪受到热烈的欢迎。

1949年4月23日上午，杜道时、郝子仪应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邀请，驾驶这架C—46运输机降落于北平南苑机场。当晚，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欢迎会，朱德总司令在会上致欢迎辞。

后来，杜道时、郝子仪成为解放军空军师级军官。

刘善本的正义行动，给一切不愿意祖国处于分裂和内战状态的国民党空军人员树立了一个值得效法的楷模。此后，从1948年9月到1949年6月期间，国民党空军先后有20架飞机、54人驾机或随机起义。他们从国民党统治下的汉口、南京、上海、杭州、青岛等地，一架接一架地飞向解放区，投向共产党的怀抱。

第四章 人民空军的真正起飞

韧建的航空学校在硝烟弥漫中 蒋介石给刚刚驻进北京的毛释东送来了 30 枚炸弹 毛泽东钦定 6 所培养空中骄子的摇篮 中国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第 4 混成旅

炮声隆隆的三大战役，为人民共和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石。未来的共和国的领袖们深深地懂得，要巩固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必须有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和人民海军。于是，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他在谈到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军队时说，今天，我们有了建立海空军的条件，应当着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强大的空军。尤其是空军，对于国防极其重要，应当赶快建东北，不仅是我国的重要粮仓，而且工业基础雄厚。早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共产党就审时度势作出了在东北建立航空学校，创建人民空军的决定。

日本投降后，日军在东北的航空训练机构，装备、设施和人员没来得及撤走，像机场、机库、工厂等大型设施仍然比较完整。还有一些设备失散民间。为了尽快地把航校建起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先前到达东北的王弼、刘凤、魏坚、常乾坤等我党航空技术骨干，克服重重困难，为勘查机场、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跑遍了东北三省的三十多个城市，勘查了五十多个机场。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6月，共搜集到各种日式飞机一百二十多架，发动机二百多台、油料两千多桶、航空仪表数百箱及多种机床等航空军用设备。同时，还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的投降。这个日本航空大队由三百多人组成，在大队长林弥一郎的率领下归降东北民主联军。这支航空大队中的日本留用人员，在后来的东北航校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经过多方努力和紧张筹备，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于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校。常乾坤任校长，航空总队政委吴溉之兼任政治委员。全校共有631人，各型飞机一百多架，其中30—40架经过修理可以使用。

正当航校准备开始飞行训练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向东北大举进攻，他们先后占领了沈阳、辽阳、铁岭，直逼四平，形势骤然恶化。敌机频繁地轰炸通化机场，企图把初生的航校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损失，航校于1946年4月转移到牡丹江畔的海浪机场。为了迅速培养出自己的飞行员，航校的创业者们克服重重困难，加紧训练。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又追踪到牡丹江来侦察、轰炸。航校又于1946年11月迁至兴凯湖畔的东安。

1948年3月，航校由东安迁回牡丹江。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获得了解放。次年3月，航校又迁到长春。这时，环境比较安定了，条件也有所改善，训练规模也随之扩大，在校学员达三百二十多名。5月，这所航校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到10月，共培养出各种航空技术干部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械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讯、仪表、参谋人员共88名，这些人员大都成为后来建设空军的骨干。

1949年3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

大部分被歼灭，历时4年的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最后的胜利，此时，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专门听取了主持东北航校工作的常乾坤、王弼等同志的工作汇报。常乾坤汇报时，毛泽东听得极为入神。东北航校所走过的艰苦而悲壮的道路深深感动了毛泽东同志。当听到航校取得的成绩时，毛泽东同志情不自禁地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

周恩来也兴奋他说：“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

在座的个个都是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大帅，可面对空军这一新兵，他们也禁不住为之动容。

毛泽东越听兴致越高。是啊，要知道，空军对于这位上井冈山，爬雪山，过草地，为躲避国民党的飞机而弄得疲惫不堪的天才军事家来说，是何等地神往啊。

小米加步枪的游击战是毛泽东及在座的其他领导人领导下的军队的“专利”，但并不是毛泽东对此有特别的偏爱。早在3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撰写《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时，就满怀憧憬地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设想在装备了新武器之后，军队和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这时的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和组织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将变到高级，中国型将变到世界型。”

世界型就是现代化。对此，毛泽东的追求可谓孜孜不倦。只是苦斗在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中国共产党人，还缺少实现这一设想的条件罢了。现在听了常乾坤的汇报，怎么能不使毛泽东高兴呢？

1949年3月17日、1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先后电告第四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从东北航校中抽调。

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航空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中央军委航空局宣告正式成立，并将办公室设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航空局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遗留的机场、设备、器材及航空技术人员等工作，以便逐步地、有计划地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和正式建立空军创造条件。

1949年3月25日，是北平的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照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还是那个太阳，映在中南海里的还是那个月亮。只是从黄土高坡上走下来的共产党人迈进了这充分显示中华历史、智慧和文化的京城。住惯了窑洞的毛泽东，这一晚毫无睡意。

这一天晚上还有一个人也没有睡意，他就是栖身在上海的蒋介石。连日来，兵败如山倒的局势使他痛心疾首，他忧愤、暴躁，以至于神经质地看什么都不顺眼，不知摔了多少东西，也没能宣泄掉他心头的奇耻大辱。

5月4日，6架美制B—24轰炸机从蒋介石栖息的上海，直飞毛泽东稳居的北平。8时57分，飞机抵达北平南苑机场轰炸，低空投下了30枚重磅炸弹。

北平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党中央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为了确保北平的安全，保证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周恩来紧急召见常乾坤，令其迅速建立一支空军作战部队，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于是，在形势的逼迫下，新中国第一个飞行队诞生了。

这个飞行队下辖三个飞行分队，共有10名飞行员，装备飞机10架，其中P—15战斗机6架，蚊式轰炸机2架，PT—19教练机2架，肩负起北京城

的防空任务。

1949年5月7日，蒋介石怀揣着《圣经》，无可奈何地逃离了大陆。

1949年6、7月间，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节节败退，中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以后渡海作战的需要，决定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建立一支可使用的空军，为解放台湾创造条件。

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了渡海和建立空军的设想：“我们必须准备进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海军和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仍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苏联——引者注）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掩护渡海……”

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苏联“老大哥”。

斯大林称毛泽东为“农民领袖”，他不相信毛泽东领导下的农民武装能成什么气候。身为农民儿子的毛泽东一身补丁衣服，又喜欢吃辣椒，的确是一个“土包子”形象。然而，这正是毛泽东个性魅力的一部分。他那气势恢宏、令人回肠荡气的浪漫诗词；他那不拘一格、奔放洒脱、自成一体的书法；他那天才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战略眼光，都使当代伟人为之黯然失色。抗日战争，斯大林援助蒋介石，毛泽东就用小米加步枪自己干；解放战争，斯大林又要求解放军停止南下，与国民党南北分治，毛泽东照样挥师南下，打过长江，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电告在莫斯科访问的刘少奇，让他向斯大林提出协助中国建设空军的问题。次日，刘少奇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意见，提出希望购买200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

新中国还没有正式成立，就提出要建立空军，被斯大林称为“农民领袖”的毛泽东确实让斯大林吃了一惊，但他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斯大林还说，中国现在建空军已经晚了，如果早一年，空军便可以参加解放中国南部的战役了。他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自己的空军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斯大林虽然对蒋介石曾经抱有很大的希望，但蒋介石却一步步把屁股移到了美国人的板凳上。所以，毛泽东的胜利他还是很欢迎的，紧靠着社会主人新中国，对于斯大林来说是很安全的。

周恩来开始为组建空军而操劳。他首先召见了刘亚楼，刘亚楼当时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长，并兼任东北航校校长，毛泽东和周恩来部把他作为未来空军司令员的理想人选。周恩来让他先提出空军领导机关的组成和领导班子名单。

刘亚楼曾于1939年受中国共产党派遣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那时他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长，临近毕业时，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他参加了苏联红军，并一直战斗到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后，于1945年随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回到东北野战军任参谋长。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赏识思维敏捷、办事果断且善思善辨的刘亚楼。所以，当刘少奇从苏联回电要选派人员赴苏会谈时，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非刘亚楼莫属了。

同刘亚楼一起去苏联会谈的还有王弼、吕黎平和翟云英。临行前，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他们。时值盛夏，毛泽东单衣单裤，裤子上还打着

两块补丁。刘亚楼他们到来的时候，毛主席正在书房看书，见他们到来便起身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让他们就坐。刘亚楼向毛主席介绍：“主席，王弼同志30年代曾在苏联学习过航空机械，吕黎平同志在抗战初期在新疆航空队学习过飞行。”

“你刘亚楼是在苏联学习地面指挥的。”毛泽东风趣他说，“你们三个人既有地上的指挥员，又有空中的飞行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真是难得见到这样的三位一体的贵客呀！你们就是空军主要成月的缩影吧。”

他们三人都被毛泽东风趣的谈吐逗笑了。

毛泽东拉了张藤椅坐下来，继续说：“我们从南昌起义、秋收暴动起，就同蒋介石打交道，走过曲折的路，依靠小米加步枪，经历了长期的战争。我们打赢了，快要打出一个新中国了，全部是陆军打的地面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都有上万架以上的飞机，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可是我们呢？既不能制造飞机，也没有汽车工业，当然更谈不上建空军的问题了。”

“我们过去是依靠自力更生战胜蒋介石的，没有向苏联提出过援助问题，即使提出了也不一定能给。我们穷嘛，所以一直没有开口。今后面临的作战对象，除了蒋介石以外还有美帝国主义。现代战争的样式是地面、空中、海上的立体战争。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我们仍然单靠陆军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建设三军协同作战的人民解放军。”

“中央认为，现在请苏联援助我们建立空军的条件已经具备，有全国性的政权可以做生意，有偿还能力了。我们让现在在莫斯科访问的少奇同志试探了一下，他们答应了，已经得到斯大林的赞同。”

毛泽东接着又问他们：“电报内容，恩来同志告诉你们了吗？”

“已经告诉了。”刘亚楼回答说。

“那好，你们已经知道中央的建军方针，现在我想听听你们关于组建空军的具体意见，好吗？”

刘亚楼把航校现有的家底和预先研究的方案，向毛泽东做了近半个小时的汇报。毛泽东仔细地听着，不断记下一些要点和数据，对不明白的航空术语还请他们解释。

“亚楼同志，我们东北航校以及接收国民党空军的家当太小，底子太薄，胜任不了解放台湾的任务。你们觉得中央在电报中提出的飞行员太多了，地面机械人员又太少了，飞机数量不够，不能夺取制空权，是不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又问道。

“是这样的。”刘亚楼回答说。

吕黎平又补充道：“苏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他们空军的歼击机、轰炸机的比例也不同。美国侵略别国要远洋作战，因此，它的轰炸机占作战飞机总数的一半。而苏联的轰炸机要少得多，大概只占三分之一。现代的轰炸机是以深入敌国作战的方式，达到进攻或者侵略的目的，歼击机是用进攻方式歼灭敌机从而达到防御，也就是掌握制空权的目的。因此，我们组建的空军，歼击机和轰炸机的比例按2：1至3：1比较合适，请主席考虑。”

毛泽东思考了一下，温和他说：“你们刚才谈的组建空军的方案，比较适合当前的实际，我看就以你们的方案作为正式意见，同苏联商定具体计划。你们到莫斯科后，先同少奇商量，由他带你们去同苏联同志谈判，因为这是中央代表同苏共中央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

现在可以把我们研究的意见归纳为两条方针：第一，以一年为限建立一支歼击、轰炸部队，协助陆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飞行员么，从陆军选调，采用速成训练的方法。这个方针叫做：创建一支强大的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第二，我们的经济仍很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你们这次去谈判，请专家、买飞机、购器材，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呀！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设好。还有什么要谈的吗？”

“没有了。我们坚决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谈判的情况及时向主席和中央报告。”刘亚楼干脆利落地表了态。

谈完后已是下午七点多了，主席请他们3人吃了便饭。主席亲自给每人斟满一杯酒，并举杯祝他们顺利完成任务，为建成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第二天，刘亚楼等3人就去莫斯科了。

10天的行程，一路的劳顿，使他们疲惫不堪。但他们没有忘记临行前主席的交待，一心记挂着此行所担负的重要使命。一到莫斯科，他们就来到刘少奇的住处，向刘少奇、王稼祥汇报了此行的具体方案和临行前主席的交待。

刘少奇很快同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联系会谈事宜，第二天即进行了第一轮会谈。通过多次会谈、协商，双方于1949年8月10日达成协议：苏联帮助中国创办6所航校（其中4所歼击机航校，2所轰炸机航校）卖给中国各型飞机共434架，派出专家878名来华帮助培训飞行员。

在此期间，中央军委向各野战军、各大军区发出指示，要求从陆军作战部队和各地的军政大学中选调飞行学员和地勤学员，并规定了严格的选调条件。经过认真选拔后，录取了具有良好政治、军事素质的飞行学员930名，地勤学员1980名。

1949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组建。1949年10月1日，第一飞行中队的17架飞机组成6个分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空中接受了党中央的检阅。

刘亚楼刚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毛泽东便放下万机待理的工作，立即召见了。听完他的汇报后，毛泽东说：“亚楼同志，空军的基础如何、起步快慢，关键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人。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我。”周恩来也告诉刘亚楼，办航校的经费给予优先保证，选调干部和学员的命令已经发出，很快就能集刘亚楼离开中南海后，当夜就起草了一份征求工作分配的志愿表，并立即印发至所有处以上飞行和政工干部。他善于用人之所长，在分配干部时，他总是先征求本人的意见，而后再做全面的考察。在考察干部时，他的方法也是别具一格的，他总要问清楚“他最善于做什么？为什么？他最不善于做什么工作？为什么？”把了解对象的长处、短处，以及其潜在的因素（诸如性格、能力、经历等等）搞得一清二楚。

经过一番紧张的考核，6所航校办校人的组成名单迅速产生了。随后苏联专家也来到了。他们一起勘察、选定校址，10月30日和11月1日经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批准后定为：第一轰炸机航校在哈尔滨，第二轰炸机航校在长春，第一歼击机航校在锦州，第二歼击机航校在沈阳，第三歼击机航校在济南，第四歼击机航校在北京。

12月20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将上述航校依次定名为第一至第六航校。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

亚楼为空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政治委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军长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11月11日，任命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原军委航空局政委贝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长。同日，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原军委航空局取消。

1949年10月30日下午，新任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即召开了第一次空军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空军领导班子成员和6所航校的校长及政治委员。会上，刘亚楼下达了军令：“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急需空军，党中央、毛主席殷切期望培训战斗飞行员，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因此，你们受命开办航校要只争朝夕，一天一个小时也不能拖后。从今天军委下达命令开办6所航校到全部建成办学，按通常的时间起码要三四个月，但现在给大家的筹备时间只能是一个月，也就是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

“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这句话像锤子一样砸在在座每一位的身上。

“是啊！在一个月內，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使近千人的现代航校开学，困难很多，困难如山啊！同志们，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开天人，是空军的创业人。困难即使像山高，我们也要横下一条心把它搬走。困难即使像海一样汗，我们也要迎着风浪上，把它填平！有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应该有勇气，有魄力，创造世界空军建军史上第一流的速度。12月1日按规定时间开学的是英雄，拖延开学日期的是狗熊。你们究竟是英雄还是狗熊。12月1日见分晓，散会。”

刘亚楼及其领导下的空军领导班子果然不负众望，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经过紧张的准备，终于在12月1日，6所航校同时开学。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参加了航校的开学典礼。

1950年2月下旬，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国，路经沈阳时作了短暂停留。在接见东北局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时，毛泽东询问了航校学员训练的情况。苏联专家的工作情况。他说：“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都非常需要早一点有自己的空军，你们看，我们的航校一年内能培养出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员吗？第一期学员毕业后，能组建几个作战师呢？”

“航校指战员正竭尽全力，加快训练步伐，决心不误参战。”吕黎平坚定他说，“从目前情况看，1年内培训出组建7个航空兵师的空、地勤人员是有把握的，请主席放心。”

“那很好。”毛泽东非常满意，“我相信困难是压不倒你们的，空军作战部队是能够按计划组建的。”

1950年，毛泽东成功地出访苏联，对于蒋介石来说又是致命的一击。

自蒋介石发表文告，宣布就任“总统”职务以来，他对国民党空军提出了“攻势防守”的要求，不断命令盘踞在定海、台湾、海南岛的国民党空军部队倾巢出动，空袭上海、南京、福州、广州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厂、铁路、桥梁、码头等重要政治经济目标。尤其是对上海地区，他更不手软，先后出动B—24、B—25、P—38、P—51等12架飞机轮番轰炸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和闸北水电公司等，以破坏国民经济的恢复。后又命令B—24轰炸机北上轰炸首都北京，对刚刚恢复维修工作的南苑机场进行破坏。这对北京人民和党的领导机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妄图凭借着空中优势，摧毁新生的人民政权。他没有料到，我们的空军已迅速成长起来了。

面对国民党空军的猖狂轰炸，毛泽东命令刘亚楼：“必须迅速增强空军

的力量！”朱德也向空军下达了指示：“我们的任务是很紧迫的，人民实在等得焦急了，他们希望我们很快地学会，学会了就打。因此，我们的学校是个速成班。要很快地把学校办好，越快越好，快一个月也好。”为此，空军提出了扩大航校培训规模的计划，中央军委电令各野战军、各大军区力空军选调人员到各航校工作，选调空、地勤学员参加速成学习。

1950年5月，各航校速成班的学员毕业，空军有了组建航空部队的基本条件，组建部队所需的飞机、器材也全部从苏联购来。

1950年6月19日，空军在南京成立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8月8日，该旅移驻上海。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兼任旅长，第二航校政委李世安调任该旅政委。空军第四混成旅辖4个团：驱逐第十团、十一团，轰炸第十二团，歼击第十三团。这样编组的目的是为了摸索组建各类航空兵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的经验，以便早日参加协同陆军、海军解放沿海岛屿的作战行动，据说，空军第一支航空部队称第四混成旅，其用意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红四军的传统，为空军现代化作准备。

驱逐第十团于1950年6月9日在徐州成立，辖3个大队和1个直属中队。7月初又接收第五、六航校的速成班学员30名。7月15日，开始进行拉—9型驱逐机飞行训练。7月25日，由徐州转场上海尤华机场，后又移往上海大场、虹桥机场。

驱逐第十一团于1950年6月23日在南京成立。7月初接收第三、四航校的速成班学员30名。7月15日开始进行拉—9型驱逐机训练。7月29日，移往上海江湾机场，并改飞拉—11型驱逐机。

此时，美国和苏联早已生产了喷气式歼击机，并陆续将新机装备部队。作为活塞式螺旋桨飞机，如P—51、拉—9等已经呈淘汰的趋势。

周恩来深谋远虑，及时提出：新中国的空军建设，不但要在数量上与国民党相比占压倒优势，而且要重质量，要跟上世界航空兵器的发展潮流，掌握第一流的武器，练出第一流的本领。应该设法在航校第二期学员毕业后，组建一个装备现代化喷气式歼击机的作战师，以便能和美制蒋机相抗衡。

于是，空军第四混成旅的第十、十一两个驱逐团，迅速投入改装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10月中旬即完成了改装训练课目。

10月17日，上海市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在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的陪同下，观看了驱逐十团的飞行表演。这天，天空乌云不散，云底高度仅300米。这样复杂的气象条件下，还没有训练过。但是，队员们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硬是按规定的编队完成了飞行任务。多年来尝尽国民党飞机苦头的陈老总高兴地拍着手说：“我们的飞行员不得了哟！飞得好，飞得好！”

轰炸第十二团于1950年6月23日在南京成立。7月初接收第一、二航校速成班学员，组成20个机组。7月中旬，开始进行图—2型轰炸机飞行训练。

歼击第十三团于1950年8月1日在徐州成立，8月初接收第一、三航校一期甲班学员，组成35个机组。8月16日，开始进行伊尔—10型歼击机训练。

第四混成旅所辖4个团经过紧张的战斗训练，自1950年10月19日开始担负上海的防空任务。次年9月20日，首次击落入侵的美制蒋机一架。那天5时37分，防空警戒雷达在上海东南133公里处发现一架B—29型轰炸机。5时45分，两架米格—15歼击机奉命起飞，在地面雷达的引导下于5时59分在上海东南陈家镇上空发现敌机，距离四千米。敌机也发现了米格—15，

并首先开火。米格迅速转到敌机尾后进行攻击，并将其击落。

此后，台湾海军的舰艇在台湾海峡和浙东海域频繁出动。

10月23日，从4时到22时共有F—9F、F2H—2、PB4Y—2等型飞机30架次入侵上海地区进行轰炸。第四混成旅一次又一次升空拦截，均无功而返。战斗的失利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空军太年轻了！年轻的空军部队对防空作战的规律认识不足，警惕性不高。在取得一次胜利后，没有及时研究新的部署。当时，防空体系还很不完善，尤其是对情报掌握不准，传递不快，贻误了战机。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指挥不统一，动作不协调，也造成了许多困难。为了接受教训，以利再战，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我军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调整了高射炮、探照灯和雷达的部署，改善了通信保障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指挥原则，并规定各兵种每月进行两次协同演习，以提高协同作战能力。空军任命驻沪空军第四军军长兼任上海防空副司令员，以协调各部队的行动，同时采取措施提高了预警能力，扩大了情报保障范围，调整了歼击机部队的部署。在以后的日子里，刚刚学步的人民空军，在其他兵种的配合下，多次参加防空作战，击落敌轰炸机3架，保障了上海地区的安全。

第一支航空部队成立后，紧接着又建立了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的伞兵部队。该旅以第三野战军九兵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为基础在上海成立，战斗员是各野战军、各大军区抽调的战斗英雄、模范及一、二等功荣立者及政治可靠、作战勇敢、身体健壮的战士组成。不久，中央军委又将华东军政大学伞兵总队队长刘农峻等三十多名干部及350名战士调给伞兵旅，以加强技术力量。而后，这个陆战旅改编为第一陆战师。现在的空降兵部队就是在这个师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从1950年起，我空军陆续建成了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拥有各型飞机三千余架，建成了一支具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蒋介石企图以自己占优势的空中力量打垮共产党的梦想破灭了。

第五章 痛苦的抉择

蒋介石得知朝鲜战争爆发，那颗悬着的心放下了大半
苏联痛失否决权
共和国一周年国庆，金日成送给毛泽东的礼物是“求援电报”
斯大林拒绝出动空军
美军陆地进攻受挫，鸭绿江两岸惨遭美机轰炸
初主牛犊不怕虎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空、海军对南朝鲜提供“掩护和支持”。7月初，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介入了朝鲜内战。9月15日，由“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的七万余人在仁川登陆。美国政府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严厉谴责和周恩来总理的严正警告，置若罔闻，悍然向北朝鲜大举进兵，越过“三八线”，于10月19日占领平壤。

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处境危急。美国不断派遣飞机侵犯中国东北领空，肆意进行侦察轰炸。为了援助朝鲜人民，保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人民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要求，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击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随后也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

1950年春夏之交，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最力恐慌的日子，自海南岛被攻占、舟山撤守后，许多人预感到中共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了。当时，国民党相当数量的“党国要员”对固守台湾完全丧失了信心。蒋介石在大陆两个最有力的经济支柱都远飞而去——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去美国当了寓公。李宗仁代总统在美国称病不归。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自奔海外或寓居香港。特别有趣的是，原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竟不顾自己的上将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一个华侨中学的教员。

1950年6月25日，蒋介石正在吃早饭，负责给蒋介石递送情报的蒋经国送来一份简报，告知朝鲜南北双方发生了战争。令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露出了端倪。

蒋介石派驻南韩的“大使”分析，韩战对于台湾，更是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的遗弃，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于南韩，亦必有利于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以由鸭绿江，由东北重返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而不管了。

果然不出所料，韩战一爆发，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因此而缓了一口气。

美国出兵台湾，使新中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3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传达了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形势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海峡挡着。”“现在我

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攻打台湾的时间向后推延。”

7月13日，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率16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次日和蒋介石签定了“保卫协定”。8月4日，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司令抵达台湾，并成立了台湾前线指挥所。由于美军的干涉，国民党军停止从金门撤军，并又进占了刚刚放弃的浙东部分岛屿。

考虑到美军介入台湾海峡后的形势，中央军委于8月11日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决定1951年不打台湾，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可决定在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后待命再打。随后，人民解放军停止了攻击金门和沿海其他岛屿。

当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麦克阿瑟预料人民解放军会进攻台湾，在台湾海峡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停止进攻台湾，是非常英明的选择。

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美国政府就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宣布韩国遭到侵略。而这时恰有一个对美国政府来说是难得的大好时机：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马立克为抗议国民党继续占据联合国席位，一直拒绝出席安理会会议。如果马立克及时返回安理会，他可以行使否决权阻止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

美国认为，马立克不会马上出席会议，因为他必须请示莫斯科，得到答复后才能参加会议，这在当时的苏联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美国国务院于25日之时30分（纽约时间），正式将提交安理会的议案通知安理会成员国，要求他们立即请示本国政府。6月25日6时左右，美国的提案以9票对零票获得通过。决议声称：北朝鲜军队向韩国发动了武装进攻，呼吁北朝鲜军队立即撤回“三八线”以北。虽然决议只是联合国对北朝鲜道义上的谴责，但在美国人看来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归罪于北朝鲜方面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出兵干涉，正是从这里为起点。

美国最初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对朝鲜战局产生丝毫的影响，南朝鲜军队在北朝鲜的进攻下，毫无抵抗能力。据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记录：战争爆发当天，韩国陆军兵力达98000人，一个星期以后，兵力只有54000人，几乎损失一半。

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26日深夜就已决定动用美国海军和空军“保卫”南朝鲜，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实施，而是在等待打起联合国的旗号。

6月27日，这天恰逢苏联驻联合国的一位外交官举行午餐会，这是苏联在拒绝出席安理会会议期间的定期社交活动，以保持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的政治联系。喝过咖啡后，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告诉苏联代表马立克，他同其他外交官将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并问：“你去吗？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你出席的。”

美国代表格罗斯听到这样的问话，脸色立刻煞白。如果苏联代表马立克到会，毫无疑问他会否决议案，那样美国精心策划的计划就会毁于一旦。此时，格罗斯甚至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要他立即收回这种危险的话题。

“不，我不去。”苏联代表马立克摇头说道。

事后，美国代表格罗斯直言不讳地对赖伊说：“如果马立克接受了你的邀请，后果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苏联痛失否决权，使得朝鲜和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当时朝鲜人民军全线推进到北纬38度线以南地区，并于6月28日解放汉城。

6月27日，美国宣布派遣陆海空三军参战。7月1日起，美第八集团军所辖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师和骑兵第一师陆续抵朝。其二十四师二十一团“史密斯快速机动部队”率先进至乌山作战，被朝鲜人民军重创。二十四师主力亦在大用地区被歼，少将师长威廉·迪安被俘。

8月初，美军后撤至洛东江以东的大丘、釜山一带，建立防御体系。双方在此紧张对峙。

8月29日，在美国的操纵下，15国的军队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入朝参战。

9月15日，七万余名美海军陆战队及陆军官兵，在二百六十余艘舰艇、五百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大举登陆，至此，战局发生了重大转变。

9月28日，汉城失守。

9月29日，美军进至三八线。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然而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却在这喜庆的节日里，收到一份不大合意的“礼物”——金日成的求援电报：

毛泽东同志：

……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敌人利用约千架飞机，不分昼夜轰炸我们的前方和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损失非常严重。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毛泽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

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并给斯大林发电报，要求苏联方面配合，斯大林答应出动空军。

10月8日，中央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积极准备入朝参战。

就在此时，苏联突然通知中国：原商定的苏联方面出动空军部队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之事，由于苏联方面没有作好准备，所以空军暂不能出动。

“苏联不出空军，这样我们丧失了制空权，敌人狂轰滥炸，大部队白日无法作战，困难太大了……”毛泽东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很震惊，他对周恩来说。

“是不是他们真的没准备好，暂缓出动？”周恩来问道。

“我看不像。没准备好？那我们也没准备好，许多部队连冬装都没发下去，武器装备也有待更换……暂缓出动不过是个托辞，看起来斯大林是想让我们单独对美军作战。”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大口烟。

两天后，毛泽东经过与政治局同志研究决定暂缓出兵，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向斯大林当面阐述中国方面的困难。

就在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周恩来的那个深夜，毛泽东同样没有休息。

他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服了超出常量两倍的安眠药也没有

用，脑子里总是在翻江倒海。

苏联空军没有指望了。靠我们步兵和美国的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结果将难以预料，至少将会付出巨大的牺牲要打，就必须保证战而胜之。可是在丧失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不打，朝鲜很快会沦陷，一旦人家宣布大韩民国统一，再打就更被动。

斯大林呀斯大林，朝鲜等着你的支援，你的空军却要暂缓……

杜鲁门帮助李承晚打金日成，一点儿也没暂缓，一暂缓，李承晚就完蛋了。

中国如果也暂缓出兵，金日成怎么办？唇齿相依，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不就是先吞并了朝鲜，继而以朝鲜为跳板，侵入中国的东北。今天美帝国主义又……

看来还得下决心打，要打就必须抓住战机，再不迟疑。

就在美军攻入平壤的同一天，10月19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跨过鸭绿江。

刚刚组建不久的人民空军，迅速转场东北，同美国空军展开了空中争夺战。

正当麦克阿瑟以傲慢的姿态鼓吹胜利在望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神奇地出现在朝鲜战场。首先，在博川以南对南朝鲜军队发动了进攻，接着将美军增援部队击败。志愿军的介入，使麦克阿瑟如坠云雾之中：他自信地认为，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志愿军不会超过60000人。于是，命令空军对鸭绿江上连接新义州和丹东的两座桥梁进行轰炸，以阻止志愿军继续入朝。

11月8日，79架B—29轰炸机和300架战斗机对鸭绿江上的大桥和我国的东北地区进行狂轰滥炸。

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投入的空军兵力共有14个联队，其中两个战斗截击机联队、3个战斗轰炸机联队、两个轻型轰炸机联队、3个中型轰炸机联队、一个海军陆战队航空兵联队、3个舰载机大队，各型作战飞机一千一百余架，其飞行员大部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此外，英国、澳大利亚、南非联邦在朝鲜战场上也投入了少量空军兵力，有飞机一百余架。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仅有新组建的两个歼击航空兵师、一个轰炸机团、一个强击机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尽管双方兵力悬殊，并没有动摇人民空军赴朝参战的决心。

1950年10月底，空军党委专门研究组织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问题。会议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地面部队，主要是以步兵和为数不多的炮兵、坦克兵参战，与拥有陆、海、空军相互配合的美国军队作战，制空权必然操在美军手中。这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行动极为不利。严重的形势要求志愿军空军必须迅速开赴前线，支援志愿军地面部队同美军作战。因此，我们不能等到练好再打，只能是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成长。

1950年12月，志愿军空军开始以大队为单位进驻前沿机场，进行实战练习，目的是取得战斗经验，揭开空战之“谜”，建立起战胜美军空军的勇气和信心。1950年12月4日，空军把进行实战练习任务最先交给了四师十团二十八大队。这个大队的飞行员都是来自陆军的年轻优秀干部，他们在东北老航校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学会了飞行技术。

飞过日制、苏制活塞式飞机，在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上也已飞了二十

几个小时，并且飞完了中队、大队编队和双机空战课目。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英勇作战的精神，他们在接受战斗任务后庄严宣誓，坚决打好第一仗，以战斗的胜利回答祖国的信任和人民的期望。

1950年12月21日，在师长方子翼、政委李世安率领下，二十八大队由辽阳驻地开赴安东浪头机场。他们到达浪头机述后，在友空军（指苏联帮助中国东北地区防空作战的空军部队，下同）帮助下制定了实战练习计划。

1950年12月26日，二十八大队进行了第一次战区航线飞行。当日，美机活动不很频繁，他们趁美机活动空隙，分两批出动，第一批4架飞机，第二批6架飞机，经安州、熙川返回安东，顺利地完成了熟悉战区地形的任务。

12月28日，美机没有大批出动，只有4架F—80战斗轰炸机窜入朝鲜新义州一带攻击地面目标。二十八大队按计划起飞4架米格—15歼击机迎战。起飞后，集合动作迅速，出航队形整齐。然而当接近美机时，由于经验不足，没肩发现目标而返航。以后几次出动均未与美机交锋。经过几次战斗飞行，飞行员们对战斗活动方法有了初步的体验。地面的组织指挥也有了一些进步。

方子翼师长带着几名参谋，在机场北端的山头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棚子，设立了指挥所。指挥所内部的设备非常简单，只有一部无线电台、一块标图板、一部电话机。这位经历过长征、在新疆学过飞行的人民空军师长，就这样开始了空战指挥的学习和实践。

1951年1月21日，美国空军出动F—84战斗轰炸机20架，沿平壤至新安州一线对铁路线进行轰炸，企图阻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供应。方子翼师长令二十八大队起飞迎击。大队长李汉率领飞行员吴奇、宋亚民、孙悦昆、李宪刚、张洪清、赵明、赵志财等迅速进入飞机座舱。2号机吴奇开车时，由于机械员忙中出错，过早地拔掉了启动车插头，造成飞机开车没成，遂改变战斗序列，以3号机宋亚民顶替2号机位置，原2号机吴奇、4号机孙悦昆未起飞，实际只起飞了6架飞机。他们以紧张而激动的心情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当李汉等人驾机到达宣川上空时，4号机张洪清发现右上方有2架美机一闪而过。他们警惕地保持着战斗队形，继续向安州方向搜索前进，快接近安州时，发现美F—84飞机正在1000米高度上对清川江江桥进行俯冲轰炸。李汉等驾机突然出现，美机有些慌乱。李汉率队乘机迂回到4架美机左侧400米处，他们很快瞄准美机长机开炮射击，将其击伤。3号机李宪刚、4号机张洪清亦先后向另3架美机开炮，因动作不稳没有命中。

这次战斗是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空军进行的第一次空战。飞行员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勇敢作战，取得了击伤美机一架的战绩，初步揭开了空战之“谜”。

初战的胜利，鼓舞着这个大队英雄健儿乘胜前进。

1951年1月29日下午1时许，志愿军空军前方雷达站发现，有一批美机在定州、安州上空5000米高度上盘旋活动，似企图袭击安州火车站和清川江大桥。志愿军空军第四师指挥所，立即给二十八大队下达起飞出击的命令。

大队长李汉率领8架飞机迅速飞向战区。1时40分，飞临定州以西，发现左前方有一批美机在活动。他们没有贸然冲上去攻击，而是利用阳光隐蔽，迅速迂回至美机后方，占据高度优势，进行仔细观察。原来是16架F—84，分为上下两层，每层8架，都是4架在前，4架在后，正在寻找对地面攻击

的目标，没有发现志愿军空军的飞机已经盯上他们。

李汉决定趁美机不备，攻击上层 8 架飞机，打它个措手不及。当美机活动到李汉机群右下方时，他立即发出命令：“二中队掩护，一中队攻击！”随即率领一中队右转下降，向飞在上层的 8 架美机猛冲过去。美机分成两个 4 机慌忙向左右转弯摆脱，李汉紧跟着左转的 4 架美机作了一个急转弯，顺势咬住一架美机，逼近至 400 米，按动炮钮，三炮齐射，当即将其击落。位于下层的 8 架美机企图反扑，担任掩护的二中队在副大队长李宪刚率领下，以猛烈炮火将其驱散。美机不战自溃，四散而逃。李汉率队追击，又击伤美机一架。战斗到此胜利结束，二十八大队安全迟航。

李汉和他的战友们的实践证明，美国的空军和他的陆军一样，在战场上是可以打败的。李汉是经过抗日战争锻炼的老战士，富有勇敢精神，在同期驾驶喷气式飞机的飞行员中，飞行技术属于佼佼者。在实战中他首开记录，创造击落美机的范例，不是偶然的。

第六章 鏖战在异国他邦

求战心切的飞行员违令起飞，年轻的空中健儿面临严峻考验

“空中坦克”驾驶员们56处的飞机安全返航

神话的破灭

美空军参谋长惊呼：“中共一夜之间变成了空军强国”

美国空军之星的陨落：我怎么会被飞行不到100小时的中共飞行员击中

二十八大队初战胜利，大大激发了志愿军空军指战员们的战斗热情。随后，四师十回二十九、三十大队和十二团的各个大队也先后进驻安东浪头机场，进行实战练习。

十二团的飞行员，刚从航校速成班训练9个月，飞行时间不足80小时，在米格—15喷气战斗机上飞行不足20小时，刚刚完成大队编队、双机空战课目。航空理论、飞行技术的基础很浅，凭这样的空中阅历和飞行技术，同老牌的美军空军作战，显然是太嫩了。

他们在完成地面教育和战区巡航后，于1951年2月8日开始战斗值班。前两天的战斗出动都很顺利。

2月12日上午，友军引导雷达将近航的我机误报为敌机，友军师长令紧急起飞8架截击。方子翼师长认为我机尚有4架在空中，命令十二团不要起飞。

三大队副大队长曲广文求战、立功心切，违令强行起飞，加上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和航行技术不熟练，在编队紧急盘旋上升中，4号机贾斌错位，与1号机曲广文相撞，机毁人亡。部队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曲广文积极求战精神可嘉，但违抗命令强行起飞是错误的；部队训练不足，飞行员驾驶技术太差，也是发生事故的因素；人的勇敢精神固然重要，但决不能忽视技术。

7月9日上午，十二团团长赵大海率8机协同友军到安州以南打击敌机。编队飞过安州，没有发现敌机。编队在肃川调头返航，赵大海发现在清川江口有一群B—29轰炸机正向黄海方向飞行。赵大海立即率队冲向敌阵。第一次进入，因为我机速度太快，还来不及瞄准就脱离了敌人的机群。这时，我们暴露了自己被敌发现了。第二次进入仍因我机速度过大而无法瞄准，赵大海不愿再次脱离，重新进入，便放减速板，企图减速攻击，结果被4架B—29集中火力击中，赵团长跳伞坠海牺牲。

赵大海曾经说过：“手上掌握着米格—15，还不打下几架B—29！”赵大海轻视敌B—29，贪功恋战，牺牲得十分可惜。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五次战役，把“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打退到“三八线”附近，并将战线稳定在这一地区。1951年6月上旬，双方转入战略相持。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相应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实行轮番作战，采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逐渐削弱美军。志愿军空军则抓紧时机参战，以求得战斗锻炼。

1951年7月10日，美方被迫同朝、中方面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方并无诚意，一面进行谈判，一面发动新的攻势。7月13日，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要求其空军“在此谈判期间，应采取行动以充分发挥空军威力和全部能

力”，企图从空中对朝、中方面施加压力。8月18日，美军发动“夏季攻势”，美国空军开始执行以切断朝鲜北部交通线为目标的所谓“绞杀战”计划，企图摧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略目标，卡断我方的后勤供应线。当时，侵朝美国空军增至19个联队，作战飞机达到一千四百余架，空中活动十分猖獗。

我志愿军空军经过了实战练习的第四师，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之后，由师长方子翼率领全师56名飞行员、55架米格—15歼击机，于1951年9月12日再次开赴安东前线。从9月25日起，同美国空军展开了激烈的空战。

清川江上的新安州大桥是连接前方和后方的咽喉要道，几条铁路和公路在这里汇合，运输车辆昼夜不停地从桥上通过，大批军用物资、粮食、药品通过这里运往前方。

美国空军把这一带列为对我轰炸封锁的重点，经常派飞机狂轰滥炸。新安州大桥几经破坏，几经修复。因此，保卫这一地区铁路和公路桥梁的安全，成为对保证地面战役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

志愿军空军深知保卫大桥的责任重大，时刻密切注视着美机的活动。9月25日下午，发现美机5批112架以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编成的混合机群，向新安州地区进犯。志愿军空军指挥所立即下令出击。

第四师十二团副团长李文模奉命率领米格—15歼击机16架，迎击美空军机群。当李文模率领空中编队飞至安州上空时，突然与二十多架美机相遇，相距仅1000米，已来不及区分兵力，就一齐投入了战斗。一大队大队长李永泰率先带领本大队冲向左下方8架F—84战斗轰炸机。美机见势不妙，慌忙四散逃去。这时，有两批8架F—86战斗机从左右后方袭来。李永泰驾驶飞机迅速左转上升，准备占位反击，不料被美机击中。僚机权太万冲过来将美机驱逐。李永泰驾着受伤的飞机，又向另一架美机扑去，可惜机械系统已被打坏，不能开炮射击。这时，4架F—86又向李永泰围攻过来，李永泰勇敢机智地与美机格斗，终于摆脱了美机的攻击，驾驶着中弹三十余发、负伤56处的飞机安全返回基地。这次战斗，李永泰虽然没有击落美机，但是表现了临危不惧，英勇顽强的气概。后来战友们给他起了个“空中坦克”的美称。

在李永泰、权太万与美机格斗时，5号机陈恒、6号机刘涌新奋不顾身地进行掩护。他们看到另一批美机6架向李永泰的飞机袭来，便勇敢地冲了上去。刘涌新发扬孤胆作战精神，与6架美机格斗，将其中的一架击落，首创志愿军空军击落美空军F—86战斗机的记录，后遭5架美机围攻，刘涌新被击落，壮烈牺牲。

9月26日，空军首长致电：第四师飞行员虽然都是新手，但敢于参加上百架飞机激烈空战，这就是胜利。尤其对飞行员的战斗锻炼，更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电报对李永泰驾驶中弹三十余发的飞机安全返回基地特别提出表扬。

继9月25日空战后，26、27日第四师又连续出动，同美空军展开激战。志愿军空军与友空军协同作战的行动使美空军的“绞杀战”计划遭到严重阻碍。

美空军对此大为震动。美国第五航空队宣称：“这三天战斗是历史上最长最大的喷气机战役，而且也显示了共产党的飞机与飞行技术已经改进了。”美空军承认“战斗轰炸机除了扔掉炸弹、四散逃命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因而被迫决定“战斗轰炸机以后不在米格走廊内进行封锁交通线的活动，此后只能对清川江与平壤之间地区内的铁路交通线实施攻击”。

1951年10月2日，毛泽东主席看到空军上送的关于第四师作战情况报告后批示：“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毛泽东主席的嘉勉和关怀，使参战部队受到鼓舞。10月份，第四师又连续打了6次大规模的空战，一次比一次打得好，尤其是10月5日和10日的两次战斗最为出色。这两次战斗，第四师共出动飞机80架次同美军空战。由于指战员们勇敢战斗，长僚机密切协同和战术动作有一定进步，共击落美机8架，击伤3架，而自己仅被击落一架。大队长华尤毅在10月10日的战斗中，抓住战机连续攻击，先后击落美机两架。在另一次战斗中，他的飞机被击中，左舱盖被打穿，手臂也中弹负伤，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坚持战斗，又击落击伤美机各一架。由于战绩突出，华龙毅荣立特等功。

10月20日，第四师奉命转回沈阳休整。从9月25日至10月19日，他们在24天的作战中，共战斗出动29批508架次，参加敌我双方二百多架飞机的大机群空战达7次之多，取得了击落美机20架，击伤10架的战绩。

在第四师奉命调回二线休整的同一天，第三师50名飞行员，驾驶50架米格—15型歼击机，在代师长袁彬、政治委员高厚良率领下开赴安东前线，担任掩护泰川一带新建机场和平壤至安东一线交通运输的任务。

11月18日14时许，发现美机9批184架，一部分活动于永柔地区，一部分进至安州、清川江一带，对铁路目标轰炸扫射。志愿军空军指挥所即令第三师起飞迎战。

14时24分，第三师九团副团长林虎率领16架米格—15歼击机起飞。当飞至肃川上空时，发现美国空军F—84战斗轰炸机二十余架，沿西海岸北飞。林虎乘美机不备，率领编队以突然猛烈的动作，从8000米高度俯冲下来，一举冲乱了美机队形，造成各个击破的有利态势。正当大家捕捉攻击目标之际，一大队大队长王海忽然发现左前方低空有六十多架F—84飞机在盘旋活动，有的正向清川江桥投炸弹，地面上冒起一股股浓烟，王海火急地发出“跟我攻击”的命令，便率本大队猛冲下去，从高度6000米降到1500米，对美机展开攻击。双方的飞机混在一起，美机虽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一时无法施展兵力。

王海充分发挥米格—15歼击机优越的垂直机动性能，忽而急速爬高，忽而急冲直下，经过几次上下冲击，使美机队形大乱。他们抓住有利战机，连续猛攻。王海和他的僚机焦景文，在五六百米的距离内，瞄准美机开炮，击落美机两架。4号机孙生禄发扬“刺刀见红”的精神，抵近美机，在300米距离用猛烈的炮火把一架美机打得凌空爆炸。

第三十九团在这次空战中，共击落美机6架，其中5架是一大队击落的。一大队打得积极主动，干脆利索，几分钟时间，接二连三击落美机，然后果断地退出了战。因为众寡悬殊，过分恋战很可能吃亏，这是他们精明的表现。这个大队在抗美援朝作战中，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空战八十多次，击落击伤美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王海大队”。

11月23日12时45分，我发现美空军F—86、F—84、F—80型飞机6批116架，高度7000米，向北窜犯。美机进至肃川和清川江地区后，战斗轰炸机降低高度，对地面铁路目标进行轰炸扫射。第三师七团由副团长孟进率领20架飞机升空作战。

当飞至肃川上空时，发现了北窜的F—84战斗轰炸机二十余架，经过激

烈空战，打退了美机的侵袭。第三师七团在这次战斗中，空中指挥员孟进能够区分任务，大部分飞行员保持了双机进攻，打得主动，攻得勇猛，使美空军在朝鲜的土地上又丢下7架飞机的残骸，护着一架负伤的伙伴，慌忙逃去。这次战斗中，一大队大队长刘玉堤创一次空战击落美机4架的记录。

12月2日、5日和8日，第三师又接连参加了3次双方达300架飞机的大规模空战，并且与美空军当时装备性能最好的F—86战斗机进行了战斗。由于全体飞行员作战勇敢，取得击落F—86飞机9架、F—84飞机4架，击伤F—86型战斗机两架的战果，并且初步取得了对F—86型战斗机作战的经验。飞行员罗沧海在12月5日的战斗中，创造了开炮距离340米、240米、145米，接连击落美机3架的近、准、狠的射击范例。

在志愿军空军的打击下，美空军在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的所谓“空中优势”受到了很大削弱。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1951年12月26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得不承认对交通线进行的空中封锁越来越困难了。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

第三师自1951年12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参战86天，共出动飞机2391架次，进行大小战斗23次。在战斗中，共击落美机55架，击伤8架，自己被击落16架，击伤7架。个人战绩突出的有：大队长赵宝桐、刘玉堤各击落击伤美机8架，大队长王海、飞行员范万章各击落击伤美机5架，飞行员焦景文击落击伤美机4架，团射击主任刘国民，飞行员刘德林、罗沧海各击落美机3架。

1952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看到空军关于第三师86天作战情况的报告后非常高兴，亲笔写下了“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这是毛泽东主席对空军部队的巨大勉励。

位于鸭绿江口外朝鲜西海的大、小和岛，是美军和南朝鲜的一个重要前哨阵地。在这两个岛及其附近的小岛上，驻有南朝鲜军队的“白马部队”及美国和南朝鲜的空军情报机关人员一千二百余人，部署有雷达、对空情报台和窃听设施，专门搜集朝、中两国的军事情报，并经常派遣特务潜入朝鲜北部西海岸地区活动。为了歼灭岛上的美国、南朝鲜特务武装，拔除岛上的情报机构，1951年10月底，志愿军总部决定以志愿军空军第二、三、八、十师各一部配合志愿军第五十军所属部队攻占这些岛屿。

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和志愿军第五十军首长一起商定了协同作战计划。计划确定志愿军空军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攻岛部队在集结地域不受空袭，对大和岛、小和岛进行航空照相侦察，摧毁大、小和岛上的情报指挥设施，轰炸大、小和岛附近海面的美国和南朝鲜军舰，配合地面部队夺取这两个岛屿。

11月1日，志愿军空军首长向参战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2日，志愿军空军出动飞机执行航空照相侦察任务。当日上午，第三师六回二大队起飞米格—15飞机4架，由副大队长汪永楼率领，执行侦察照相任务。当日中午，第二师四团起飞拉—11飞机4架，由大队长徐怀堂率领，对大、小和岛进行了第二次照相侦察。经过两次侦察，查明了岛上部署和工事情况，为地面部队登陆作战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11月6日，志愿军空军轰炸机部队在歼击机部队的掩护下，轰炸大和岛。这是志愿军空军轰炸机部队第一次执行战斗任务。当日下午，第八师二十二

团二大队图—2 轰炸机 9 架，由大队长韩明阳率领，从沈阳于洪屯机场起飞，携带爆破杀伤弹 72 颗、燃烧弹 9 颗，对大和岛进行轰炸。第二师四团一、二大队出动拉—11 歼击机 16 架，由副团长张华率领，从凤城机场起飞，与轰炸机会合后，担任直接护航。第三师七团出动米格—15 歼击机 24 架，负责警戒、掩护轰炸机部队执行任务。这次作战由于行动突然，各机种配合默契，未遭美机阻拦。轰炸机把全部炸弹投向大和岛上目标，命中率达百分之九十。

经过紧张的战斗准备，志愿军第五十军决定于 11 月 30 日 23 时攻占大、小和岛。为了扫清外围，11 月 29 日 23 时 15 分，第十师二十八团 10 架图—2 轰炸机从辽阳机场起飞，携带炸弹 54 颗，照明弹 33 颗，在大队长姚长川率领下，采用率机连续跟进的队形，前机投照明弹为后机照明的方法，对大、小和岛附近海面的美国和南朝鲜军舰进行轰炸。这是志愿军空军轰炸部队第一次在夜间执行战斗任务。由于缺乏经验，没有炸中目标，但是那里活动的几艘美国和南朝鲜军舰吓跑了。

11 月 30 日下午，担任主攻任务的志愿军地面部队在前沿岛屿做好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只待配合他们作战的轰炸机群采取行动，就发起总攻。

14 时 20 分，第八师二十四团出动 9 架图—2 轰炸机，由一大队大队长高月明率领，从沈阳于洪屯机场起飞，携带 63 颗爆破杀伤弹、18 颗燃烧弹，以大队纵队队形出航。在与担任直接护航的第二师四团团团长徐兆文率领的 16 架拉—11 歼击机会合后，编成联合机群，向大和岛上空飞去。

当联合机群刚刚飞入海面上空时，突然遭到美空军 30 多架 F—86 战斗机的偷袭，轰炸机编队的三中队左右僚机宋凤声机组、梁志坚机组当即被击落。

在这紧急关头，传来了地面指挥员第八师师长吴恺的命令：“坚决前进，完成任务！”联合机群在领队长机高月明的率领下，一面组织火力反击美机，一面冲破阻拦奋勇飞向目标。

轰炸机编队发扬大无畏的精神，每架飞机的射击员、通讯员都向美机开了炮。二中队右僚机两台发动机先后被击中起火，烈火和浓烟钻进了座舱，张浮琰机组顽强地驾驶飞机跟上编队，终因飞机失去操纵坠入海中，壮烈牺牲。

三中队的长机通信长刘绍基面部负伤，鲜血直流，仍然抱着机枪对准美机猛射，将一架美机击落，开创了以活塞式轰炸机击落 F—86 喷气式战斗机的范例。

此时，轰炸机编队已被击落 3 架，其余 6 架也有 5 架负伤，但在领队长机高月明沉着的指挥下，始终保持队形，继续前进。美机又扑了上来，一中队右僚机飞行员毕武斌驾驶的飞机多处负伤，在接近目标时，又被击中起火，他抱着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驾驶着燃着熊熊烈火的飞机，将炸弹投向岛上目标。终因飞机负伤过重而坠海，毕武斌机组成员光荣牺牲。其余的战友们于 15 时 21 分到达目标上空，把全部炸弹倾泻到大和岛上，美国和南朝鲜军特务部队的驻地变成一片火海。

在轰炸机的勇士们顽强地抗击美机一次又一次的凶猛攻击的同时，直接护航的拉—11 歼击机的飞行员们也进行了激烈的空战。位于轰炸机编队后方的攻击机和位于轰炸机编队两侧的直接掩护机队，在轰炸机编队周围 1000 米的范围内，一面与美机格斗，一面掩护轰炸机前进，直至轰炸机到达目标上空。他们充分发挥了拉—11 飞机灵活机动的性能和火炮的威力，勇敢地与在性能上占有很大优势的美国喷气式战斗机对抗。副大队长王天保眼明手

快，瞄准美机频频开炮，接连击落 F—86 飞机 1 架，击伤 3 架，大队长徐怀堂击落 F—86 飞机 1 架，副中队长王勇，刘卓生各击伤 F—86 飞机 1 架。美国空军大肆吹嘘的 F—86 “佩刀式”喷气式飞机，被志愿军空军老式的拉—11 活塞式飞机击落击伤，这是空战史上的创举。

志愿军第五十军攻岛部队于当晚乘船疾驶，迅速登岸，一举攻占大、小和岛，彻底捣毁了美国和南朝鲜特务部队的巢穴。

1952 年 2 月 10 日上午，美机数批先后侵入平壤、沙里院和价川地区，其中 F—84、F—80 战斗轰炸机两批 16 架，在 18 架 F—86 战斗机掩护下，轰炸军隅里附近的铁路线。志愿军空军司令刘震令第四师起飞两个团 34 架米格—15 歼击机，以第十团的 16 架飞机为攻击队，第十二团的 18 架飞机为掩护队，由第十团团长阮济舟率领，采取师编队“品”字队形，急速飞向战区。

当时，天空布满薄云，地面指挥员不时用无线电提醒空中编队：“加强警戒，注意搜索敌机！”飞行员们高度戒备，严密地监视着四周的天空。他们知道，在空战中谁能先发现敌人，谁就能争取主动。

在前进中，第十二团三大队队长张积慧发现远方的海面上空有一道道白烟，这表明有美机在活动。他立即报告了带队长机，并继续观察着美机的动向。这时，美机正利用云层隐蔽地接近志愿军空军机群，带队长机阮济舟果断地发出：“投掉副油箱，准备战斗！”的命令，张积慧和僚机单志玉投掉副油箱后，立即猛拉驾驶杆，爬高占位，准备攻击。当他们抢占到高度优势时，却失去了目标，自己也脱离了编队。一时找不到美机，他们就加大油门，追赶编队。张积慧和单志玉一边向前赶队，一边搜索目标。突然，张积慧从右后方的云层间隙中发现 9 架美机直窜下来，为首的 2 架已经猛扑到张积慧他们飞机的尾后。距离越来越近，很快就要到开炮的距离。张积慧提醒僚机单志玉：“注意保持编队！”然后猛然作了一个右转上升的动作，美机冷不防扑了个空。张积慧、单志玉趁机咬住了美机中的长机。美机见势不妙，拼命摆脱，先是急俯冲，后又向太阳方向作剧烈垂直上升，继而又转入俯冲。张积慧、单志玉双机始终紧追不放，步步逼近。第一次开炮因角度不对，未能击中。张积慧紧追到 600 米距离，将美机套进瞄准具光环内，进行第二次开炮。这次三炮齐发，将其击中。这架 F—86 飞机连同它的飞行员一起，坠毁在朝鲜博川郡青龙面三光里北面的山坡上。

张积慧击落美机长机后，迅速拉起，又攻击另一架美机。该机飞行员惊慌地做着不规则的飞行动作，极力摆脱。当张积慧逼近到开炮距离时，美机又突然作上升动作，张积慧也敏捷地作上升转弯，并从内圈切半径靠了上去，在 400 米距离上瞄准射击，一次开炮就把这架美机打得凌空解体，七零八落地向下坠去。

前后不到一分钟时间，张积慧在他的僚机单志玉紧密配合下，击落美机两架。

空战结束后，当地志愿军地面部队从美机残骸中找到了一枚驾驶员的不锈钢证章，上面刻着：第四联队第三三四中队中队长乔治·阿·戴维斯少将。这个戴维斯正是美空军所称“百战不倦”的、“特别勇敢善战”的“空中英雄”。

戴维斯有着飞行约 3000 小时的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参加战斗飞行 266 次。1951 年 8 月，美空军为了取得喷气式战斗机空战经验和增强空战力量，以轮换方式派遣一批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牌驾驶员到朝鲜作

战。戴维斯就是其中之一。

击落戴维斯，使这次空战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1952年2月13日，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一项特别声明中承认，戴维斯被击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美国国会议员为此又对朝鲜进行的战争争吵不休。戴维斯的妻子也向美国空军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志愿军空军首长致电各部队，表彰张积慧的功绩以及张积慧、单志玉长、僚机密切协同的战斗精神，号召全体指战员向他们学习。

美空军在历时10个月的空中“绞杀战”失败后，1952年夏季又采取“通过有选择地摧毁目标来达到从空中施加压力”的作战方针，将空中突击的重点从铁路交通线目标转向重要工业设施与城镇。6月1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侵朝美军制定的轰炸朝鲜北部水利发电系统的计划。6月23日，美国空军出动飞机300余架次，对鸭绿江上的拉古哨发电站进行突然袭击。

为了保卫重要发电设施，志愿军空军先后出动58批442架次，其中15批122架次与美军空战，击落击伤美机21架，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9月4日14时14分至50分，美空军出动一百余架次战斗轰炸机，在八十余架次F—86的掩护下，分东西两路向拉古哨发电站进袭。第三师七团起飞的16架米格—15飞机，在副团长孙景华的率领下，与利用云层隐蔽的32架美F—86飞机遭遇。带队长机果断地指挥全团投入战斗。他们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打得勇敢顽强，中队长杨文聪、魏双禄和飞行员郭晨光各击落美机一架，中队长严忠祥、张兆祥各击伤美机一架。七团也被击落击伤6架。虽然付出了较大代价，但阻止了美战斗轰炸机接近目标，完成了保卫拉古哨发电站的任务。

12月2日上午，美空军出动机群，企图侦察新义州机场和攻击清川江以南地面目标。其中16架F—86沿西海岸直窜铁山地区。志愿军空军首长令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团长郑长华率领16架飞机起飞打击该批敌机，激战中，击落美机两架。飞行员张道谦单机追击美机，迫使一架美机在慌乱中失事坠海。当日下午，美空军又出动一个机群，其中两批F—86继续进行侦察照相并间接掩护战斗轰炸机对清川江以南地区目标进行攻击。第三师九团由副团长王海率12架飞机起飞迎战，击落美机两架。

12月3日下午，美空军先后出动两个机群向北进犯。先出动的24架F—86窜至鸭绿江口活动时，第三师九团起飞的12架飞机与其遭遇，击落美机一架，自己无损失。当美空军后一个机群出动后，第三师九团两次出动12架飞机，采取奇袭方法直插平壤上空，打击F—86掩护机群。第十二师三十六团为第二梯队，支援九团作战。空战中，九团击落击伤美F—86各3架，中队长孙生禄在激战中飞机被击中光荣牺牲。孙生禄在这两天的战斗中，击落美机3架，连同以前的战果，共击落击伤美机7架。这位年轻的“空中突击手”为了战斗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生命。

12月5日，美F—86飞机6批36架窜至铁山、龟城地区，第十二师三十六团、三十四团，第四师十二团连续起飞34架飞机与之进行空战。第十二师技术检查主任鲁珉于1.2万米高度，发现F—86两架，他以敏捷的动作，全部将其击落。三十六团团团长王华清击落F—86飞机一架。在12月6日、16日、23日的战斗中，鲁珉又击落F—86飞机3架，创造了5次空战9次攻击，击落F—86飞机5架的战绩。鲁珉被空军政治部授予“打F—86能手”的称号。

1953年4、5月间，美国空军在不断轰炸破坏清川江南北铁路干线的同时，开始轰炸朝鲜北部产稻区的水库，企图达到淹没农田，破坏朝鲜北方经济的目的。在此期间，美军调来一些飞行时间达1000至2000小时的所谓“王牌驾驶员”，组成“猎航组”，或隐蔽万米高空云上，或设伏在机场附近山区上空，偷袭志愿军空军正在起飞或着陆的飞机。最初，志愿军空军由于疏于戒备，曾吃过几次亏。后来加强了对起飞着陆的警戒和掩护，扭转了被动局面，粉碎了美空军的企图，并在一次空战中将美空军“猎航组”的“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击落。

4月7日下午，第十五师四十三团的12架米格15C型飞机，在楚山、碧潼地区与美空军F—86机群空战后返航。他们在大堡机场上空散开了队形，减低了速度，依次着陆。飞行员韩德彩和他的长机张牛科在掩护战友们安全着陆后，双机拉开距离，也准备着陆。当下滑至高度1000米时，耳机里传来了地面指挥员的命令：“拉起来！快拉起来！有敌机！”韩德彩听到这个急促的口令，立即拉起机头并稍压坡度，向四周搜索。他盯着远处飘动着的白云，竭力想从云团中和云团边寻找美机的踪迹。突然看到左前方有2架飞机，一前一后，以大坡度向左转弯，好像是在编队飞行。韩德彩感到奇怪：本团的飞机除了他和张牛科以外，其余都安全着陆了，这2架飞机从哪里来的？他立即警觉起来，密切注视着这两架飞机的动向。距离渐渐地缩短了。韩德彩终于看清，前面一架是友机，后面一架是美机，美机正在攻击前面的飞机。友机竭力摆脱，美机紧追不放。

韩德彩见此情景，恨不得马上冲上去，以解友机之危。但是此时，他与美机尚有一段距离，不能开炮射击。正当他准备加大速度占位攻击时，美机却停止了对友机的追击，一侧机身，趁势咬住了右前方正在下滑着陆的张牛科的飞机。韩德彩立即向张牛科报警：“3号，3号！，拉起来，拉起来！敌人向你开炮了！”可是，已经躲不及的张牛科，飞机猛烈颤抖了一下，机尾冒出了一股烟火，而美机仍然咬住不放。为了援救战友，韩德彩不顾自己飞机的油量警告灯已经闪亮，加大油门，迅速推杆，下滑增速，冲向美机。美机见势不妙，立即放开张牛科的飞机，慌忙逃走。摆脱了美机威胁的张牛科，沉着地操纵负伤的飞机，安全降落在机场上。

这时，空中只剩韩德彩和被它追击的那架美国飞机了。眼看就要追到开火距离，美国飞行员慌了手脚，突然来个下滑右转，企图逃跑。韩德彩刚准备推机头，下滑追去，突然想到：美机在低空下滑，不可能做剧烈的机动，于是他没有跟着追下去，而是轻轻地拉了一下驾驶杆，上升了一点高度，保持居高临下的优势，紧追不放。美机下滑摆脱不成，又猛地向左上方拉起，韩德彩眼明手快向左方截击。美机又改向右转弯，韩德彩也迅速地向右压坡追了上去。距离迅速靠近，韩德彩熟练地操纵飞机，将美机套进瞄准具的光环，当逼近大约300米时，他按动了炮钮，一阵猛烈的射击，将这架美机击落。

美国飞行员在他的飞机被击中的瞬间跳了伞，跌落在距机场不远的一个山坡上，被当地高炮部队活捉。他就是美国空军第五十一联队上尉小队长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

在美国空军里，击落5架飞机的飞行员称“王牌驾驶员”，而费席尔据称已是“双料王牌驾驶员”。4月9日，美联社从汉城发出一条消息，宣布说：美国“第一流的喷气式空中英雄”，“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爱德

华·费席尔在4月7日作战中“失踪”了。

费席尔被俘后，这位美国“空中英雄”、“王牌驾驶员”对于他的被击落很不服气，一再要求见他的对手。志愿军空军领导满足了他的要求。韩德彩英姿焕发地走来，志愿军空军部队首长向费席尔介绍说：“这就是击落你的中国飞行员”。

费席尔把韩德彩上下打量一番，双肩一耸，摇晃着脑袋说：“对不起，长官先生，我不愿意开这种玩笑。……要知道，我是美国空中英雄，怎么可能是这个青年打下来的？”志愿军空军首长严肃他说：“我们也不想开这种玩笑。他的确很年轻，只有20岁，在战斗机上总共飞行不到100小时，但是，他凭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英勇战斗，终于把你击落了！”费席尔听了这些话，顿时膛目结舌，说不出话来。

志愿军空军在参战期间，总共战斗起飞2457批26491架次，实战366批4872架次，有373名飞行员开过炮，212名飞行员击落或击伤过敌机。总共击落美国空军、海军和参与侵朝战争的其他国家空军的飞机330架，击伤95架。年轻的志愿军空军也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在整个抗美援朝作战中，他们被美国空军击落飞机231架，被击伤151架，共牺牲空勤人员116名，其中有赵大海、孟进等正副团长8名；张维清等团勤务主任3名；牟敦康等正副大队长9名；孙生禄等正副中队长14名；范万章、毕武斌等飞行员和其他空勤人员82名。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中国空军的光荣战史。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英勇献身精神，永远值得人们纪念和学习。

第七章 保卫海空显神威

上海被炸，福州被炸，杭州被炸……

保锡明放弃跳伞念头，带伤操纵着火的飞机安全着陆
偷鸡不成蚀把米，为蒋介石“连任总统大典”献的礼
是训练空域还是葬身之地

1950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在美国人的唆使下，利用台湾、定海、岱山等军事基地，从空中和海上对我华东各大城市、重要交通线，特别是上海地区，进行轰炸封锁及其他破坏活动。

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党空军出动17架B—24、B—25、P—38和P—51组成的混合机群，分4批轰炸上海，投弹六十余枚。在此次轰炸中，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和闸北水电公司受到重大破坏。全市被炸房屋两千多间，死伤居民一千四百余人。2月12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召开高级军政长官会议，决定扩大对我上海及其他城市的轰炸。继上海之后，广州、福建、杭州等地也遭轰炸，伤亡八百五十余人。

上海遭到大规模的轰炸后，中央军委紧急部署要地防空，于2月8日急调在防空学校受训的高炮十七、十八团驻防上海。由于依靠少数高炮部队难以遏制国民党空军的进袭，聂荣臻致电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建议请苏联帮助解决防空问题。军情火急，毛泽东很快和斯大林就此问题达成协议。2月以后，苏联空军巴基斯中将率领一个混成航空兵集团抵达上海，南京、徐州等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苏联空军击落5架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一架国民党空军的B—25型轰炸机在空中遭到截击，迫降于我某地机场，机上飞行分队长等6名空勤人员全部被俘。

四十多年后，曾参加上海防空作战的苏联二十九近卫歼击航空兵团的飞行员沙尔费耶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回忆当年保卫上海的经历：

当时国民党空军正在对上海进行频繁轰炸。为保卫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我们全团奉命出击。团里大部分人乘坐火车，而飞行员则驾驶战机来到上海附近的大场机场。国民党空军空袭上海使用的是美制重型轰炸机。他们在城市上空为所欲为，无所顾忌。米格机在华东天空的出现，大出乎他们的预料，使他们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打击，最初几天就有3架轰炸机被击落。此后，国民党空军白天的空袭停止了。一周之后，他们改为夜间出动，但也没有得逞，仍被击退。我们团的飞行员实力很雄厚，大都参加过卫国战争，许多人还获得过战斗勋章。从此以后，国民党的飞机渐渐消声匿迹了。

随着解放军空军歼击航空兵的建立，苏联空军分批回国。1950年10月19日，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开始担负上海的防空任务。在沿海地区，也逐步建立了防空雷达网，并增加了高炮部队的部署。

解放军空军初建时期，由于兵力不足，并主要用于朝鲜战场，对沿海的防空难以全面顾及。福建、粤东在没有航空兵驻扎的情况下，只能依靠高射炮来对付国民党空军的进攻。

双方刚开始交手的时候，装备陈旧、缺少雷达保障的解放军高炮部队的战果甚微。为扭转被动的局面，解放军随即加强了高炮防空战术的研究，部队战斗力稳步提高。1952年3月22日，国民党空军的两架F—51型战斗机飞到汕头机场西南上空，准备实施侦察。我高炮部队立即开火，一架F—51被击坠海。

12月27日，驻厦门的高炮部队再传捷报，将一架来袭的F—47击落。

1952年8月，空军第四军军部组建，驻扎上海，统一了对上海地区空军部队的作战指挥，扩大了歼击机作战范围。1952年9月20日5时36分，防空警戒雷达在上海东南33公里处发现美B—29轰炸机1架，高度1500米，直逼上海。空军第二师六团立即起飞2架米格—15歼击机截击，长机飞行员为何中道，僚机飞行员为李永年。他们在指挥所引导下飞至崇明岛上空，在左后方发现美机。美机先用机枪开火射击，何、李双机转弯绕到美机尾后进行攻击，从高度1500米打到200米，先后开炮4次，将美机击落坠海，取得了空军执行空防任务以来的首次战果。

1952年底，国民党空军加紧了对祖国大陆的袭扰活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特别关注上海的安全。1953年2月4日，毛泽东指示担负上海防空作战的部队均需提高警惕，加紧整顿，准备随时对敌作战，确保上海一带的安全。驻沪防空部队立即行动，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

1953年7月25日，国民党空军出动F—47型和F—51型战斗机进袭上海。驻沪防空部队起飞多架米格—15和拉—11型战斗机迎击敌人。歼击航空兵二师的宋中文和杨宝海驾机飞至奉贤以南10公里上空，与两架敌机遭遇。空战两个回合后，敌机力不能支，分头逃窜，杨宝海随机应变，各追一架。宋中文击落一架，杨宝海击伤一架敌机。

朝鲜战争结束后，由于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存在，进攻台湾的时机仍不成熟，双方继续展开激烈的海空较量。经过抗美援朝战火的洗礼，解放军空军羽翼渐丰，至1953年底已拥有飞机三千余架，战斗实力跃居世界第三位。解放军海军虽然较国民党海军处于劣势，但也具有一定的战斗力。考虑到海峡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和其他因素，中央军委决定“力量向前伸”，首先解放浙东沿海国民党占据的岛屿，并确定了从小到大、逐步进攻、由北向南的方针。

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战斗首先从夺取制空权开始，主战场选在猫头洋渔场和三门湾海区。为了打击国民党海军和空军的袭扰，我海军航空兵于1954年初进驻浙东沿海前线。

在夺取制空权的战斗中，我海军航空兵二师成为一支主要战斗力量。当时，海航在华东兵力很少，驻上海的一师只有装备图—2水鱼雷轰炸机的一回和装备拉—11战斗机的四团。而新建的二师仅有一个六团。六团原为空军十七师五十一团，1953年12月调归海军，该团曾在朝鲜击落美机11架。六团于1954年2月进驻宁波后，即投入紧张的战备工作。

1954年3月18日，华东海军8艘舰艇出海巡航。中午，国民党6架F—47又向我巡逻艇发起进攻。首先以2架飞机吸引我舰队的注意力，另外4架则利用背向阳光方向，实施轰炸，在25分钟的轰炸中，一架F—47被艇炮击伤，而我巡逻艇也有两艘受伤。

海上舰艇连遭轰炸，舟山基地紧急要求海军航空兵支援。驻宁波机场的海航二师六团仅有25架米格—15型战斗机，大部分已起飞迎击国民党空军其他来犯的飞机。为解燃眉之急，宁波机场指挥所权衡利弊，决定以攻为守，派副大队长崔巍、中队长姜凯驾机奔赴战区。这两人都在朝鲜同美国空军交过手，具有较丰富的经验。

崔巍、姜凯迅速飞抵南田上空，在空中搜索盘旋两周后没有发现目标。地面指挥人员通报：“敌机就在你的前方。”两人再次搜索，发现目标后紧

追不舍，快要到达大陈岛上空时立即开炮射击。敌机这才发现有追兵，迅速转弯，企图逃脱。但崔巍紧咬住一架不放，将其击毁，坠入海中。飞在后面的两架 F—47 迅速向崔巍逼近，企图趁其不备发起攻击。担任僚机的姜凯立即扑过去，保护崔巍，迫使对手放弃了攻击。姜凯随即咬住一架，在距 460 米时开炮，将其击毁。另外两架不敢再战，赶紧逃之夭夭。此后，国民党空军五十多天没有露面。

南田一战，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旗开得胜，创下了首歼敌机的战绩。早在海军创建时，周恩来就毅然决定建设海军航空兵，并拟定了向苏购机的方案。毛泽东完全赞同，亲笔批示：“照周批办。”海航首战告胜，初步显示了这个新兵种的神威。战后，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打电话表示祝贺。海军司令部授予崔巍和姜凯每人一座银盾，并各记三等功一次。

南田空战之后，为加强兵力，保证飞机延伸作战，海航调一师四团一大队转进宁波机场，航二师在指挥舰上设立了对空作战目标引导组，华东防空军也在南田岛上设立了雷达站。

为了保证正常的渔业生产，华东军区海军在浙江宁波召开护渔作战会议，确定了以艇队为主、护卫舰和航空兵视情前伸的护渔作战原则。根据会议的部署，“广州”、“开封”号护卫舰由上海驶往舟山定海，与“瑞金”、“兴国”两舰和巡逻艇一道同国民党海军展开角逐。在两次海战中，首先将国民党海军的“永”字号扫雷舰和“太”字号护卫舰击伤。

5 月 11 日上午，两架国民党空军的 F—47 突然出现在大陈岛上空。敌机远离宁波机场 200 公里以外，意图一时难以判断。宁波指挥所为防止敌机侦察袭扰，决定派飞机远距离南伸歼敌。

接到命令后，海航二师六团中队长保锡明和飞行员董世荣立即起飞。双机飞到大陈岛西南 15 公里时，董世荣首先发现目标，保锡明随即下令攻击。董世荣在 400 米外开炮将其击伤。敌机飞行员见座机受伤，赶紧作规避动作，利用其飞机低空性能好的优势，躲过董世荣的 6 次炮击，带伤逃跑。

在同一空域，保锡明也与一架 F—47 展开激烈的空战。他利用米格—15 飞机速度大、垂直机动性能好的优势，始终咬住对手。敌机飞行员使出浑身解数也未能逃脱米格机的追杀。保锡明连开 7 炮，终于将敌机击落海中。

保锡明击落敌机后，在上升转弯脱离时，突然遭另一架 F—47 偷袭。在敌机的射击中，保锡明的座机连中两弹，保锡明的右臀受伤。在人机受伤、座舱内烟火弥漫的情况下，保锡明抛掉座舱盖准备跳伞。失去舱盖后，舱中的烟雾散尽，保锡明得以看清情况。这时，他放弃了跳伞的初衷，决心驾驶飞机飞回去。地面指挥员也鼓励他：“注意油量，坚持飞回来。”保锡明把飞机拉高到 7000 米，改为平飞。他不顾伤口流血，坚持飞向机场。当他驾驶飞机落地时，机上油料就要用完了，操纵也已失灵。飞机落地后，保锡明即晕倒在座舱内，身上满是鲜血。

5 月 15 日，国民党空军两架 F—51 战斗机借着复杂气象的掩护，经大陈、檀头山向象山浦北犯。这时，距解放军向东矾列岛发起总攻只有一个半小时了。为了保证登陆船只和兵力的安全，宁波指挥所命六团副大队长宋国卿、中队长常化臣双机起飞升空，到小鹅冠一带海域拦截。

两架米格战机飞抵战区上空后，立即降低高度搜索敌机。飞机降到 800 米高度时，宋国卿发现两架敌机正迎面飞来，他抢先占领有利位置，连开数炮，将其中一架击落。在空战中，僚机常化臣紧随长机，挫败了另一架敌机

的偷袭企图。

宋国卿双机空战获胜，掩护了攻岛兵力的顺利展开。当晚，登陆部队在舰艇和飞机的掩护下，顺利进占头门山、田岙、蒋儿岙等岛。

解放军攻占东矾列岛后，国民党军连续出动舰艇、飞机进行反扑，海上战斗更加频繁。5月17日夜，经过三天战斗的“瑞金”和“兴国”两舰由田岙去石浦补充弹药。18日早晨，两舰装弹完毕，快速返回战区。两舰驶抵草鞋屿海区附近，突然发现蒋儿岙上空有4架敌机飞来。随着警报声，舰上大小炮火一齐摇向空中。“瑞金”舰继续航行，“兴国”舰右转出列，摆成防空阵形，两分钟后，4架F—47空临，一面用机枪扫射，一面将高度降到50米，贴着海面，鱼贯向“瑞金”舰实施超低空轰炸。

虽然两舰的炮火在空中爆响，但未能阻止敌机的轰炸。第一架F—47呼啸着投下两枚炸弹，海面上立即腾起水柱。紧接着，第二架F—47也俯冲下来，两枚炸弹炸中“瑞金”舰的左舷，该舰当即操纵失灵，后又被两枚炸弹命中右舷，逐渐下沉。这架敌机也被击落坠海。

国民党空军击沉“瑞金”舰后，继续出动飞机搜寻解放军舰艇，企图扩大战果。当天下午，国民党空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再次派飞机飞往战区。4架F—47在大陈、一江山一带活动，企图引诱解放军飞机南伸作战，掩护经渔山飞来的另两架F—47偷袭舰艇。

海航宁波指挥所洞察了敌人的企图，命令王万林、宋国卿双机飞至南田、头门山上空，钳制大陈、一江山一带上空的敌机。掩护宗德峰、尹宗茂双机拦截经渔山飞来的两架F—47。宗德峰、尹宗茂起飞后，急奔南韭山、六横岛空域。根据设在军舰上的目标引导组的通报，很快捉捕到目标。尹宗茂迅速接近敌长机，相距500米时开炮将其击落。宗德峰随即和尹宗茂一起向另一架F—47轮番攻击。这架敌机见势孤力单，赶紧降低高度夺路而逃。

5月19日，国民党空军为了给翌日举行的蒋介石“连任总统大典”献礼，于中午出动8架F—47战斗轰炸机，准备轰炸高岛、头门山和附近停泊的舰艇。F—47机群飞抵海门以东20公里处分成两批，其中一批4架飞向渔山。

敌机将至，驻宁波的六团立即起飞4架米格—15升空拦截。王万林、宋国卿双机飞到头门山上空正好和4架敌机打了个照面。王万林立即下令攻击，同时呼叫宗德峰、尹宗茂双机前来助战。

国民党空军的4架F—47降低高度，正要向头门山停泊的华东海军舰艇发起攻击，突然发现了从天而降的米格战斗机。当时，附近的渔山驻有国民党军，周围海面也有国民党海军的舰艇在活动。为了取得舰岛人力的掩护，F—47放弃攻击，从云上飞到云下。王万林双机穷追不舍，不顾海上国民党军舰的炮火，紧紧咬住目标。

正在追击的王万林见宗德峰双机也已赶到，便把飞机拉起，在高空指挥攻击。他不时提醒大家：“天气不好，注意高度，靠近些再打。”宋国卿首先投入攻击，将一架F—47击落。敌机队形立即变得散乱，携带的炸弹也扔进海里。王万林随后也向敌长机发起攻击，距离400米处开炮将其击伤，然后又重新占位，将受伤敌机击落。王万林曾在朝鲜击落过美国空军的F—47战斗轰炸机。此次空战，他再露锋芒。

空中战斗正酣，海面上的国民党军舰也全力开炮，对米格机构成了很大威胁。尹宗茂击落一架F—47后，为躲避舰炮火力，急将飞机降到100米以下的超低空，安然撤离。片刻之后，3架F—47葬身海底，余下的一架也难

以招架，被宋国卿击伤南逃。

六团节节胜利，战果辉煌，对同驻宁波机场的四团一大队是个很大的激励。该大队求战心切，大队长周克林多次到指挥所请战。指挥所考虑到国民党空军连遭打击后，有规避与米格战斗机作战的趋势，而四团一大队装备的是拉—11型螺旋桨战斗机，如参加战斗有可能诱敌人上钩，以夺取新的胜利，因此，指挥所命令一大队作好战斗准备。

6月3日，国民党空军出动2架F—47到大陈至高岛一带进行侦察活动。发现敌情后，指挥所即令周克林率杜九安、刘良扬、任旭利出击。为防意外，确保空战胜利，随后又令六团宗德峰、尹宗茂驾驶米格—15隐蔽出航，在高空掩护四团一大队作战。

拉—11机群飞至小鹅冠以北5公里处与敌机遭遇。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见对于是螺旋桨飞机，以为有便宜可占，立即猛扑过来。在空战中，任旭利飞机尾翼中弹，周克林迅速增援，将进攻任旭利的敌机打得冒烟而逃。杜九安也向敌长机发起攻击，并击中其右翼。周克林和刘良扬也连续向这架敌机射击，该机被炸得拖着黑烟坠了下去，在接近海面时炸成碎片。在高空盘旋的宗德峰双机目睹拉—11获胜，立即向一大队飞行员表示祝贺。

此次空战后，国民党空军变换战术，采取隐蔽手法，同解放军展开周旋。7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4架F—47，企图偷袭定海海军基地。驻宁波机场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起飞8架米格—15战斗机迎敌。解放军空军航三师大队长李瑞仿率领飞行员丁品贵、周乃、宋有臣升空后，在舟山以南截住敌人，展开攻击。国民党军飞机见势不妙，扔下炸弹，采取单机跟进的圆圈防御战术，互相掩护，且战且退。空战持续17分钟，李瑞仿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

从1954年3月到7月，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浙东前线部队共击落敌机10架。击伤4架，自己仅轻伤3架，夺取了150公里半径的战区制空权，为解放军继续南伸作战、攻击一江山诸岛创造了条件。

1954年7月，考虑到国际形势、台湾海峡两岸斗争等多方面的因素，毛泽东再度关注台湾问题，指示周恩来：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立即采取行动。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8月1日，朱德在建军节讲话中也强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重申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时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歌曲唱遍整个大陆。

1954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福建前线，为了打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制止国民党军对东南沿海的袭扰，在美蒋预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期间，对金门国民党军实施惩罚性打击。9月3日，福建前线炮兵对金门发起炮击，摧毁炮兵阵地7个，击沉炮艇、拖轮各一艘，击伤舰艇3艘，击毁水上活动码头一个。

金门遭到炮击后，国民党军立即出动飞机进行报复。当时，解放军空军尚未入闽，福建防空力量非常薄弱，福州、厦门在敌机的轰炸中损失很大。叶飞向中央军委要求加强福建前线的防空兵力，从北京急调一个大口径高射炮团，部署在福州、厦门两地。在高炮火力的反击下，国民党空军亦付出相当大的代价。9月4日到30日，解放军高炮五二一团在厦门地区就击落敌机

12架，奇伤33架。11月1日，国民党空军上校大队长陈康也被击落殒命，人们看到，他那架飞机残翼上还标着“银空猎犬”的字样。

在突出宣传“解放台湾”的同时，与之相关的一些军事工程也加快了进度。福建除了修筑厦门海堤外，鹰厦铁路和多处空军基地也先后开工。仅修建鹰厦铁路就调集了7个师的铁道兵部队，另有10万民兵配合。

福建一系列军事工程的相继上马，使台湾当局惊恐不安。蒋介石接见美国远东司令派楚琪，决定“强化空军，应付共方威胁”。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也叫嚷“要及早摧毁共军修建的空军基地”。从1955年初开始，国民党空军连续出动战斗轰炸机破坏我沿海地区的国防工程建设。由于我方为国防工程运送物资的船队经常在汕头港和沙埋停泊，两地又距台湾空军基地较近，所以成为国民党空军袭扰的重点目标。

1955年元旦，国民党空军的两架F—47型机和两架F—84型机先后飞到汕头上空侦察。担负汕头防空任务的中南海军高炮独立二营严阵以待，发现目标后猛烈开火，将其中的一架F—47击落。

1月14日和18日，国民党空军F—84机两次侦察汕头港和汕头机场。这一举动，引起了高炮独立二营的警惕，判断敌机将向汕头发起新的攻击，于是连夜作紧急战斗动员，并重新配置了兵力。

1月19日，国民党空军果然大规模空袭汕头港。早晨6时50分，两架F—47和两架F—84战斗机逼近澄海，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在高空盘旋扫射，吸引高炮部队的注意力；另一路绕过汕头，从桑浦山扑向港口。二营的37毫米高炮立即开火，将其中一架敌机击落。

中午时分，12架F—47又飞临汕头上空，从不同高度和不同方向向高炮阵地和港内舰船狂轰滥炸。二营集中炮火反击，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并将其余敌机逐退。

半个多小时后，一架RT—33型侦察机又出现在黄冈上空，进行侦察，并重新选择轰炸目标。

14时，16架F—47分3批，以梯次队形对海军码头和港内商船俯冲投弹。地面高射炮兵全力开火射击，击落击伤敌机各3架。在敌机的轰炸中，港内的南海163号轮中弹受损，三艘驳渡船被炸沉，死伤20人。英国商船“正伟健”号也被炸沉，船上六十多名船员经海军战士抢救全部脱险。对此，船长勃克一再向驻港海军表示致敬。

除汕头港以外，福建沙埕港的战斗也很激烈。沙埕港位于闽东北，与浙江省毗邻。当时，福建正修建福州、龙田、惠安机场和鹰厦铁路，需要大量的物资，其中大多是从上海海运过来的。由于国民党军占据着闽江口外一些岛屿，运输船队为了避免来自地面和空中的袭击，白天停靠在沙埕，夜间才通过闽江口驶往马尾。沙埕港湾三面环山，已山势陡峭，非常有利于规避敌机的袭扰。

为保卫上海至福建一线运输船队的安全，海军航空兵部队也参加了战斗。1955年3月底，海军航空兵四师进驻路桥机场，担负从大陈到沙埕一线的防空任务，航一师四团一大队也转至路桥机场，归海航四师指挥，担负低空侦察、巡逻任务。为了保证部队南伸作战，海航四师在沙埕设立了指挥所。

考虑到沙埕港的重要位置和作用，华东海军高炮五团亦于4月份进驻沙埕。该团装备有日式75毫米高炮16门、苏式37毫米高炮12门，以及部分高射机枪。

1955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4架F—47战斗轰炸机袭扰沙埕。海航四师十团萧广、程开信驾驶米格—15升空拦截，萧广击伤一架敌机。

十团原为志愿军空军十七师四十九团，曾击落美机13架，完成了保卫鸭绿江大桥的防空作战任务。朝鲜停战后，改编为海航四师十团。该团在同国民党空军的较量中屡次获胜，成为令对手胆寒的一把尖刀。美国侵越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命令这个团紧急转赴海南岛，打击入窜的美国空军飞机。十团名不虚传，先后击落3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和一架F—104战斗机。1965年，国防部授予该团“海空雄鹰团”的光荣称号。

海航四师十团虽然将来犯之敌击伤一架，但也认识到海上低空作战的艰巨性。于是，加强了低空训练。米格机来往穿梭，弄得国民党军十分恐慌，他们所占的岛屿上警报声不时响起。国民党空军也改换了机型，主要使用F—84战斗轰炸机，同我空军较量。

6月27日上午，国民党空军再次出动F—84机群进犯沙埕。为了迷惑解放军，采取了主攻与佯攻结合的战术。4架F—84自台北起飞后，保持12000米的高度，以吸引解放军的注意力，另外2架则从大陆雷达盲区隐蔽北上，准备偷袭沙埕港内停泊的运输船队。

海航四师发现高空中的4架F—84后，立即令十团团长江文清率刘春化、王鸿喜、葛长泰起飞迎敌。江文清机队飞抵台山列岛南20公里时，设在沙埕港的前线指挥所已发现另2架F—84，急令江文清迅速予以拦截。空中4架米格机立即回航，在台山列岛西北10公里处发现了偷袭的敌机。江文清迅速率队发起攻击，王鸿喜咬住其中一架，在相距533米时开炮射击。敌机当即起火爆炸，飞行员跳伞，飞机残骸坠落在台山列岛东南15公里处。另一架F—84急降高度，在离海面70—100米高度盘旋，江文清抓住有利战机将其击落。高空中的4架F—84见调虎离山之计未成，急忙掉头飞回台湾。

江文清机队大获全胜，海航四师指挥员分析对方可能派机救护坠海的飞行员，于是命令十团大队长王昆率领4架米格—15到台山列岛附近搜寻猎物。王昆是海航的一位空战高手，曾在朝鲜击落过美军的F—86，作战经验十分丰富。机群飞近马祖后，飞行员开始认真搜索。3号机程玉升首先发现了左下方一架PB Y型海上巡逻救护机，随即连续向其射击4次，但均未命中。王昆估计程玉升的炮弹即将打光，遂令周志高驾机掩护其返航，自己则率徐富根扑向敌机。王昆一阵炮火，迫使敌机向马祖逃去。王昆毫不迟疑地从2000米高空追到距海面只有70米处，开炮将敌机击落。王昆将飞机拉起时，高度表的指针已指向“0”的位置，喷气尾流射入海水，激起一股浪花。

7月3日夜，海航四师指挥所获悉国民党空军将在次日16时30分派飞机4架F—84袭击沙埕后，决心隐蔽出航，打一次空中伏击战。第二天16时许，海航四师领航主任陈泰渠率4架米格—15起飞。不久，发现两架F—84，陈泰渠正准备攻击，突然又出现两架F—84，即将形成对自己咬尾之势。在此形势下，陈泰渠改变主意，转身向尾随的敌机发起攻击，将其中一架击伤，另外两架F—84放弃袭击沙埕，逃回台湾。

1955年7月，福建空军基地第一期工程顺利结束，形成了对台作战的更有利的势态，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对此作了专门的报道：

共军在汕头与福建两地所建立新型喷射机基地，现已至完成时期，其附设之各种新设备已可启用。此两基地之完成，对我金、马两岛和台湾已产生严重威胁。共军于数月前，又于福建境内添建泉州之沙埕，福清之龙田、漳州莆田之石笏等处巨型喷射机基地，以上

各基地完成之期也在不远。等到这几处基地完成后，共军空军即形成对台湾侵略的包围态势。

对于福建空军基地取得顺利进展，国民党方面既无可奈何又不愿善罢甘休。国民党空军拿出当时的王牌：F—86 佩刀式战斗机，企图改变战局。其机群不断袭扰沙埕等处目标，并扬言要用佩刀式封锁天空。

1955 年底，福建国防施工第二期工程开始，国民党空军的袭扰活动更加频繁。12 月 13 日下午，解放军雷达发现两架 F—86 战斗机和 4 架 F—84 战斗轰炸机袭来。海航四师指挥所分析敌机可能要对三都、沙城进行轰炸，随令王昆率 4 架米格—15 战斗机飞往战区拦截。编队飞到沙埕上空，指挥所通报：“东南 30 公里有敌 F—86 4 架、马祖南有 4 架，高度 5500 米。”王昆率领编队飞至福瑶岛上空，发现并击落一架 F—86。王昆见空中无其他敌机，便奉命返航，不料，其余的国民党空军飞机却趁机隐蔽攻击，炸伤了港内的“振兴号”商船。

12 月 16 日中午，国民党空军出动 8 架 F—84，再次攻击沙埕港。其中 4 架距离沙城 50 公里时，突然升高到 8000 米穿越沙埕，向西北方向飞去。另 4 架低空快速临近沙埕后，折向东南，绕至东北镇下关投弹扫射。驻沙埕的高炮五团，在此之前已击落过 F—84 飞机，积累了作战经验。他们见敌机分批飞来，指挥员判断两批敌机有可能相互配合，向港年舰船发起攻击。于是，命令部队严密监视。轰炸完镇下关的 4 架 F—84 改为两组双机，一组在高空佯动，吸引高炮火力，另一组降低高度，向高炮、雷达阵地俯冲扫射。一架 F—84 在密集的火网中起火坠毁。

高炮五团指挥员命令各分队可以自行射击敌机。不一会儿，原先向西北飞去的 4 架 F—84 折转回来，降低高度，向沙埕港直扑而来。敌机以如此冒险的手段进攻，是高炮部队没有想到的。全团大部分武器来不及开火，只有七连快速转移火力，将敌长机击落，其余飞机慌忙逃跑。

国民党空军除了重点轰炸、袭扰汕头、沙埕等地，还不时派飞机侦察袭扰广州。虽然解放军空军十八师早在 1953 年就进驻广州白云机场，但由于缺乏复杂气象和夜间作战的经验，未能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国民党空军甚至宣称：广州市上空就是我们的训练空域。

为了打掉敌机，空十八师加强了复杂气象、夜航和空战课目的训练，战斗力大为提高。1956 年 1 月 31 日，国民党空军少校李盛林驾驶 F—86 战斗机，从福建东山岛上空进入大陆，经广东兴宁西南前往广州侦察。空十八师五十四团大队长赵德安率飞行员黄振洪、中队长吕世民和飞行员郭文廷起飞截击敌机。双方在紫金县以东上空遭遇，李盛林见 4 架米格战斗机来势凶猛，立即加速南逃。赵德安、吕世民双机左右夹击，紧追不放。李盛林驾驶飞机降至 300 米高度，仍难以逃脱，他只好迫降在香港启德机场，着陆时飞机起落架也被摔断。

李盛林驾机迫降香港后，总参谋长粟裕指示空军部队：敌机敢来犯，坚决歼灭。3 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复照英国驻华代办处，严重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允许李盛林返回台湾。李盛林返回台湾后，他的那架 F—86 仍留在香港。直到次年 3 月 22 日，港英当局才准许台湾将其拆卸装箱运回。对此，中国外交部再次提出严重抗议。

1956 年 10 月 1 日，国民党空军 4 架 F—84 偷袭汕头，企图破坏大陆的国庆气氛。发现敌情后，空十八师五十四团 4 架米格飞机立即从惠安机场起

飞，担负截击任务的是大队长赵德安、副大队长王铭砚、领航主任孙辉远和飞行员黄振洪，16时22分，双方遭遇，赵德安下令攻击，国民党空军摆成“圆阵”相互掩护。双方在空中盘旋格斗。王铭砚咬住一架敌机，连续盘旋了14圈，并不断开炮射击，终于将对手击落。赵德安也将一架敌机击伤，然后带队安全返航。

此后，国民党空军飞机昼夜不敢进入广州周围120公里的空域。1956年前后，随着浙、闽、粤东、赣南一批机场建成，解放军歼击航空兵先后进驻路桥、惠阳、新城等机场。至此，东南沿海只剩下福建500公里地段无空中掩护。解放军空军在防空作战中，不断取得新战绩。其中：1956年航空兵十五师四十五团在马祖岛附近上空与国民党空军多次空战，迫使敌机把炸弹扔进海里。1957年4月15日，国民党空军两架F—84进入沪杭地区侦察，驻上海的航二师飞行员杨正刚、刘增贵驾米格—17升空迎敌，迫使敌机由9000米下降到1200米，其中一架飞到朝鲜南部上空时，因油料耗尽而坠海。1958年6月17日，国民党空军出动两架F—84到我领空侦察，航九师二十七团团团长张守兰，带领4架米格—15高速追击，一架敌机撞山坠毁。

第八章 陆海空首次协同作战

毛泽东指示解放军高级将领：估计美帝不会有大的干涉，准备解放大陈岛

大陈失守，台湾垂危，宋美龄领着 23 名女子在一江山岛设立了“服务社”

解放一江山岛作战计划报中央军委，毛泽东授权彭大将军数百架次战机轮番轰炸和出击，百余艘舰艇出航参战，国民党守军成惊弓之鸟

在美国政府的军事援助下，国民党军队及其收编的海匪经过整训，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蒋军海上活动舰艇日趋增多，并且有空军配合，国共间海空战斗日益频繁。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参加会议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说：“形势变了，准备打大陈岛，先解决浙江沿海敌占岛屿，估计美帝不会有大的干涉，你们就准备吧！”

1954 年 1 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华东军区制定了陆、海、空三军联合攻打大陈岛战役的作战计划。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批准了这一计划，华东军区随即开始着手进行作战准备，有关参战部队加紧了渡海登陆作战练习。

大陈岛之所以成为解放军势在必夺的目标，主要是其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该岛位于台州列岛岛链的中心，是浙江东南沿海各岛屿上国民党守军的指挥中心和防御中心。在大陈岛周围，国民党军还占据着渔山列岛、披山岛和南麂山列岛。并依托这些岛屿封锁大陆海上运输，袭扰大陆沿海地区。美国在一份标题为《对大陆沿海主要岛屿的展望报告》的秘密资料中直言，这些岛屿是国民党进行侦察活动、进攻和突然袭击大陆沿海目标的基地。

人民空军在这次战役中的任务是保持战区的制空权和保障陆、海军部队的集结、渡航以及登陆进攻，保护海军和空军基地的安全，实施航空火力突击，摧毁一江山岛的主要防御设施，破坏和阻止大陈岛以及来自台湾的支援。

就在解放军积极准备进攻大陈岛的时候，国民党也在不断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国民党六十七军中将军长刘廉一被蒋介石派到大陈，担任总指挥。全部美械装备的四十六师也从台湾调往大陈岛。刘廉一走马上任后，将“大陈游击指挥所”改为“大陈防卫司令部”，并分别在江山、披山、渔山、南麂等岛屿设立了“地区司令部”。

在加强大陈防御的过程中，国民党方面对素有大陈岛门户和前哨之称的一江山岛尤其重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领着 23 名女子在一江山岛设立了“服务社”，进行慰问。称这里的官兵是台湾“北大门的卫士”，为守军鼓劲打气。1954 年 5 月 6 日，台湾国民党海军派出“峨嵋”号军舰，载运一大批军政要员上岛视察。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联同蒋经国登岛向官兵训话，并在深更半夜把守岛军官召集到跟前说：“一江山是大陈的门户，大陈是台湾的屏障，一江山不保，大陈难守；大陈失守，台湾垂危！”俞大维还和美国军事顾问一道，专门对一江山岛防御作了部署。美国顾问团团团长也在一江山扬言，要“加强这扇北大门”，以“保卫自由世界”。

1954 年 5 月中旬，解放军小试锋芒，一举攻占了大陈以北的东矾列岛，头门山、高岛、雀儿吞等岛屿轻易其主。浙海海域两军对垒，火药味空前弥漫。6 月初，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 12 艘军舰，在大陈岛以东海面摆开阵势，

鸣枪鸣炮地举行军事演习。美军飞机不时地飞抵大陈上空，大肆炫耀其武力，借此为国民党守军壮胆。国民党军也调集了船只，为南麂山岛增兵一个团，以对抗解放军随时可能发动的攻势。

1954年8月2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解放闽浙沿海岛屿的作战会议。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张震、铁道部长吕正操、通信部长王净、海军副司令员方强、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和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等高级将领济济一堂，共商军机大事。

会上，张爱萍专题汇报了解放大陈岛战役的作战设想：首先攻占一江山岛，同时佯攻披山。得手后全力进攻大陈本岛。

对上述作战方案彭德怀表示完全同意，他说：“这一仗一定要充分准备，慎重初战，攻则必胜。”

会议结束后，张爱萍返回南京。不久，中央军委发来指示：“华东军区应以海、空军轰击大陈岛国民党守军，并准备以一部陆军攻占一江山岛，以打击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协访阴谋，查明美军可能采取的行动，为解放浙东沿海所有岛屿创造良好条件。”

为了贯彻中央指示精神，8月10日，张爱萍主持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作战部署，决定以陆军第六十师为主力，在海、空军协同下，以有利时机发起对一江山岛的联合登陆作战。

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首长始终关心一江山岛的登陆作战。8月24日晚19时，总参谋部给华东军区发来电报：“同意华东军区的作战方案，可先着手准备……”

8月27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华东军区正式组建了浙东前线指挥部，直接归军委指挥。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华东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聂凤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和参谋长马冠三为副司令员。浙东前线指挥部下设三个军种指挥所：空军指挥所由聂凤智任司令员，曾克林、安志敏任副司令员；海军指挥所由彭德清任指挥、马冠三为副指挥；登陆指挥所由二十军副军长黄朝天任司令员，海军舟山基地政委李志民任政治委员。

浙东前指组建后，攻击一江山岛的准备工作加速进行。

空军先后出动拉—11等型侦察机从上海大场等机场起飞，在海军航空兵歼击机掩护下，对一江山岛和上、下大陈岛进行侦察。通过侦察，大体查明了一江山岛滩头地形和敌军阵地编成及主要火器配置情况。

在面积只有1.7平方公里的一江山岛，驻有国民党军突击四大队、突击二大队四中队和炮兵一中队约1100人，岛上守将为王生明上校，曾任大陈防卫部副部长，是1954年度国民党军的“战斗英雄”。一江山岛的地形不利于攻岛作战，整个岛上遍地是岩石，岛岸大多是悬崖陡壁，易守难攻。国民党军在岛上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全岛共设三道防御阵地，明碉暗堡达154个，平均每百米的正面上配置有两门火炮和两挺机枪。在阵地前还有多层铁丝网和地雷阵。被国民党吹嘘为“击不沉的战舰”。

攻击一江山岛的战斗首先由海军和空军拉开序幕。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调集了近200架歼击机、强击机和轰炸机，分别部署于宁波、笕桥、嘉兴和上海大场等基地。经过数次空战，基本控制了大陈、一江山地区的制空权。在此形势下，浙东前指决心以空军为主，协同鱼雷快艇和海岸炮兵，集中突击大陈海域的国民党军舰，同时轰炸大陈岛上的军事目标。

11月1日，浙东海域天气晴朗。中午11时，解放军空军的歼击机、强击机和轰炸机开始出动，在空中集合编队，组成混合机群，直扑大陈岛。在飞行中，整个解放军机群保持无线电静默，很快抵达战区，空军第十一师副大队长王玉峰率4架伊尔—10降低高度，开始攻击大陈岛上的高射炮阵地，以保障轰炸机对大陈港内军舰的突击。随着刺耳的啸叫声，4架伊尔—10所投炸弹大部命中。紧接着，9架图—2型轰炸机飞临大陈港上空。一排炸弹凌空落下，在大海中掀起冲天的水柱。国民党军舰福星高照，未中一弹。

此后，空军轰炸机、强击机群不时光顾一江山上空，连续轰炸，国民党海军舰艇险象环生。

1955年1月10日，浙东沿海风疾云暗，天气恶劣。在大陈海域担负战备任务的国民党海军舰艇无法出航，只好停泊于大陈码头和锚地。

解放军空军前指司令员聂凤智抓住这一机会，派遣飞机对大陈港进行突击。

空军二十师副师长张伟良亲自率领3个大队、28架图—2轰炸机，冒着恶劣的气候条件，低空隐蔽出航，直飞大陈岛。机群很快飞临大陈上空，张伟良决定分兵攻击。他率一、二大队奔向“中权”号坦克登陆舰，三大队全力攻击“太和”号护航驱逐舰。在敌舰和岛上的防空火力网中，张伟良驾机穿过纷飞的弹片，对准目标投放炸弹。一颗250公斤的炸弹击中“中权”号。跟在后面的中队长宋宗周机组也将一颗炸弹击中“中权”号右舷。接连两次打击，将“中权”号置于死地。其舰内装载的汽油、炸药猛烈爆炸、燃烧，无情的烈火浓烟将“中权”号吞没。三大队也将“太和”号驱逐舰炸伤。

在当天的战斗中，空军强击机航空兵也连续出动。航空兵十一师三十一团年仅22岁的飞行员刘健汉，在大陈岛北面锚地上空投下4颗100公斤炸弹。其中三颗直接命中后勤修理舰“衡山”号。

1月10日，从早上到黄昏，我空军共出动各型飞机130架次，分4次对大陈岛锚地的国民党军进行了轰炸，投炸弹709枚。面对接踵而至的我军机群，国民党军的高射炮全力发射，虽对轰炸机群构成一定的威胁，但其舰船终因无空中掩护而处于挨炸地位。当晚，大陈防区进入战斗准备，正在大陈岛的王生明上校也连夜赶回一江山岛。

解放军飞机飞高大陈岛后，国民党军对其舰艇进行了疏散和隐蔽，以防范我机群再次袭击。当晚国民党军的一艘登陆舰由大陈向台湾驶去，“洞庭”号炮舰驶至大陈以西海面，为其警戒。

22时23分，解放军雷达站发现目标，指挥所随即命令105号、106号和102号鱼雷艇对企图逃离战区的登陆舰实施攻击。此时，海上正刮着7—8级大风，巨浪翻滚，不利于鱼雷作战。23时零2分，105和106两艇攻击未成，奉命返回。102号艇只携带上次战斗中因故障未能发射的一条左管鱼雷，艇身倾斜，航速降低，脱离了编队，因而未能收到返航命令。当105和106号艇返航时，102号艇仍在破浪前进，在积谷山以东4海里处突然与敌“洞庭”号炮舰遭遇。在孤艇独雷的情况下，艇长张逸民仍决定发起攻击。在距离敌舰200米时，随着张逸民的口令，艇上仅有的一条鱼雷跃出发射管，射向目标。在剧烈的爆炸声中，“洞庭”号舰体中部被炸开一个大洞，动力舱随即瘫痪。失去动力的“洞庭”号向南漂去，于11日2时27分沉没于格屿东南4海里处。

1955年1月12日，张爱萍主持召开了前指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抓紧完

成最后的战斗准备。14日，浙东前指正式下达作战命令。16日中午，张爱萍决定在18日发起攻击，并报告华东军区总参谋部。

17日早晨，张爱萍驱车由宁波出发，前往头门山岛前线指挥所。临行前，张爱萍仍对天气情况放不下心，又一次找来华东军区空军气象科长徐杰询问。张爱萍望着天空，向徐杰问道：“现在是4—5级的风，你能肯定3天内有好天气吗？”徐杰作了肯定回答。张爱萍说：“搞错了可要斩马谲啊！”徐杰马上说：“我立军令状！”张爱萍这下放心了：“不过，军令状还得由我向中央立。”

总参认为，一江山作战对美蒋的影响都很大，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如天气条件没有充分保障，登陆进攻的日期可以推迟。张爱萍经过周密分析后，认为部队的准备是充分的，且18日是个晴天，打好这一仗是有把握的。如果推迟攻击，时间久了可能会暴露意图，增加今后作战的难度。彭德怀把张爱萍的意见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授权彭德怀全权处理。最后，彭德怀同意按原计划进攻一江山。

17日夜海上风力加大，舰艇出现碰撞。张爱萍找来徐杰问道：“怎么又刮起大风了，我可是向上级立了军令状啊！”徐杰说：“天亮前风会停的。”虽然有徐杰的保证，可是张爱萍仍不放心，他带着参谋人员伫立山头，仰望夜空。拂晓前，风真的停了。张爱萍很高兴，称赞徐杰有诸葛亮的才能。

18日凌晨4时11分，解放军空军第一批歼击机出动，掩护集结于头门山、高岛等地的登陆部队完成起航的准备。随后轮番出动歼击机168架次，分批在战区上空巡逻，对整个战区进行掩护，并对轰炸机编队进行直接护航。

天一亮，几乎一夜没睡的张爱萍在头门山岛检查了空、海军和登陆部队集结情况。随后张爱萍命令登陆指挥所司令员黄朝天按预定计划向一江山岛发起攻击。

8时整，空军准时出动的轰炸机和强击机奏响了首次陆、海、空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序曲，第一次航空火力突击开始了。最先飞抵一江山岛的空军3个图—2轰炸机大队和两个伊尔—10强击机大队，向一江山岛的主要火力点进行轰击。空军二十师六十团副团长宁福奎、副大队长高臣林率领两个轰炸机中队，摧毁了对登陆部队威胁最大的160高地上的炮兵阵地、高射机枪阵地、地堡和隐蔽部。

与此同时，轰炸机、强击机各一个大队突击大陈岛。岛上的“大陈防卫司令部”，“远程炮兵阵地和无线电、雷达设施，成为解放军飞机的重点轰炸目标。一时间，大陈岛和一江山岛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通信联络中断，指挥失灵。

8时15分，开始对第二批目标进行空袭。此次的攻击目标是北江岛的山嘴鸡、保卫村、海门礁、黄岩礁、了望村和乐清礁等前沿阵地。9时后，解放军的五十余门火炮也开始向一江山岛射击。在空中和地面炮火的猛烈攻击下，一江山被湮没在硝烟和尘埃之中。

12时15分之后，登陆输送队分别从高岛、雀儿岙和头门山岛起渡。七十多艘登陆艇运载五千多名解放军战士向一江山岛挺进，四十多艘作战舰艇担任护航和火力支援。飞机、岸炮和舰艇联合实施火力掩护，保证了登陆船队的航渡安全。

为了确保进攻一江山岛的突然性，解放军的各项战前准备工作均在极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隐真予假的措施。在几个月的时间

里，国民党军始终蒙在鼓里，不知道解放军的进攻在什么时间，目标是哪里。直到看见驶来了庞大的舰船编队，才如梦初醒。一江山岛守军的一名军官在被俘以后说：“战前对你们的意图不了解，昨天我们还在召集中队长布置2—5月的训练任务。直到看见你们的舰艇从头门山转向一江山时，才知道你们真的向我们进攻了。”

在距岛3000米时，驶在最前面的解放军护卫艇和炮船向岛上前沿火力点连续射击，一直打到距岛五六百米。国民党军惊魂未定，解放军的10门“喀秋莎”火箭炮又开始射击了。

“喀秋莎”的参战，给守岛的国民党官兵带来更大的恐怖。二战期间，苏联红军曾用“喀秋莎”给德军以沉重的打击；朝鲜战争期间，又重创美军，使“喀秋莎”的名声大震。在解放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下，大陈岛上的国民党炮兵赶来支援，向海上进行拦阻射击。坐镇头门山岛指挥的张爱萍看到大陈岛上的敌人仍有还手之力，当即命令海岸炮兵和空中轰炸机实施反击。大陈岛炮兵支援一江山的行动持续了五分钟，就被解放军猛烈的炮火给阻断了。由于大陈岛与台湾的通信联络已告中断，台湾对此时的大陈岛战况一无所知，所以其海军、空军也没有出动。孤立无援的一江山岛守军眼睁睁地看着解放军直奔岛岸而来。

当表针指向14时的时候，空军又以3个图—2轰炸机大队对一江山岛的核心工事和指挥机构，实施第二次空中火力突击。二十师副团长刘忠清，大队长陈子华率领两个轰炸机中队，对岛上的“一江山地区司令部”、通信设备、迫击炮阵地、高射机枪阵地再施杀手，使一江山守军的指挥陷于瘫痪。与此同时，辽出动两个轰炸机中队和一个强击队大队，压制正向登陆部队进行炮击的大陈岛榴弹炮阵地，并炸毁其雷达阵地。

14时33分，两个伊尔—10强击机大队对一江山岛守军前沿阵地进行俯冲轰炸，压制岛上的火力点。他们根据空中观察到的火力情况，主动支援登陆部队向纵深发展。当登陆部队遭到火力阻击时，强击机飞行员就从空中直接压制对方的火力。强击机每俯冲一次，登陆部队就冲锋一次。有的飞行贝炮弹打光了，燃料也不多了，仍向对方阵地实施俯冲。飞机发出的巨大轰鸣声把国民党军的官兵吓得魂飞胆破。

14时30分，步兵第一梯队登陆。17时30分攻占全岛成功。共击毙国民党守军519人，生俘国民党第四突击大队长王辅弼以下官兵567人。

在攻占一江山岛的这一天，空军前指共组织出动各型飞机288架次，投掷各种炸弹851颗，发射枪炮弹3741发。炸毁敌火炮阵地15处，指挥所、雷达站各一处，破坏火力支撑点、隐蔽部、地雷区25处，炸毁营房数十间及部分地堡、堑壕等工事，担任登陆第一梯队首长孙勇反应：“空军紧密配合步兵作战，当我们占领敌人前沿阵地时，保证我们向前发展。当我们出现在敌人的支撑点时，空军的炸弹又在制高点上爆炸，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这样的紧密配合，保证了战斗的胜利。”被俘的国民党突击大队长王辅弼说：“那天，你们的飞机炸毁了岛上全部电线，部队完全失去了指挥，很多炸弹就落在阵地和工地上，我们躲在防空洞里，外面死了多少人、发生了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协同陆、海军解放一江山岛，是空军第一次参加合成军队登陆作战。面对现代战争的新课题，空军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依靠上级的正确指挥和兄弟部队的大力支持，在作战的各个阶段，充分发挥各机种的威力，密切与陆、海

军配合，周密地组织雷达情报，通信联络、工程机务和后勤供应等各项保障，从而保证了这次作战的顺利实施。

攻占一江山岛的胜利，显示了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的强大威力。盘踞于大陈，渔山、披山等岛屿的国民党军队，在一江山失守后已成惊弓之鸟，于2月8日起，在美军的协助下开始弃岛南逃。1955年2月25日，浙东沿海岛屿全部获得解放。

第九章 空中的反谍战

蒋介石拼凑“蝙蝠中队”，利用夜间窜犯祖国大陆
嚣张之极：蒋空军一架飞机利用月夜窜犯我9省区
敌领航员抬头看到天上星星闪亮才发现机舱被炮火打出了一个洞
炮响机落，13具尸体中还有一位中尉小姐
眼看“蝙蝠”一个个去而不返似有醒悟：如此赔本的买卖不能再做

福建、粤东地区面对台湾海峡，是祖国大陆的海防、空防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56年前后，国民党空军利用其掌握的这一地区的制空权，经常出动飞机对祖国大陆进行袭扰破坏。他们不断对我沿海城市进行轰炸、扫射，并在夜间出动飞机空投特务、散发传单、接济潜伏在内地的残余势力。他们不仅袭扰东南沿海地区，其航迹还到达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乃至东北、西北地区。他们使用的机型主要有：B—24、B—25、B—26 轰炸机和 C—46、C—47 运输机等。

由于我军的防空体系尚未完善，雷达、歼击机、高射炮的数量少得可怜，航空兵部队屈指可数，而且尚不具备夜间作战能力。所以，台湾国民党空军的特种部队利用这个时机，在祖国大陆上空空投大量的特务及装备。为配合潜伏在内地的“总体游击队”，国民党先后派遣人员三十多批近200人，携带电台、枪支、弹药进行特务活动，其中绝大部分由飞机直接空投到预定地点。几番得手后，他们的袭扰活动更是有增无减。

朝鲜战争结束后，原布防在东北一带的解放军航空兵和高射炮部队部分增调到东南沿海，国民党空军的一统天下立即被打破。

起初，台湾的飞机偶尔还能在白天飞入我沿海地区，到后来只能改在夜间低空飞行，以躲避我米格机的截杀和防空炮火的轰击。至此，海峡两岸的空军力量进入相持阶段。

1955年8月，国民党空军情报署成立了“技术研究组”，对外称“第三十四中队”。由于该中队经常在夜间出袭，人们亦称之为“蝙蝠中队”。第三十四中队实际上是由美国特务机关“海军辅助联络中心”控制的一个战略侦察单位，其主要任务是帮助美国获取我军的战略情报。该中队的飞行员是从国民党空军中“思想纯正”、在多种飞机上飞行2000小时以上的飞行人员中挑选的。美国方面提供飞机、侦察照相设备，并负责补给和维修。每次飞行的具体任务、飞行航线、飞行高度大都由美国人指定。返航后，侦察结果要向美国汇报，并交出侦察资料，美方每次付给他们5万美金。为了帮助第三十四中队掌握夜间飞行和低空飞行技巧，美国特地由日本厚木机场调来一架训练机和几位教官，训练台湾的飞行员在夜间克服地形的险阻和躲避人民空军截击的技术。

此时，美国向台湾提供的飞机，大多是在二战期间纵横欧洲战场的 B—17 型空中堡垒式轰炸机。其弹舱设备已被拆掉，代之以各种电子侦察设备，这些电子侦察设备可以截获解放军地面指挥所发出的指令、监听指挥所同前线部队的通讯联系、截获和分析我雷达信号以确定雷达的位置和其他军事目标的位置，并可发出假的入侵信号，干扰我军的指挥系统。此外，美国还给“蝙蝠中队”配备了 B—26 型侵入者式轻型轰炸机。该型飞机是美国在二战后期发展的快速轰炸机。台湾技术研究小组将机上原有的设备拆掉，特别设

什了一些挂载装置，内装传单、粮票、油票、归降证等，用来向我沿海地区投放。当时，B—26 机经常光顾的地区主要有上海、广州、厦门等。除了例行的全月夜出击外，遇有重大节日，台湾也会派“蝙蝠中队”到北京、上海一带空投传单。

1956年6月22日夜，华东地区沿海一片宁静。位于台湾新竹市西北约2公里的国民党新竹空军基地内，却还有很多人在工作。这里是“蝙蝠中队”的大本营，停机坪上一架经过改装的B—17飞机已做好了出航的准备。离停机坪不远的一间屋子里，国民党空军第三十四中队少校飞行员叶拯民等机组成员，正在美国顾问的指导下紧张地进行起飞前的准备。适于B—17出动侦察的月夜在一个月內只有几天，即农历十三到十九的全月夜，这天正是农历五月十四，新竹基地的有关人员忙得不亦乐乎，唯恐错过这一难得的侦察机会。

23时，叶拯民、聂经渊、韦盛和等人跨进了B—17座舱，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这架飞机缓缓升空。在机场上空，B—17按规定绕飞一圈，让地面最后核查飞机上灯光是否全部熄灭，在确信关闭了所有灯光后，B—17渐渐远去。

叶拯民等人驾驶的B—17很快沿闽江口进入福建，随后向江西方向飞去。我空军的防空雷达发现目标后，迅速通报有关部门。驻衢州机场的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十二师值班员、副参谋长当即命令该师三十四团团团长鲁珉驾驶米格—17型歼击机起飞拦截。鲁珉在抗美援朝期间任空军第十二师技术检查室主任，曾先后击落美国空军F—86型战斗机5架，空军政治部授予他“打F—86能手”称号，是我空军的优秀飞行员。

他驾驶飞机起飞后，即按地面的引导飞向战区。鲁珉驾驶的米格—17型飞机上没有机载雷达，在夜间艰难发现目标。按照领航员的引导，鲁珉借着微弱的月光，隐约发现了两公里外的目标。几乎在同时，B—17也发现了前来截击的米格飞机，随即下降高度，在山谷间蛇行回避。一时间，B—17在鲁珉的视野中消失了。

鲁珉也降低高度，重新捕捉到目标，并立即跟踪瞄准。当距离缩短到400米时，鲁珉开炮射击，B—17机翼随即中弹。鲁珉修正瞄准继续开炮，再次中弹的B—17带着熊熊烈火坠毁于江西广丰县岭底乡溪后村，机上8名乘员全部死亡。这是解放军空军航空兵首次在夜间空战中击落敌机。6月29日，国防部通令嘉奖这次在夜间无光空域击落敌机的战斗人员，并给各有功人员晋升一级军衔。

两个月后，新华社发表一篇新闻稿，宣布我空军又击伤一架国民党空军飞机。新华社8月23日讯：

本月22日零点后，在上海东南上空发现蒋军飞机一架窜入我马鞍列岛上空，我空军飞机当即起飞，蒋机继续窜向嵎泗列岛上空，与我机在衢山岛以北之黄泽山上空遭遇，被我击伤，向东南方向逃去。

实际上，这次解放军空军打掉的是一架美军P4M—1Q型侦察机。当时，它在长江口外擦着我领海线时进时出，飞着5形路线，对我沿海军事设施进行侦察。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二师六团领航主任张文逸奉命驾机拦截。当这架侦察机又一次窜入我领空时，在指挥所坐镇指挥的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立即下令向敌机开炮。张文逸抓住目标，三炮齐发，当即命中敌机。敌机被击中后，挣扎着向公海方向飞去，不久即坠入大海。

周恩来总理得到报告后，为避免扩大事态，掌握主动，亲笔改定了新华社的新闻稿。同时命令空军：美军如果借机挑衅，我们就必须反应，既不示弱也不逞强。

25日零点刚过，美国海军的一支庞大舰队在中国东海的领海线外摆开挑战的架势，3艘航空母舰、30艘护卫舰、驱逐舰、巡洋舰和后勤补给舰列阵航行，从3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200架飞机密布天空。

面对美军的挑衅，解放军空军只派出几架正常巡逻的飞机，在绝对领空之内巡弋，并不主动向美军攻击。外强中干的美军也未敢向解放军战机开火，炫耀一阵武力之后，自动返回。

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十二师和二师在夜间击落入侵敌机，使其他航空兵部队大受鼓舞。11月10日夜，航空兵三师领航主任张滋，驾机在浙江肖山地区又击落一架国民党空军的C—46型运输机。

在受到多次打击之后，国民党“蝙蝠中队”从1957年开始改用经过改装的B—17G型飞机进行电子侦察，并改变了飞行方式。由月夜、中空活动，改为暗夜、复杂气象的低空活动。B—17G型飞机低空性能较好，活动高度通常保持在距地面200米到300米，续航时间长达17小时，航程增到5800公里。

B—17G型飞机的超低空飞行使我军的雷达探测、无线电通讯等大受影响，歼击机拦截也更为困难。1957年，国民党空军B—17G型飞机进入我领空侦察达53架次，解放军空军出动9架次歼击机拦截无一成功。当时我空军各歼击师的夜航大队已开始装备有截击雷达的米格—17n截击机，但机载雷达仅适用于3000米以上高空作战。低于3000米时，由于受地面电波的干扰，雷达难以正常工作。

这年11月20日夜，一架B—17G型飞机低空飞越我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等九个省，活动时间长达9个小时，已接近北京地区。解放军空军航空兵部队先后起飞歼击机18架次，层层拦截。B—17G却躲过追杀，扬长而去。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应用一切方法将蒋机击落。”副总参谋长陈赓大将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在会后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加强夜间防空作战的措施和方案。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阅后上报毛泽东主席。

12月28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彭德怀同志，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1958年4月21日，国民党空军的一架B—17G型飞机低空飞入江西地区。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十二师截击机大队飞行员李顺祥驾驶米格—17n，在指挥所的引导下，使用改进的机载雷达在300米高度发现目标，并将其击伤。B—17G侥幸逃生，赶紧飞回台湾。在敌机上担任领航任务的吴国礼多年后还记得：“那次在南昌一带执行任务时，B—17G一路被追杀不停。在炮声中抬头望见星星的闪亮，这才明白机舱已被共军炮火打了一个大洞。”

1959年1月9日19时许，国民党空军的B—17G型飞机从沿海飞入我领空。我空军航空兵第十八师截击大队副大队长李爱萍于20时起飞迎敌。发现目标后，李爱萍在距敌机450米处开炮，B—17G中弹受伤。当李爱萍准备进行第二次射击时，B—17G迅速调转方向，降低高度，带伤飞回台湾。

“蝙蝠中队”的飞机被两次击伤后，仍未停止对我方的侦察袭扰。5月29日夜，整个华南地区上空阴云密布，细雨濛濛，有的地方电闪雷鸣，云高只有260—500米，能见度很差，不具备出航的条件。当晚20时58分，一架

国民党空军的 B—17 飞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沿台湾海峡南下，直奔雷州半岛。

B—17 进入我领空后，飞到粤桂交界山区上空。此处山峰林立，地形复杂。B—17 以 200 米左右的高度低空飞行，借以躲避我空军雷达的跟踪。虽然 B—17 不顾危险在山谷中穿行，我空军的雷达还是发现了目标。驻广州的航空兵第十八师立即做好截击准备。副师长丰宪刚命令中队长蒋哲伦起飞迎敌，由于受天气和地形条件的限制，雷达掌握目标时断时续，领航员只好根据以往敌人飞行的规律，引导蒋哲伦飞向战区。到达截击区域后，蒋哲伦按照地面的引导，把飞机高度从 1800 米降低到 1400 米，同时使用机载雷达进行搜索。

23 时许，B—17 飞至蒋哲伦的右前下方约 3.2 公里处。其信号也出现在我米格—17n 的机载雷达显示器上。蒋哲伦一面修正航向，一面降低高度接近目标。当两机相距两公里时，蒋哲伦捕获目标并开始瞄准。在相距 800 米时，他果断地按下炮弹发射钮，三门机关炮一齐射击，B—17 当即中弹。

在漆黑的夜空中，米格机炮口冒出的火光刺得蒋哲伦一时睁不开眼睛。顷刻，他才看见右前方有一团绿色的火光向远处移去，方知中弹的敌机仍在飞行。他立即向地面报告，同时大幅度左转，紧紧咬住企图逃跑的敌机。当接近目标时，对准受伤的敌机第二次开火。然后迅速拉起飞机，向在左方脱离。地面指挥员获悉敌机尚未被击落，当即命令，“坚持攻击，直到击落为止。”蒋哲伦又第三次接近目标开炮，气数已尽的 B—17 随着炮声凌空爆炸，巨大的火光映红了夜空。

“敌机爆炸了！”蒋哲伦兴奋地向地面报告。他在暗夜、低空和复杂的气象条件下，将国民党空军装有先进的电子设备的低空侦察机击落，取得了使用机载雷达进行夜间空战的第一个战果。被击落的敌 815 号 B—17 飞机残骸坠于广东省恩平县那关山。机上的国民党少校飞行员胡平山等 15 人无一生还。后来，该机残骸被运往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国民党空军遭此打击后，将近 9 个月未敢出动 B—17 飞机对我领空进行袭扰。在此期间，美方和台湾“技术研究小组”考虑到 B—17 滞空时间虽然长，但只能低空躲避来自空中和地面的攻击，自身没有反击的设备，且飞行速度也不快，决定用克洛希德公司专门为美国海军设计的 P—2V 飞机取代 B—17，执行对我领空的侦察和袭扰任务。

P—2V 型海王星式飞机原是美国海军的反潜巡逻机，后被改装成电子侦察机。其低空性能、机载设备均优于 B—17。它不仅配有两台 3500 马力的螺旋桨发动机，还装有两台涡轮发动机。在低空时可以使用螺旋桨发动机，加之机上装有全景航行雷达，其飞行高度不受地形的限制，可以距地面百米左右飞行。同时还可以像战斗机一样进行高空飞行。该机巡航时速 340 公里，续航时间 15 小时，航程达 5000 公里。经过加装电子侦察、警戒和干扰设备，不但可以侦察地面防空部署、雷达性能、地空指挥，而且能够干扰对方地面和空中的雷达设备。它有两种干扰设备，一种是金属丝干扰，使对方机上雷达截获目标不稳，难以精确瞄准；另一种是回答式电子干扰，当对方的机载雷达工作时，这种干扰系统可以发出一种高能量的信号干扰截机雷达，使其找不到真正目标，而跟踪假目标。

P—2V 自 1958 年 4 月 17 日首次夜间出动，到 1961 年 10 月共进入我领空 84 架次。我空军各夜航大队先后出动 400 多架次飞机拦截，均未获得成功。

P—2V 依仗着其先进的干扰设备，一次次逃脱了我人民空军飞机的围追堵截。

为了打掉 P—2V，我空军除了改进截击方式外，还研究了照明攻击办法，包括在截击机上加装探照灯（以便在机载雷达受到干扰时进行目视攻击），用伊尔—28 型轰炸机和歼—5 型歼击机组成照明攻击队等。此外，还调遣陆军和空军 104 个高射炮营、18 个探照灯连，组成 16 个炮群，配置于 P—2V 飞机可能进出我方的主要航路，进行机动设伏。

1960 年 1 月 27 日凌晨，国民党空军的一架 P—2V 飞机以 150 米的飞行高度，躲过多道拦阻，进入距北京东南不足 200 公里的河北省乐亭县大清河口。

凌晨 2 时 48 分，这架飞机临近解放军高射炮群。在相距 110 公里时，高射炮指挥员按常规命令炮瞄雷达开机跟踪。可是，P—2V 却突然转变航向，进入高射炮的射击死角，然后夺路而逃。

为了找出同 P—2V 作战的有效手段，我空军高射炮兵司令员周彪中下到部队，同指战员们一起总结经验。半年后，周彪司令员拿出了一份有独到见解的报告，其中有一段分析道：“此类飞机有良好的电子侦察设备，能及时发现我方的雷达跟踪，开机早了它能跑掉，开机晚了则打下到。只有采取近战歼敌手段，当飞机进入我高射炮最佳射程时，突然开机、开灯、开炮，才能奏效。”

这份报告得到了上级的肯定。1961 年 9 月中旬，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空军调整了机动高射炮兵的部署，采取堵口设伏和机动设伏相结合的办法，每个炮群组成宽 6—12 公里，纵深 4—6 公里的大网。同时压缩开灯、开炮的距离，实施近战歼敌，以对付 P—2V。

1961 年 11 月 6 日 17 时 53 分，我空军高射炮指挥部接到上级通报：国民党空军的一架 P—2V 飞机由南朝鲜群山机场起飞后向我东北地区进犯。命令高炮部队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接到通报后，周彪中将立即向东北某高炮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采取近战歼敌战术，待敌机进入高炮火力最密集空域时，突然开灯，果断开火。祝同志们胜利！”

某高炮群由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第五二团、探照灯兵第四二团 2 个连和陆军高射炮兵一个团、6 个营组成，炮群指挥员为空军高射炮兵第一一师师长范震江，接到命令后，各个战位都做好了迎敌准备。

18 时 49 分，我炮群目标指示雷达发现 P—2V。3 分钟后，P—2V 到达探照灯开机线，指战员依据上级近战歼敌的命令，打破开灯常规，压缩开灯时间，诱敌深入。

18 时 55 分，P—2V 进入开灯线以内 1100 米，这时指挥员才下令开灯。探照灯兵第八连的操作手动作敏捷，抢先于 4 公里之外照中敌机，P—2V 还未来得及改变航向，十几个炮连的高射炮一齐开火，火光组成的巨大火网把敌机束缚在空中，只听一声巨响，被打断机翼的 P—2V 从 150 米低空栽到地上，从探照灯照中目标，到敌机坠地，仅有 30 秒的时间。

“打中了！打中了！”指战员跳下战位，欢呼着把自己的钢盔抛向空中，纷纷奔向敌机坠落的地点。近战歼敌充分显示了威力，P—2V 的飞机残骸距最近的高炮阵地还不到 250 米。在探照灯光下，战士们看到 13 具国民党空军空勤人员的尸体散落在飞机残骸之间，其中还有一名佩带中尉军衔的小姐。

国民党空军“技术研究组”中校副组长叶霖也在其中。

这次战斗获得国防部很高的评价。罗瑞卿总参谋长亲赴战场向参战部队表示慰问，并指示将这架飞机上的机组成员的尸体就近立碑野葬，便于日后他们的亲属认领。还告诉大家以后再遇到来犯者，也照此办理。

P—2V 被击落后，国民党空军停止了这种飞机的活动达 7 个月。在此期间，他们为了更新机载电子设备，安装了新的电子干扰设备，扩大了干扰作用的范围。随后，P—2V 重新开始对我的侦察活动。解放军空军贯彻总参谋长罗瑞卿关于“海底捞什；总不死心”的指导思想，继续下大力量截杀 P—2V。

1963 年 6 月 19 日晚，国民党空军的一架 P—2V 飞机从浙江路桥东北进入我防区，飞行高度 200—500 米。20 日零时 18 分，这架飞机飞到江西上空，此时，该机已在我领空活动 3 小时 50 分，航程达 1350 公里。我空军驻杭州、衢州、南京、武汉、南昌的截击大队先后出动装备雷达的米格—17 和图—4 飞机 8 架次拦截，对其连续跟踪 410 公里。P—2V 多次对我施放干扰，并作机动飞行，摆脱了攻击。

看到我解放军的追杀难以奏效，颇为得意的 P—2V 继续向前飞行。在飞临江西新干地区上空时，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二十四师截击大队副大队长王文礼驾驶米格—17 歼击机升空拦截。P—2V 又见追兵，急忙施放干扰。随即王文礼驾驶的飞机的雷达上出现了一片迷雾，难以抓到目标，只好依靠地面引导进行跟踪。

零时 32 分，P—2V 飞临江西临川上空，驾机穷追不舍的王文礼于 300 米外再次发现目标，P—2V 也发现了这架米格机。其飞行员凭借着先进的设备，急剧下降高度，在山谷中机动飞行。P—2V 还不时地对着山头直飞，企图诱使王文礼的飞机撞山坠毁。王文礼也不敢大意，把飞机减到最小机动速度，在对方强烈的干扰中，认准目标，紧追不放。

按照机载雷达的显示，王文礼向前方开炮射击，但却未能击中目标。他立即转入近距离目视搜索，并于 300 米处再次发现目标。王文礼当即开炮射击，P—2V 应声冒出了浓烟和火光。敌飞行员竭力想控制住受伤的飞机，但王文礼抓住时机，又给这架飞机致命的一击。两次被击中的 P—2V 终于坠落于临川县大窝坑。机上的国民党空军“技术研究组”少校作战长周以粟等 14 人命归黄泉。

6 月 28 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王文礼及领航员张健和航空兵第二十四师师长王子祥，同年 9 月，解放军空军授予王文礼“夜空猎手”的称号。

在我空军打击 P—2V 取得多次战果的同时，我海军航空兵也取得了照明攻击、击落 P—2V 的胜利。在最初几次拦截 P—2V 未能成功的情况下，根据 P—2V 入窜我领空侦察的特点，海军航空兵参照空军部队的作战经验，决定用飞机投照明弹帮助捕捉目标，用歼击机进行攻击。为了选择合适的机型，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陈士珍命令有关部门，迅速查明库存照明弹的性能和照明时间。综合各种数据进行反复研究，最后拟定了用伊尔—28 型机投掷照明弹，用米格—15 歼击机实施攻击的具体作战方案。

1960 年 9 月，北海舰队航空兵开始进行照明攻击训练。1961 年 5 月 9 日夜，国民党空军的一架 P—2V 飞机进入北海舰队的防空区域，前往拦截的伊尔—28 机投出的照明弹照中了敌机。但由于驾驶米格—15 机的飞行员听错了口令，致使到手的猎物逃出了光区，隐没在夜色之中。

虽然首次照明攻击的实战功亏一篑，却证明了这种战术的可行性。同时，这次截击也使国民党空军领教了新打法的厉害。侥幸逃生的 P—2V 飞行员赵钦对于照明打法印象很深：“在漆黑的夜空中，突然闪现出几颗照明弹，感觉上就好像是在黑暗中做小偷的人突然间被好几只手电筒照中了一样。”

此次战斗后，海军航空兵领导机关进一步审核了照明战术，结论是只要照明机占位准确，将敌机照在光区中心。敌机要逃离光区约需一分钟的时间。在这一分钟内，只要攻击动作迅速准确，完全有可能击中敌机。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航空兵司令员刘道生肯定了照明攻击战术，并向总参谋部呈送了报告，要求组建专门的照明攻击部队。

1963 年 11 月，总参谋部正式批准海军组建照明攻击大队，命名为海军航空兵独立五大队，归海军航空兵第四师建制。独立五大队组建后，立即开始演练照明攻击战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共组织了 357 次模拟攻击，八十多次空地合成演练。照明攻击战术日臻完善，指战员们翘首期待 P—2V 的再次到来。

1964 年 6 月 11 日夜，北海舰队航空兵接到紧急通报：国民党空军的 P—2V 电子侦察机一架，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北上，可能到山东地区进行侦察骚扰。独立五大队在航四师参谋长辛元英的指挥下，迅速做好迎敌准备。

当晚 21 点 7 分，设在山东半岛的我某雷达站发现了 P—2V，并测出其方位、距离、航向和速度。P—2V 飞到离青岛 70 公里处，突然改变航向南下。21 时 50 分，该机又重新北上。密切掌握敌机动向的辛元英，根据 P—2V 以往的活动规律，将截击地点定在平度、莱阳一线。在机场待命的陈根发、石振山双机滑出跑道，升空进行截击。

负责截击任务的这两架飞机都未装备雷达，只能依靠地面的引导搜索目标。在截击过程中，领航员徐守祖由于过度紧张而丢失了目标。指挥员判断 P—2V 可能还会出现，便命令空中和地面人员注意搜索，做好攻击准备，两架战机重新调整队形，待机而动。

过了一会儿，P—2V 的信号果然重新出现，为了防止敌机机动逃脱，徐守祖大胆采用快速“切投”法，引导陈根发、石振山占据了有利位置。照明机飞至 P—2V 前方 2100 米、高于敌机 1900 米处，参谋长辛元英立即下令投照明弹。霎时间，12 枚照明弹脱离弹仓，宛如天灯将直径 1.4 万米范围内的空域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此时，陈根发的飞机正处在敌机的左后方，距离 1600 米。陈根发眼疾手快，两秒钟后就找准目标，并开炮射击。三次开炮，三次命中，敌机冒着浓烟坠毁在莱阳以北 25 公里处，孙以晨等 13 名乘员全部毙命。随后赶到现场的战士们从飞机残骸中搜获了 4 枚“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两部侦察原子弹试验情况的空气采样器。

多年后台湾《联合报》载文：“在这一时期内，‘蝙蝠中队’在历次任务中折损的机员达上百名，可以说是台湾空军损失最惨重的特种部队。数名幸存的队员中有的人即使在事隔多年后的午夜梦中，也常被当年的漫天炮火惊醒。”

三十四中队的夜行“蝙蝠”通常只要逃不过追杀，几乎就是全员殉职，能够保住性命免于死一死的例子很少。由于每次执行任务都要去十余人，所以三十四中队损失极为惨重，许多队员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以致精神崩溃。

看到一批批“蝙蝠”队员去而下返，美国人却坐收渔翁之利，台湾国民党空军内开始有人提出质疑：三十四中队这样去为美国人卖命是不是值得？

1966年，徐焕升接任台湾空军总司令后，经过一番考虑，终于决定停止三十四中队对我方的窜犯飞行。从此，喋血“蝙蝠”在夜空中失去了踪影。

“蝙蝠中队”历尽艰险获取的多是我方纵深战略情报，美国人对此很是喜欢，而台湾军方更为关心的是解放军在沿海地带的活动情况。为了掌握我方的军事情报，台湾国民党空军频繁出动当时最先进的RF—101超音速侦察机，到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侦察活动。

RF—101型巫师式飞机是美国麦克唐纳公司研制的喷气式超音速侦察机，由F—101型远程战斗机改装而成。这种飞机最早装备于美国空军363战术侦察机联队。该机低空和垂直机动性能良好，加速快，最大速度达音速的1.65倍，每小时可飞行1800公里，飞行高度为15200米。机上装有6郡航空相机，可实施垂直、倾斜、高空、低空的侦察照相。在以1600公里时速飞行时，机上的KA—53型侦察照相机在51秒内能拍摄20公里的地面图像。为了把照片拍得清晰可见，飞机上还装有一部由计算机控制的电子摄像活动调整器，可以随着飞机的速度、高度来协调照相的动作。美国人把这种飞机喻为“西方的战略眼睛”。我军官兵则根据101的谐音，戏称为“妖洞妖”。

海军航空兵所属的浙江路桥机场是RF—101侦察袭扰的重点之一，先后数十次光顾侦察、照相。对此，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在航二师和航六师挑选技术优秀的飞行员组成尖刀分队，专打RF—101。但是，用亚音速的歼击机，追击超音速的RF—101实属鞭长莫及，难以奏效。

就在我空、海军为击落RF—101而想方设法的时候，沈阳飞机厂已经制造出歼—6型超音速歼击机。这种飞机是由前苏联的米格—19型歼击机仿制而成的，该机装有两台喷气式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达音速的1.35倍。机上还装备3门30毫米机关炮，机翼下可携带空对空导弹、火箭和炸弹。歼—6的飞行速度虽然不及RF—101，但毕竟使我航空兵缩小了同对手的差距。

歼—6机装备部队不久，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海军航四师派出装备歼—6的小分队飞越长江作战。航四师师长周克林亲率歼—6小分队由青岛空转路桥。为了不使台湾发现歼—6机南下，在飞行过程中，采取了低空慢飞、无线电静默、着陆不用减速伞、歼—5机伴随佯动等隐蔽措施。

航四师歼—6小分队进驻路桥后，一连几天阴雨连绵，RF—101没有出动。周克林师长和路桥基地副司令员刘建凯组织小分队认真进行战前准备，详细听取了歼—5分队与RF—101交手的介绍，查阅了RF—101历次侦察路桥机场的飞行数据，归纳绘制成图表，与歼—6机性能作全面的比较。

在分析比较中，找出了RF—101难以发挥速度优势的3个弱点，一是该机低空出航后向高空作大仰角紧急爬高时，性能受到限制，无法作超音速飞行；二是该机爬高后转入平飞的短暂时间内速度也不快；三是该机在平飞通过目标上空照相时速度也会减慢。这样，就可能利用这些空隙战胜其速度优势，并将其击落。

为了在实战中稳操胜券，海军航空兵优选了参战部队，把发现RF—101的任务交给海军雷达二团的警戒雷达连和引导雷达连。警戒雷达连是我海军中赫赫有名的雷达部队，在全军通信兵大比武时，时剑英曾参观了他们的表演。

接受此次任务后，这支部队向指挥所表示：一定在距离120公里之外发现敌机。担负歼—6机引导任务的是海航四师机动作战小分队的领航员魏承

超、谯伦吉。魏曾在山东担负过击落 P—2V 的指挥引导，谯则参加过歼—6 的改装训练。负责驾驶歼—6 机进行空中截杀 RF—101 的则是海航四师十团副团长王鸿喜和飞行员高绍英、王相一。上述参战部队及人员在东海舰队航空兵领导下进行了多次截击演练。

1964 年 12 月 18 日下午，台湾海峡雨后天晴，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第四大队少校作战官谢翔鹤驾驶一架 RF—101 侦察机直奔我领空而来。谢翔鹤曾多次驾机对我侦察审扰，获得过“飞虎”、“彤弓”、“宣武”、“云龙”四枚奖章。

下午 2 时，正在低空北上的 RF—101 被解放军海军雷达二团的警戒雷达连发现。此时 RF—101 距路桥机场 150 公里。路桥基地司令员吴长武闻知后，立即调兵遣将，两架歼—5 飞到大陈、琅矾山、三蒜山一带空域佯动，以迷惑台湾方面的雷达。紧接着，王鸿喜驾驶歼—6 紧急升空，在地面引导下前去截击 RF—101。

王鸿喜起飞不久，地面跟踪 RF—101 的引导雷达突然丢失了目标，在这决定胜负的紧要关头，技高一筹的谯伦吉果断采用“推测引导”的方法，引导王鸿喜占据有利位置。当引导雷达重新抓住目标时，发现 RF—101 的航迹同谯伦吉的推测相吻合。王鸿喜按照地面的引导，率先发现了正在爬高的 RF—101。看到猎物就在眼前，王鸿喜动作迅速，快速急转、占位、瞄准，谢翔鹤却不知危险已经临头，他正要 will 将飞机拉平，王鸿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急按炮钮。3 门 30 毫米火炮一齐开火，RF—101 当即中弹，冒着浓烟坠入了大海。谢翔鹤跳伞后也被民兵抓获。他的这次侦察飞行未及抵达目标就夭折了。此次战斗是我国制造的歼—6 超音速飞机首开纪录，国防部为此发布了嘉奖令。

1964 年 12 月，人民空军也在加强东南沿海的防空力量，专门打击 RF—101 的作战分队相继成立，并进驻福州、漳州、兴宁和连城机场，构成了汕头到福州一线的拦截网。刚刚装备歼—6 飞机的航空兵第十八师作战小分队也于此时进驻兴宁机场。

我空军航空兵第十八师作战小分队进驻兴宁机场后，对 RF—101 历次侦察汕头机场的活动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 RF—101 侦察汕头机场有南北两个航线，因南航线便于隐蔽，RF—101 多采用这条航线。根据这一情况，航空兵十八师制定了作战方案，并进行了 75 次图上作业和一百余次演练。

1965 年 3 月 18 日 9 时 44 分，国民党空军的两架 RF—101 从台湾桃源机场起飞，目标是汕头机场。此时，台湾方面还不知道兴宁机场已经进驻了歼—6 小分队。

RF—101 起飞后不久，我空军就获得了情报。10 时 12 分，值班指挥员、航空兵第十八师副师长沈科命令副大队长高长吉驾驶歼—6 升空待战，10 时 23 分，雷达在汕头东南 165 公里处发现目标，高度 500 米。沈科判断 RF—101 可能由南向北从靖海入陆，即命令高长吉从待战空域出航，高度 1.1 万米。10 时 34 分，RF—101 果然由靖海东南飞入我防区，时速 1000 公里，高度 8500 米，并继续爬高。一分钟后，居高临下的高长吉发现了目标，几乎在同一时刻对方也发现了埋伏在空中的我歼—6 飞机。两名国民党飞行员无心恋战，决定放弃侦察逃走。看到空中的 RF—101 掉头回窜，沈科急令高长吉“右转，动作快点！”高长吉紧紧地咬住目标不放，敌长机飞行员在无线电里对其僚机狂妄地大喊：“我们和他赛跑！”一架歼—6 机和两架 RF—101 随即在万

米高空展开了比赛。

沈科继续命令：“跟上去，狠狠地打！”高长吉打开发动机加力，以每小时 1400 公里的速度高速追击，终于追上了后面的一架 RF—101。在相距 605 米时，高长吉三炮齐发，七十多枚炮弹射向 RF—101，这架飞机随即在空中爆炸，驾机的飞行员——国民党空军第六大队中校辅导长张育保跳伞逃生。另一架 RF—101 大惊失色，以为解放军的飞机装备了什么新式武器，赶忙向基地报告，“我们的飞机被共军的导弹打下去了！”同时，加大速度逃回台湾。

RF—101 接二连三地被打掉，台湾国民党空军只好停止派这种飞机进行侦察活动，而改用 RF—104 侦察机对我沿海地区进行侦察活动，并用 F—104 战斗机护航。

美国为了帮助国民党空军对抗我空军，宣布向台湾提供 F—104 星式战斗机，随后又为台湾运去了 RF—104 侦察机。F—104 星式战斗机是洛克希德公司研制的单座超音速战斗机，飞行速度达音速的两倍，机上有自动驾驶仪、自动引导系统、大气数据计算机和敌我识别器，机上武器有一门 20 毫米 6 管机关炮，并可携带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炸弹和火箭。

RF—104 侦察机是在战斗机的基础上改装的，两者性能基本相同，其飞行速度远远超过我军的歼—6 飞机。

从 1965 年开始，在两年的时间里，RF—104 对我沿海地区进行了 11 次侦察。我军多次出动歼—6 飞机进行拦截，均未获得成功，为了以劣势装备战胜 RF—104，我歼击机部队加强了负速度差条件下的截击训练。

1967 年 1 月 13 日 13 时许，国民党空军的一架 RF—104 侦察机在 4 架 F—104 战斗机的掩护下飞越台湾海峡，进入福建晋江上空。我人民空军反应迅速，驻漳州的航空兵第二十四师先后起飞两批 8 架歼—6 机拦截。

第一批歼—6 刚刚升空，就遭到了已飞到低空的 4 架 F—104 战斗机的偷袭，数枚响尾蛇导弹呼啸而来。我 3 号机飞行员胡寿根听到地面的紧急呼叫后，立即一个大转弯避开导弹。他刚转过头来却与另一架 F—104 正面相遇，胡寿根驾机以极限速度冲向敌机，F—104 增速到 1600 公里/小时，双方飞机都以超音速斜对头状相对飞行。胡寿根毫无惧色，在两机即将相撞的瞬间，迅速开炮射击。敌机冒着黑烟坠落下去了。胡寿根仅用 48 发炮弹就将对手击落，创造了在负速度差条件下击落敌机的先例。

此后，国民党空军对我方的侦察活动日渐减少。1968 年 6 月以后，国民党空军即停止了昼间进入祖国大陆的侦察，一场延续近 20 年的侦察与反侦察的较量落下了帷幕。

第十章 导弹营与“黑猫小组”

敌机残骸已被我展出，台湾宣称：此型飞机尚未起飞
建国 10 周年大庆，前来“献礼”的敌机坠落在北京通县的玉米地里。
美国专家断定：飞机被中共的神秘武器击落
飞行高度 2 万多米的 U—2 侦察机是如何被击落的？陈毅外长称：是用
木棍子捅下来的
蒋空军“克难英雄”叶长棣受伤后弃机跳伞被俘，台湾当局则宣布：
侦察机失事，叶长棣“壮烈成仁”
当蒋空军司令告知张妻，立义已“殉难成仁”并表示慰问时，受伤跳
伞的 U—2 驾驶员张立义正在内蒙的农民炕头上吃面条
失落的“黑猫”。两位被台湾宣布“成仁”的 U—2 飞行员被我释放后，
台湾当局拒不允其返台与家人团聚

朝鲜战争结束后，祖国大陆处于相对的和平环境，而防空作战却出现了紧张的局面。国民党空军继续对我东南沿海地区袭扰破坏，并将袭扰范围向纵深地区扩展。这种紧张的局面一直持续到 60 年代末，在此期间，空军遂行防空作战任务，规模虽然不大，但范围遍及全国，形式多种多样。在作战中，空军不但经受了考验，取得了经验，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果。

当台湾国民党空军开始对内地纵深进行高空侦察时，美国从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对台湾的这一行动大力支持，并向台湾提供了先进的高空侦察机：RB—57A。这种飞机是亚音速双座喷气式高空侦察机，最大飞行速度为每小时 930 公里，飞行高度为 1.5 万米，续航时间 7—8 小时。国民党空军第四侦察中队是世界上第一个装备该机进行实战侦察的部队，于 1957 年 12 月开始对我内地进行侦察飞行。

1958 年 2 月 18 日，是我国人民传统的节日——春节。这天早上阴雨连绵，可国民党空军第四侦察中队的上尉飞行员赵广华仍然驾驶着 RB—57A，开始对祖国大陆的又一次侦察飞行。

上午 10 时 45 分，赵广华飞至舟山群岛上空，高度 8000 米，距我海岸线约 150 公里左右。我防空雷达发现了目标，并立即上报指挥机关。接到报告后，担负该空域截击任务的海军航空兵第四师指挥员立即命令值班飞机起飞迎敌。10 时 54 分，在山东青岛流亭机场跑道上待命的四师十团中队长胡春生和飞行员舒积成，驾驶歼—5 歼击机紧急升空。地面指挥人员引导胡春生、舒积成修正航向，爬升到高空待命。

当赵广华驾驶着 RB—57A 飞入山东半岛上空时，其飞行高度超过了 15500 米，这个高度已接近我歼—5 歼击机的最大升限。为了对付国民党的高空侦察机，海军航空兵第四师于 1958 年初进驻流亭机场后，曾多次组织飞行员在高空试飞试炮，并针对 RB—57A 的侦察特点制定了各种作战方案。因此，飞行员对打掉这架飞机充满了信心。

胡春生、舒积成双机飞至 15000 米高空，胡春生先在前方发现一个黑点，并判断是敌机。他一面向地面报告，一面招呼舒积成一起向敌机扑去。这时赵广华也发现了迎面飞来的歼—5 飞机，他急忙调转航向，准备逃跑。胡春生抓住敌机转向的机会，向敌机发起攻击。两次开炮均被敌机躲过了，第三次胡春生没有急于开炮，待敌机占满瞄准镜整个光环时才按下炮钮。一串炮

弹击中了敌机的右发动机、机身和机尾，敌机开始倾斜。当胡春生准备继续攻击时，却发现炮弹用光了。这时，僚机舒积成猛追上去，开炮命中敌机。RB—57A 的右翼折断，由高空笔直下坠，残骸落在黄海的千里岛附近。曾获得“飞虎”奖章的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赵广华随机葬身在海底。

胡春生、舒积成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次同温层高空歼敌的纪录。正在朝鲜访问的周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立即打电话向海军表示祝贺。

RB—57A 被击落后，国民党空军方面连忙否认 RB57A 曾对我进行过飞行侦察，声称此机还在台湾机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当天也宣布，根本没有把这种飞机送给台湾。这两种说法自相矛盾。实际上，解放军海军不仅拥有 RB—57A 被击落的照片，而且派潜水员将 RB—57A 的残骸打捞了上来，并在青岛中山公园向群众公开展出。

RB—57A 被击落的当天中午，驻台湾桃园基地的美国顾问莫梅上尉，曾到第四侦察中队作战室向值班的国民党空军军官报告：上午派出的 RB—57A 已经下落不明。并要他们马上派飞机送他到冲绳美军基地汇报情况。第四侦察中队少校副队长立即驾驶 T—33 教练机，和莫梅上尉一起飞到冲绳基地。

这次战斗后，国民党对 RB—57A 失去了信心，诅咒该机为“黑棺材”，不愿再派这种飞机执行侦察飞行任务。台湾当局和美国方面磋商，并制定出了新的对策，改换新机种，在升限上超过解放军的歼击机，并由美方对首批高空飞行员进行改装训练。

当时，国民党空军第四侦察中队由 RF—101A 和 RB—57A 两个分队组成，赵广华丧生后，RB—57A 分队的其他 3 名飞行员卢锡良、林佐时、张育保即前往美军冲绳基地接受改装训练。为了加强 RB 分队的力量，台湾当局又挑选了两名飞行员在桃园机场接受高空飞行训练。这两个补充的飞行员就是上尉作战长田建南和中尉飞行员王英钦。

在 RB 分队接受高空飞行训练期间，美国为了掌握我国的军事情报，特派遣其飞行员驾驶 U—2 高空侦察机进入我国境年侦察。对此，中国政府曾多次向美国提出抗议。

1959 年初，美国提供给台湾的两架 RB—57D 型高空侦察机运抵桃园机场，由田建南，王英钦驾驶，重新开始对我方的侦察飞行。RB—57D 同 RB—57A 相比，换装了更为先进的发动机和侦察设备，还装有 4 部航空照相机，在 1.85 万米高空实施照相侦察时可摄取长约 4000 公里、宽 70 公里地幅的地面目标，其飞行高度达 2 万米。当时，解放军最先进的飞机是苏联制造的米格—19 式超音速歼击机，与 RB—57D 相比，在飞行高度和侦察设备方面均处于劣势。

1959 年 1 月 14 日，台湾国民党空军的 RB—57D 侦察机首次出动，飞到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上空进行侦察。我空军航空兵部队先后起飞多架米格—17、米格—19 进行拦截，均因飞行高度不及对方，而无法进行攻击。在以后的两个月时间里，RB—57D 又先后窜入我领空 9 次，活动范围遍及福建、浙江、江苏、上海、江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贵州、四川、河南、山东等 13 个省市。在拦截过程中，我空军歼击机 106 架次发现目标，但眼看着 RB—57D 在高空飞行，只能望洋兴叹。同年 6 月，RB—57D 还两次飞到北京上空进行侦察，穿过由歼击机、高射炮组成的防空网，顺利返航。

RB—57D 的侦察飞行屡屡得逞而建国 10 周年的盛大节日又即将来临，加强首都的防空力量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共中央调遣最精锐的歼击机和

高射炮部队，在北京周围进行部署，并将进行改装训练仅 4 个月的地空导弹部队投入使用。

地空导弹部队是我空军的一张王牌，其核心机密鲜为人知。早在 1956 年 8 月，中国政府就作出了从苏联引进导弹技术的决定。1957 年 9 月，中国方面派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同苏联谈判。10 月 15 日，双方达成协议，签定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其中包括向中国提供萨姆—2 地对空导弹。

1958 年，我军着手组建代号为“543”的地对空导弹部队。

10 月 6 日，在北京清河镇空军高级防校小礼堂，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兵第一营成立典礼。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庄严宣布：中国空军地空导弹第一营正式成立。在年底以前，由北京、南京军区空军抽调精锐人员，组建地空导弹第二营、第三营。上述工作都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空军主管国土防空的副司令员成钧中将，组织人员对导弹的作战部署和阵地勘设作了研究。

1959 年 8 月初，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来直升飞机对勘选的阵地进行了复查。

9 月 5 日，5 个地对空导弹营进入阵地，撑起了保卫北京的“防空伞”。其中一营进驻大兴县东枣林；二营进驻通县张家湾机场；三营进驻丰台区槐树岭；四营进驻昌平县沙河机场；五营进驻顺义县河南村。

10 月 1 日，建国 10 年庆典活动如期举行。天安门广场上贵宾纷至，游人如潮，盛大的国庆阅兵式又一次展示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阵容。担负防空任务的歼击机、高射炮和地空导弹部队高度戒备，但这一天台湾的飞机并未“光临”。

转眼到了 10 月 7 日，这一天是星期日。国民党空军的上尉飞行员王英钦驾驶着 RB—57D 高空侦察机，飞入晴朗的天际。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地空导弹击落的飞行员。

9 时 41 分，福建前线的雷达发现了这架 RB—57D 的信号。雷达兵很快判明情况，并向上级作了报告。敌机从浙江温岭窜入我内陆地区，飞行高度为 18000 米。北京空军地空导弹群指挥员张伯华向各营下达命令：“敌机可能到达北京地区，注意作好战斗准备！”

此时，空军驻南方的歼击机开始起飞拦截。王英钦驾机飞到我歼击机不能达到的高空，经杭州、南京，找到了津浦铁路，并以此为地标，向北京飞去。

11 时 15 分，RB—57D 距北京只有 700 公里了，5 个地对空导弹营进入一级战斗准备。35 分钟后，地空导弹第二营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在 115 公里距离上捕捉住目标。指挥所下令：我歼击机已经退出战斗，二营坚决消灭敌机。

12 时 4 分，RB—57D 进入萨姆—2 导弹射程之内，随着二营长的口令声，3 发萨姆—2 导弹喷着火焰从发射架上腾空而起，直向目标冲去。王英钦和他的 RB—57D 措手不及，机身被炸成几截后，拖着熊熊大火坠落在通县东南的玉米地里。王英钦跳伞后，由于伞绳正好被弹片炸断而活活摔死，现场的情景十分悲惨。在方圆百里的庄稼地里，散落着王英钦的尸体和飞机的残骸，王英钦仰面躺在地上，脸上血肉模糊，右腿被摔得扭曲变形，在尸体西南 50 米处可见一白色的降落伞，伞绳已经断成两截，RB—57D 的主体则坠落在王英钦东南 100 米处，其头部插入地下，尾翼高高翘起，尾号“5643”清晰可

见。

停泊在东海上的敌情报船也在密切注视着王英钦的飞行动态，船上的远程雷达突然发现这架 RB—57D 的飞行高度在下降，在 3 分钟内竟从 18000 米高空急降到 9510 米，而且就此失去了踪影。在场的美国情报专家依据这种下降速度断定，王英钦和他的座机已经被击落。

通县之战，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导弹部队首开世界防空史上动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纪录。早在 1941 年，纳粹德国就开始研制地空导弹，其后的 18 年间，美苏等先后装备了地空导弹，但只是在靶场上大显神威。国民党空军部队装备地空导弹的时间几乎和我军同步。由于我空军从未到台湾上空作战飞行，台湾地空导弹部队也就从未获得战果。靠着台湾空军的“协助”，我人民空军获得了这首先例的殊荣。

RB—57D 的被击落，导致国民党空军和美国方面对其使用价值的怀疑，并认为解放军装备了新的、性能超过 RB—57D 的机型。于是，决定 RB—57D 迟出现役，并解散 RB 高空侦察分队。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内，台湾停止了对我内陆地区的战略侦察。

进入 60 年代，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迹象愈加明显。美国急于了解我国核计划的进展情况，于是又打起了台湾国民党空军的主意。他们想利用台湾空军飞行员驾驶 U—2 型高空侦察机，深入我内陆地区进行侦察照相，系统搜集我重要工业设施、军事部署等情报，全程监控我核弹和远程导弹的发展过程。为此，美国特派中央情报局的克莱恩专门同台湾军方商量合作事宜。

当时，在台湾担任“国防部长”的俞大维对美国的这项计划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美国要用 U—2 侦察中国内陆和沿海地区，就应该由美军自己去冒险。况且，U—2 所搜集的情报大多涉及我国的核计划，对台湾的益处不大。台湾所需要的是我方沿海地区的军事动态，用台湾的侦察机就可以胜任，无需用 U—2 这样的高空侦察机。在俞大维的强烈反对下，克莱恩只好去找蒋经国帮忙。得到蒋氏父子的首肯后，台湾空军只好接受此项计划。

1960 年 7 月，美国向国民党空军提供的两架 U—2 运抵桃园。台湾军方挑选 6 名飞行时间在 2000 小时以上、具有空中侦察经验的人员组建了“第三十五气象侦察中队”。隶属国民党空军总部情报署，实际上由美国人直接控制。飞机的维护、保养都由美国人担任，停放 U—2 的机棚连国民党空军的大队长都进不去。

经过一年多改装训练，台湾空军第三十五中队于 1962 年 1 月 13 日开始出动 U—2 执行侦察任务。由于三十五中队的队徽上有一个黑猫头，所以人们称之“黑猫中队”，称其驾驶的 U—2 为“黑猫小姐”。

美国认为中国的核设施分布在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地，U—2 在这么远的距离上执行侦察任务，万一中途发生故障根本无法返回台湾。为了加大 U—2 出航的保险系数，美台双方曾考虑在中国周围国家中选择一处供 U—2 起降的机场。经过一番比较，认为只有泰国和印度合适。但在当时，这些国家都不愿扮演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黑猫中队”只好以台北桃园机场为基地，深入我内地作战略侦察。

在半年的时间里，U—2 对我方的侦察飞行达 11 架次之多。除新疆、西藏外，其航迹遍及全国各地。在此期间，美台因情报的使用权问题产生了矛盾。U—2 每次起飞执行任务，都由美国人直接下达指令，规定侦察目标、航线和飞行高度。飞机返航着陆后，美国人直接将获得的胶片取走，并用专机

送往日本解析判读。看到自己出生入死得到的资料被美国人独占，台湾空军当然很不满意，多次同美方进行交涉。但美方都以技术问题加以搪塞。

U—2 的飞行高度令解放军空军各歼击机都望尘莫及，担负防主任务的兵器中只有萨姆—2 导弹能够对付它。当时，人民空军的地空导弹部队仍在北京布防。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作出决定，将保卫首都的导弹部队撤出北京，在 U—2 侦察机经常活动的航线上设伏。

在广阔的国土上，用数量有限的几个地空导弹营伏击 U—2，无疑是大海捞针。两个多月后，未获得战果的空军重新调整了导弹部队的部署。8 月 29 日，在夜幕的掩护下，导弹二营由湖南长沙转至江西南昌，在向塘设伏。在 U—2 以往的 11 次飞行中，有 8 次飞经南昌，空军判断此处是 U—2 飞行的一个检查点，因而在这里布下罗网。

为了诱使 U—2 出动侦察，解放军空军玩了一个引蛇出洞的计谋，命令驻南京的轰炸机部队进行佯动。因为在福建方向，我航空兵一有调动，U—2 就会出动侦察。

9 月 7 日，解放军空军一个大队的轰炸机从南京起飞，抵达南昌某机场。第二天，又有一架大型轰炸机从高空飞在南昌以南。台湾方面发现上述活动后，于 9 月 9 日派 U—2 前往侦察。驾驶这架飞机的是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陈怀。

当 U—2 飞至桃园以北 40 公里处，被解放军远程雷达发现。随后，这架飞机经福州沿鹰厦铁路，向江西境内飞来。我军的多部雷达盯着该机的航迹，地空导弹部队进入临战状态。

8 时 32 分，陈怀驾驶着他的 U—2 进入南昌上空，我地空导弹部队的 3 发萨姆—2 立即离地而起，编织成一个死亡之网，罩住了 U—2。紧接着，击落敌机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了北京，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中央首长。随后，刘司令员又打电话给导弹二营首长岳振华，命令他火速飞到飞机残骸坠落现场，查看飞行员的情况，如受伤立即送医院抢救，如死亡好好埋葬，并在墓碑上刻上死者的姓名。

U—2 坠落在南昌市东南 18 公里处的一片稻田里。整个机身被弹片炸得像蜂窝一般，陈怀也已经奄奄一息。赶到现场的解放军立即把他送到医院，但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按照首长的指示，将其埋葬在附近的一座小山坡上。陈怀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 28 期优秀学员，后被派往美国阿里桑那州战略空军基地，进行 U—2 飞行训练。回国后，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他当即向蒋表示忠心：“……若飞机在台湾海峡失事，我可跳伞；若是在大陆遭击，则与 U—2 共存亡。”蒋对此大为赞赏。陈怀丧生后，蒋介石亲临台湾空军剑潭公墓献花、祭悼，并到教堂为陈怀做礼拜，为陈怀修建“怀生堂”。蒋经国也写下一篇《看不见可是你依然存在》的文章，追忆陈怀。国民党空军称陈怀为“高空骑士”。对于陈怀的死，台湾方面是这样记载的：“陈怀于 1962 年 9 月 9 日，在江西南昌上空侦察蒙藏地区返航时，因座机飞行时间太久，引擎受高空冷气影响而停止，乃降至同温层暖空气带。拟重新启动时，为中共飞机追击，坠地引爆座机后自杀。”

南昌之战，震惊了国内外。但我方对如何击落 U—2 守口如瓶，台湾及西方的军事专家和新闻界人士一直在挖空心思地猜测，解放军究竟是使用何种武器击落 U—2 的。虽然 U—2 早在 60 年就被苏联防空军的导弹击落过，但美国却认为是苏联的克格勃在 U—2 飞机上做了手脚。国外许多人士对解放军能

拥有击落 U—2 的武器深表怀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此事，陈毅外长风趣他说：“我们是用木棍捅下来的。”

击落 U—2 后不久，地空导弹部队二营营长岳振华离开南昌，前往北京参加空军党代会。会后，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当时，周恩来总理指着岳振华向毛主席介绍说：“这就是岳振华同志。”毛泽东主席高兴他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哇！”在场的刘亚楼司令员向毛主席汇报了击落 U—2 的经过。

1962 年 12 月，美国又将两架 U—2 提供给台湾空军。原有的两架，除被我军击落的一架外，另一架也在训练中坠海爆炸。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美国人已经掌握了萨姆—2 导弹系统的工作频率，在新提供给台湾的 U—2 飞机上，加装了电子预警系统。在飞临地空导弹阵地时，该系统可捕捉到导弹的信号，并向飞行员发出警报，摆脱导弹的跟踪。由于我国的核计划在加紧进行，建有核工厂的兰州、酒泉、包头再次成为 U—2 的重点侦察目标。

1963 年 3 月 28 日，一架 U—2 从南朝鲜群山机场起飞，经过包头、乌鲁木齐，飞到甘肃某基地上空。在该基地的国防科委所属地空导弹第四营两次捕捉到目标，由于 U—2 已经加装了预警系统，未待地面导弹发射，就及时逃脱了。6 月 3 日，又一架 U—2 飞往兰州侦察，也因同样的原因逃脱了。

两次失利之后，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指示：将 4 个导弹营统一部署，组成大面积有机结合的火网。按照这一指示，地空导弹部队重新调整部署，进行集团设伏。但仍无法有效打击 U—2。9 月 25 日，又一架 U—2 安全穿过火力网，逃之夭夭。

通过分析这接连几次的失利，发现敌人每次都是在地空导弹制导雷达于线打开 20 秒钟后开始机动的，如果能在 20 秒钟内发射导弹，仍有可能击落敌机。

按照萨姆导弹的作战规定，从打开制导天线到发射导弹约需 7—8 分钟的时间，为了有效地打击 U—2，地空导弹部队二营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反复进行研究，经过数十次开机试验，终于将打开制导天线的距离缩短，把发射准备时间压缩到 10 秒以内，创造出“快近战法”。这样，U—2 即使接到制导信号，也来不及转向逃脱了。

根据 U—2 入寇的特点，空军司令部将 4 个导弹营重新进行集团布置。一营驻戈阳、二营驻上饶、三营驻江山、四营驻衢州，组成 160 公里的拦截面。上述 4 个营于 11 月 1 日正式开始进入战备状态。

11 月 1 日清晨，一架 U—2 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驾驶飞机的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叶常棣，生于 1933 年，原籍广东惠阳，该人已多次驾机窜入我领空进行侦察、拍照，1960 年就开始驾 RF—101A 飞机来犯，1961 年窜犯侦察 9 次，两次受蒋介石接见，连续两年被台湾当局评选为所谓“克难英雄”。1963 年 2 月被派往美国接受改装 U2 训练，回台湾后 3 次驾机侦察我领空，获国民党颁发的“飞虎”奖章一枚。蒋经国多次邀请他到家中赴宴。这次，他是第四次驾驶 U—2 侦察机窜犯我领空。

在叶常棣窜犯我领空的同一时刻，我人民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正在上饶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期间，叶常棣已驾飞机沿着地空导弹阵地的边缘向西北飞去。成副司令根据 U—2 以往飞行规律，判断敌机回航时还会通过导弹设伏地域。于是，成副司令命令做好打击回寇之敌的准备，同时强调，各营一律在距 37 公里以内打开制导雷达天线。会后，二营营长岳振华的吉普车一路尘

烟，回到设在赵家凹的营指挥所。

“同志们，我们采取近快战法，37公里开天线。”岳振华简单他讲明作战意图，全营官兵立即做好发射准备。

敌机飞过九江，直奔上饶，再一次为二营创造了战机。二营作战参谋陈辉亭根据敌机的航速推测出U—2已经到达35公里处。岳振华命令打开天线。

打开天线后，3个跟踪显示器都没有目标出现。正在这时，高低角引导显示器右下边缘处露出半个米粒大的信号。“就是它！”操作手赶紧打手轮锁住目标，转入自动跟踪。紧接着，3发导弹射向了天空。从开天线到发射导弹，整个过程只用了8秒钟。

U—2飞机上的叶常棣听到机上的预警系统报警，急作转弯机动，躲过了第一枚导弹，紧接着，第二枚导弹接踵而来，“轰”的一声巨响，在劫难逃的U—2被炸解体，坠落于广丰县东山人民公社境内。

在U—2被炸解体的瞬间，叶常棣被甩出机舱外，他打开降落伞，降落在一个小山丘上。他的双腿和手臂都被击伤了。解放军和民兵包围了过来。他想：“这下完了，看来真要被共产党剥皮抽筋了”。一位解放军战士对他说：“不要怕，我们不杀你。”又转身对一位民兵说：“先给他点水喝，然后送医院。”随后，叶常棣被送到了当地的一家医院。

11月3日下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副司令员成钧到医院，同叶常棣进行了如下交谈：

刘：你是广东人，多大啦？

叶：31岁。

刘，你放心，我们没有必要杀死你。

叶：在台湾听说，被你们抓住了是要被剥皮的。

刘，你被击中前看到台湾了吗？

叶：看到海了，眼看就要回家了。

刘：被击中时有什么感觉？飞机有防御武器吗？

叶：没有。凭它的高度优势，你们的飞机对它没有办法，唯一怕的就是飞弹，知道大陆上到处有飞弹阵地，我们的航线尽量避开。

刘：你这么年轻，在那边的环境里，你不当飞行员也得有别的人去当。你现在不可能一下子相信我们的话，你对我们的政策可以一步一步地看。你以后的事，可以商量。你想回去，也可以，可能要等到将来。

叶常棣被击落的当天下午，国民党空军总部宣布：“我空军高空侦察机一架于11月1日下午在匪区上空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失事。”矢口否认叶常棣是被我空军击落的。5个月后，国民党空军在“青年节”正式文告中，称叶常棣“壮烈成仁”。国民党军队出版的《忠烈传》形容叶常棣的“忠心可问天”。

此后不久，“黑猫中队”的另一位飞行员梁德培少校驾驶U—2在台湾外海高空训练时，由于转弯时失控而坠入海中。梁德培虽然跳伞成功，却溺水而亡。

“黑猫中队”虽然损失惨重，但也确实为美台弄到了不少我方的重要军事情报。蒋介石也经常过问U—2的侦察行动。有一次，蒋在过目U—2拍摄的高空侦察照片时，特意问起有没有拍摄到他家乡溪口的照片。为此，后来国民党空军专门派一架U—2到浙江奉化上空为蒋拍摄家乡的照片。照片送至总统官邸时，蒋介石看后很是高兴，其中有一张连蒋母的坟都照得清清楚楚。

对于屡立战功的导弹二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英雄营”称号，并高度评价二营的功绩。

1964年5月8日，二营奉命撤出内蒙，风尘仆仆，南下千里，赶往福建漳州设伏。

就在我人民空军张网待猎的同时，美台方面也在策划新的侦察行动。6月间，国民党空军派出“头号王牌”飞行员李南屏，驾驶U—2转飞菲律宾空军基地待命。李南屏领受的主要侦察任务是：中国第一次核试验进行最后组装阶段的有关情报和中国支援北越的补给情况。

李南屏在台湾军界赫赫有名，早在1957年即驾驶RF—84F侦察上海，被解放军战机击伤，侥幸逃生。因此，由中尉晋升上尉，后任国民党空军第六大队四中队少校分队长。1963年2月，与叶常棣一起到美国接受U—2训练。回台湾后12次驾U—2窜入我领空侦察，12次平安返回。蒋介石先后四次召见这位“克难英雄”、“飞虎英雄”。

7月7日，李南屏驾驶U—2飞向我领空。为了配合他的行动，台湾方面先后出动一架U—2和一架RF—101侦察机，借以分散解放军防空部队的注意力。这些飞机的行踪，都被解放军的雷达所掌握。

在漳州导弹阵地上，已升任副师长兼师参谋长的岳振华端坐指挥车。这位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指挥官是我军第一个100毫米高射炮团的首任团长，担任导弹营长后，战功卓著。半年前，被国防部授予“空军战斗英雄”称号。这时，岳振华正全神贯注地捕捉着战机。

12时25分，李南屏驾U—2飞入我领空，直奔漳州而来。12时36分，U—2飞至导弹阵地23公里处，3发萨姆—2升空迎敌。U—2飞机上的预警系统发出警报，看到仪表盘上高频重复脉冲信号灯急闪不停，李南屏一边向台湾惊呼：“12号高频灯亮起！”一边操纵飞机以30度的大坡度转弯脱离，但为时已晚。原来解放军空军在上饶击落叶常棣后，在其座机残骸中发现电子预警装置，并根据该装置的工作方式，制定了反预警措施，未待李南屏逃脱，近在咫尺的导弹早已轰然爆炸，将这架U—2击中于万米高空。按照台湾国民党空军的规定，驾U—2进入我领空侦察10次即可转飞其他机种，李南屏自恃技艺高超，打破常规，坚持驾U—2继续向我窜犯侦察，终于在第13次出航时命归黄泉。

这架U—2的残骸坠落于漳州东南7公里的红板村，李南屏死于座舱内，解放军空军在检查敌机残骸时，发现有两个不解之谜。其一，这架U—2飞机的座椅装置没有装药，是美国飞机没有安装，还是安装了被人卸掉了？至今没有答案。其二，在座舱中丧命的飞行员身上没有携带任何证件，仅在其手上发现一枚刻有“叶秋英”字样的金戒指。当时，解放军空军对李南屏的名子和身份一无所知，于是人们想到了叶常棣。通过询问叶常棣，方知叶秋英是李南屏的妻子。这样才得以确认死者竟是国民党空军的头号王牌——李南屏。

漳州之战结束后，解放军空军给中央军委写了战斗报告。毛泽东同志阅后，在报告的一侧写下一行大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

7月23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地空导弹部队第二营全体官兵。毛主席说：“你们是二营嘛，你们什么时候再打下一架飞机呀？”

他还饶有兴趣地对刘亚楼说：“为什么不让别的营也去打仗，都锻炼一下嘛。蒋介石就那么几架飞机，不够打得嘛。不要老叫二营去，别的部队也

可以去嘛。”

1964年10月16日，我成功地在新疆罗布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空军亲自出动，搜集核尘样本，化验分析的结果出乎意料。为了更准确地掌握中国的核情报，美国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兰州和包头核原料制造工厂的侦察。并决定给U—2装备红外线夜间摄影设备和新的欺骗回答式干扰系统。

1964年11月初，夜间红外线摄影装置运抵桃园机场。兰州成为U—2夜间侦察的首选目标。这次侦察任务由国民党空军少校王锡爵担任。王锡爵1943年在重庆考入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1948年进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到台湾后成为喷气机飞行员，驾驶U—2机才一年的时间。

王锡爵是在夜间起飞的，起飞后直奔我国西北方向而去，但不久机器即出现故障，初次出师不利，只得返航。这次出航。台湾方面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暴露了U—2的夜间行踪，使解放军得知U—2还可在夜间出动，随即也加强夜间戒备。

11月26日凌晨，王锡爵再次出航。U—2由福建连江进入我领空，向兰州方向飞去。5时10分，U—2即将到达预定的目标区。这时，机上的预警灯突然亮起，王锡爵意识到地面的导弹已对准自己，准备转向。驻守兰州的地空导弹二营动作更迅速，3发导弹直射夜空。几乎同时，U—2机上的干扰系统也开始对制导雷达进行欺骗回答式干扰，导弹没能击中U—2。惊魂未定的王锡爵将飞行高度下降3000米，然后把飞机拉起，快速返回。这次侦察飞行没有拍摄到地面的核设备，但却将截杀王锡爵的萨姆—2导弹收进了镜头。

兰州一战失利，引起解放军空军高层领导人的注意。成钧副司令员根据罗端卿总参谋长关于“要认真找出没有打好的原因，接受教训”的指示，当天就赶到现场，同各营的领导干部一起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在制导雷达上加装新研制的反干扰设备，以对付U—2的回答式干扰系统。各营随即加强了反干扰和夜间训练。

1965年1月8日，王锡爵又一次从桃园机场起飞，执行侦察兰州的“A计划”。在黄河附近，机上的红外线摄影机对一处工业中心进行了拍照。这次出航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决定下次继续对包头进行侦察。

1月10日18时，曾被评为蒋军“克难英雄”、两次获蒋介石接见的少校飞行员张立义，驾驶着3521号U—2机升入茫茫夜空。

19时56分，该机从山东海阳进入我领空。

这次出航前，上司曾告诉他：“这次是按照最新情报定下的航线，航线上绝对没有共军的飞弹部队。”事实上，在张立义的飞机起飞前解放军就获得了情报，并做好了截击准备。

张立义驾驶着U—2经黄骅、大同，很快进入内蒙古地区上空。此时，化装成“地质勘探队”的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第一营正在内蒙古萨拉奇恭候他的到来。

21时15分，3发萨姆—2导弹喷着火舌划破夜空。此时，在20000米高空的张立义始终没有接到自动报警器的报警，解放军的“反电子预警2号”装置已经使U—2的欺骗回答式干扰系统失灵。面对显示器上出现的乱糟糟的小亮点，张立义有些迷惑不解。如果遇到导弹攻击的话，应该显示一条平稳的亮线。正在犹豫间，一团炽烈的火球已经窜到他的机翼下。张立义意识到自己的飞机已被飞弹击中，迅速拉了自动弹射装置的开关。随着爆炸声，他被弹出机舱外，降落伞带着他落到冰冷的雪地上。

U—2 被击落后，解放军和当地民兵迅速出动，去残骸现场及周围的荒野中搜寻跳伞的飞行员。此时，已经苏醒过来的张立义看到远处有灯光在闪动，还隐约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他想站起来，可是身上的伤痛使他动弹不得，只好晃动随身携带的电筒。由于正在搜索的民兵手中也都拿着手电筒，所以没有人注意到张立义的电筒发出的灯光。渐渐地，人们都远去了。后来，饥寒交迫的张立义在雪地里爬了 8 个小时，终于爬到了一个农妇家中，后被当地民兵送了解放军，终于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1 月 11 日，台湾方面宣布：“空军少校张立义不幸于 10 日夜驾 U—2 侦察机到大陆执行任务时殉难。”当天中午，台湾国民党空军司令徐焕升上将专程前往东港，慰问张立义夫人及其子女和岳父母。此时，张立义正在内蒙古上默特旗沙海子公社一间屋子里吃着热乎乎的鸡蛋面条。

在此之后，我国又接连试爆了数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也获得重大突破。1967 年 7 月 5 日，“黑猫中队”的又一名飞行员庄人亮，驾驶 U—2 从泰国泰克里基地起飞，飞越缅甸、西藏到达罗布泊。此次飞行，成功地拍摄到了罗布泊地区的照片。在我国的第一颗氢弹试爆后，又有一名“黑猫中队”的飞行员深入新疆侦察。由于喜马拉雅山东部没有解放军的导弹部队，这一次“黑猫”又得以安全返回。

这些胜利使美台方面甚为得意，甚至认为因中苏关系恶化，我已失去导弹的来源，殊不知，我国已经成功地对萨姆—2 导弹进行了仿制，并在此基础上制造出新型的红旗—2 地空导弹，组建了更多的地空导弹部队。

1967 年 9 月 8 日，一架 U—2 从桃园机场起飞后直线北上，由苏北启东入陆，经松江、杭州湾，准备侦察嘉兴机场。驻沪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接到敌情通报后，很快做好迎战准备。U—2 很快飞临嘉兴机场，并不断地向地面制寻雷达施放干扰。当 U—2 与导弹阵地相距 32 公里时，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第十四营副营长夏存风一声令下，3 发红旗—2 导弹将这架 U—2 击落。驾驶这架飞机的飞行员黄荣北成为被我空军击落的最后一名“黑猫”队员。进入 1968 年后，台湾国民党空军停止使用 U—2 对我内陆地区进行纵深侦察。

在 6 年的时间里，台湾国民党空军的多名飞行员共驾驶 U—2 侦察机对我进行侦察 110 架次。这些飞行员都是台湾空军的佼佼者，但其成为“黑猫”队员后却都面临着坎坷的命运。陈怀、李南屏、黄荣北在行动中丧生。叶常棣、张立义被我军俘获。后来，叶成为华中工学院的副教授，张成为南京航空学院的工程师。

1982 年 11 月，我国有关方面批准他们返回台湾。但由于台湾当局早已宣布他们“殉难”、“成仁”，加之与美国合作的许多内幕尚未解密，台湾以反对“统战”为借口，拒不批准他们返台与家人团聚，叶、张二人有家难归，成为“失落的黑猫”。

在返回台湾无望的情况下，叶长棣只好到美国投亲靠友，定居于休斯敦。张立义也到了美国，在华盛顿附近安身。直到 1990 年 9 月，台湾当局才允许两人返回台湾。9 月 3 日，叶、张两人联袂乘华航班机从洛杉矶飞回隔绝二十多年的家园。当年出征的年轻飞行官，归来时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

当年多次死里逃生的王锡爵，于 1967 年转业到“华航”任飞行员，生活条件十分优越。但他却做出了与叶、张二人相反的选择。1986 年 5 月 3 日，王锡爵驾驶波音 747 货机从曼谷起飞后改飞广州，要求在祖国大陆定居。此后，王锡爵成为北京民航局副局长兼副总飞行师，并被选为民革中央委员和

全国政协常委。

第十一章 较量雇南中国上空

炮弹打光了，飞行员驾机向敌机撞去……

雷这技师文德贵爬上旋转天线，手按蓄电器随车转动 48 分钟 288 圈，
保证战斗取得胜利

大水冲了龙王庙，美机发射的导弹将自己的同伴击落
美飞行员史密斯说：中共空军的“刺刀见红”太可怕了

1964 年 8 月初，美国为了支持南越政权，制造了“北部湾事件”，悍然向越南北方发动空袭。一时间，中国西南边境也蒙上了战争的阴影。

为了保卫中国领空的安全，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于 8 月 5 日下令有关军区和兵种，进入战备状态，严密注视美军动向，以对付可能出现的突然袭击。

当时，中国空军在中南、西南边境地区只有南宁、遂溪、蒙自、昆明等几个机场，驻有两个歼击航空兵师部和 3 个具有作战能力的歼击航空兵团，在昆明没有一个军级指挥机构（简称昆指），沿边境一线部署少数雷达兵分队，防空力量十分薄弱。

接到加强战备的命令后，空军对中南、西南地区的作战进行了通盘研究，基本指导思想是：既要适应紧急战备行动的需要，又要照顾到长远建设，将这一地区纳入国家防空体系的组成部分来进行建设。遂命令昆指和广州军区空军等指挥机关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将驻广东兴宁的空军第七军军部调往南宁，担任广西和雷州半岛地区的作战指挥；将驻浙江衢州的歼击航空兵第十二师、驻福建漳州的高射炮兵第三师调至南宁，驻昆明的歼击航空兵第十七师师部率领五十一团进驻蒙自，该师四十九团从唐山转至昆明；歼击航空兵第二十六师（遂溪）、九师（广州）就地做好战斗准备。另指定 8 个航空兵师又一个团为第二梯队。对雷达情报、通信导航、工程机务、后勤保障也作了相应的准备，并在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新建和扩建了一批机场及配套的指挥保障设施。这次部署调整行动迅速，一个师接到行动命令后，一般只用 3—5 天的时间即到达指定的地点，完成战斗准备。

从 1964 年 8 月中旬开始，美军出动 U—2、无人驾驶飞机对越南北方进行大面积侦察，出动战术战斗机在北部湾附近地区上空频繁活动，并不断入侵中国领空。

1965 年 3 月 2 日以后，美军开始对越南北方连续轰炸，并使用 B—52 战略轰炸机实施夜间空袭。4 月 8 日、9 日，美方出动军用飞机入侵中国海南岛上空，并向中国海军航空兵担任警戒巡逻的歼击机发射导弹。鉴于此，中央军委决定对入侵中国领空的美军用飞机实行“坚决打击”的方针。4 月 12 日，空军制定了对付美机挑衅的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空军部队既要准备在边境地区与美机打空战、反轰炸，还要准备在纵深地区打更大的、持久的空战和反轰炸。

1964 年至 1969 年美军人侵中国领空的军用飞机主要是无人驾驶侦察机和战术战斗机，中国空军对其进行了有力的打击。

美国以无人驾驶侦察机对中国进行侦察始于 1964 年 8 月 29 日。当日，美军从冲绳加手纳基地起飞一架 DC—130 运输机，在南海上空投放一架无人驾驶机，从海南岛海口入境，经南宁、兴宁、漳州、厦门出境，至台湾湖口

回收。9月至10月上旬，又连续从南海上空和南越边境投放无人驾驶飞机6架次，入侵中国领空。当时，美军使用的是一种BOM—147G型无人机，它的特点是体积小、飞行高度可达2万米、侦察设备好，可以回收多次使用，是一种廉价而有效的侦察工具。起初，由于对其性能和活动特点不甚了解，中国空军虽多次出动飞机拦截，都未获成功。10月13日，美军的一架无人机从友谊关入境，至广西地区侦察。航空兵第一师起飞一架歼—6飞机截击，在1.76万米的高度发现目标，3次开炮，打光了炮弹也未击中要害。飞行员决心驾机撞坏敌机，因动作过猛，飞机进入螺旋而未能脱出，飞行员跳伞，飞机坠毁。

对美军无人驾驶侦察机作战，屡战不果，空军领导机关和作战部队都甚为焦虑。1964年10月15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率工作组赴广东遂溪，召集指挥员、飞行员和有关战勤人员开调查会，进一步弄清了无人驾驶侦察机的性能、特点，分析了多次战斗未能击落敌机的原因，肯定了飞行员的勇敢作战精神。刘亚楼指出：尽管敌机体积小、飞行高度高，但它的弱点是速度小，没有主动规避和还击能力。击落这种飞机的关键是要精确地对歼击机进行指挥引导，压准目标航迹。飞行员要采取正确爬高方法，熟练操纵技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瞄准、射击、脱离等一系列战斗动作。使用现有装备击落敌机是完全可能的。在作战指导思想，要力求稳妥，刻意求精，必须在保存自己实力的前提下，歼灭敌机，防止蛮干。

为此，决定在南宁、遂溪、昆明、蒙自等地设立高空作战点，配备精干的歼—6、歼—7作战分队和指挥保障班子，苦练打无人驾驶侦察机的技术、战术和协同动作，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训练和准备，航空兵第一师作战分队于1964年11月15日第一次击落一架无人驾驶侦察机。

那天，雷州半岛天气晴好。11时53分，雷达于海南岛陵水以东170公里发现无人驾驶侦察机一架，航向西北，直指涠洲岛，高度1.76万米，时速780公里。11时58分，驻遂溪机场航空兵第一师作战分队中队长徐开通，奉命驾驶歼—6飞机升空拦截。12时20分，飞机爬高到1.62万米，时速780公里。22分，徐开通作跃升动作，高度升至1.75万米，距目标还有1500米。徐开通放减速板，从目标后下方5度角进入攻击。距离400米时开炮两次未中，距离230米时第三次开炮，终于击落了敌机。

通过这次战斗，摸到了打无人驾驶侦察机的基本方法。由于这种飞机是按预定诸元作等速、定点、直线航行的，故其机动性能差，要成功地将其击落，首先地面领航必须精确引导歼击机压准目标航迹，使其在接敌时与目标保持同一航迹。其次，由于目标高度高，已超越歼击机的升限性能，歼击机必须经过积累速度后跃升，方可达到相应的高度，这就要求飞行员必须掌握飞机跃升的时机和方法。第三，歼击机跃升到顶点高度后，其位置应正好在目标尾后400米至200米的有效射击距离内。因为，这时飞机的升力已不能保持平飞，只能作短暂的停留，如果位置不适当，就会失去攻击机会。第四，对无人驾驶侦察机射击应使用固定光环瞄准，一般在400米进入，150米脱离。要做到上述四点，地面指挥所和飞行员必须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实施过程中还要紧密配合。歼击机飞行员对于跃升、增进、减速、攻击、脱离等飞行动作必须非常熟练，同时对于飞机停车、失速、进入螺旋等意外情况，应预有处置措施。

1965年1月13日3时55分，航空兵第一师驻南宁的作战分队副中队长

张怀连，驾驶歼—6 飞机于广西灵山上空，又击落一架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这次作战的特点是，目标航线曲折，在 900 公里长的航路上先后转弯 6 次，可利用的截击地段只有 120 公里左右。由于地面的准确引导，飞行员采取正确的跃升方法升到 1.77 万米高空，在距目标 175 米时开炮，共发射了 44 发炮弹，将敌机击落。

这两次战斗的成功，为对付无人驾驶侦察机打开了局面，周恩来、叶剑英和罗瑞卿等领导人于 1965 年 1 月 9 日在北京接见了作战有功人员，对他们准确的作战指挥，高超的作战技巧和英勇顽强的作战作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罗瑞卿指出：我们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必须学会又集中又分散的两手，集中以歼敌大股，分散以打敌单机。盼望同志们共同努力，不断总结，不断提高。

1965 年初，毛泽东主席俞令海军航空兵第四师转进海南岛，抗击入侵挑衅的美机。

1965 年 2 月 20 日，海军航空兵四师参谋长辛英元奉命带领十团大队长张炳贤、副大队长舒积成、中队长王相一等空地勤人员 29 人，配备歼—6 机两架，组成机动作战小分队，首批转进海南岛海口机场，专门对付美军无人驾驶侦察机。

小分队集中全力攻克高度难关。他们一方面尽量减轻飞机的重量，一方面学习空军的经验，利用飞机向上跃升的惯性提高升限，达到新的高度。小分队认真演练，终于跃升到 18600 米的高度。接下来，他们苦练射击本领，以达到稳、准、狠地开炮打击敌机。飞行人员不仅在空中反复练习，回到宿舍也把模型挂在床前，潜心琢磨在高空的射击要领。

1965 年 3 月 24 日，美军又派出无人驾驶侦察机一架侵入海南岛万宁上空。王相一奉命单机起飞拦截。13 点 50 分，王相一在高度 1.6 万米、距离 3800 米时跃升逼近，连续 3 次开炮。美机左翼被击中，随后坠入海中。小分队第一次取得了胜利。

此后美军也变换了无人机的高度以及机动能力和范围。1965 年 4 月 3 日，一架美无人驾驶侦察机入侵广西崇左县上空。这次高度是 1.81 万米，从进入我国边境到飞至南宁的 135 公里的距离内，作了 5 次蛇形机动，这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空七军指挥所指挥航空兵第十八师五十四大队一中队长董小海，采取提高接敌转弯高度，压缩截击地段，用“缓转弯，小坡度，外侧跟踪”的方法，即在敌机转弯机动时不立即跟踪，待敌机转到一定角度时再稍压坡度，在其外侧跟踪，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歼击机在转弯时不损失高度。这次在 1.81 万米的高度作战，超过了歼—6 的极限高度。战斗过程中，飞机曾两次失速。董小海沉着冷静，及时脱出。为了及时测出敌机的机动状态，地面引导雷达的倾斜天线因频繁俯仰，造成继电器故障。在关键时刻，雷达技师文德贵勇敢地爬上旋转天线车，用手按住继电器，随车转了 48 分钟、288 圈，战斗终于胜利了。战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董小海等战斗有功人员，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该中队“航空兵英雄中队”的荣誉称号。

1967 年 6 月 12 日，美一架 BQM—147H 型无人驾驶侦察机入侵广西上空。航空兵第三师飞行员刘光才驾驶歼—7 截击。在地面指挥所的准确引导下，在时速大于敌机 400 公里的情况下冒着与敌机相撞的危险，勇敢地接近敌机，至距离敌机仅 180 米时开炮攻击，一举将其击落。

从 1964 年 8 月至 1969 年底，美军无人驾驶侦察机共入侵中国领空 97

架次，被击落 20 架（其中空军航空兵击落 14 架，地空导弹部队击落 3 架，海军航空兵击落 3 架）。

为了同美国的战术战斗机的入侵活动进行斗争，空军一方面在接近中越边境地区的凭祥、蒙自等地部署了一些高射炮部队，另一方面，在部队中开展了打击入侵美军战术战斗机的战术训练。

1965 年 4 月 9 日，美军 8 架 F—4B 鬼怪式超音速战斗机突然入侵中国海南岛上空。这种战斗机的最大时速为 2338 公里，实用升限 15300—18000 米，每架飞机上携带 4 枚麻雀—3 型导弹，每枚导弹内装有 6.6 公斤烈性炸药，杀伤半径为 12—15 米，可在任何气象条件下发射。飞机上还装有搜索警戒雷达。

南海舰队航空兵指挥员命令航八师派歼—5 飞机起飞。航八师的装备落后于美军，但接到命令后立即投入战斗。大队长谷德台带领歼—5 中队迅速飞向战区，2 号机、3 号机、4 号机分别由程绍武、魏守信、李大云驾驶。这时第一批美机已经逃走了，指挥员果断地决定打击尚在中国境内的第二批美机。谷德台率队按地面指挥员引导穿出云层后，李大云首先发现目标，并迅速逼近美机 300 米左右，请示攻击。谷德台掌握对美机不先开炮的原则，令李大云退出。李大云退出时，美 3 号机却突然迫近李大云后方，李大云急忙左转，再次逼近美 3 号机，并请示攻击。现代高速飞机空战变化极快，成败取决于毫秒之间。李大云请示攻击还没有听到指挥员的答复，美 4 号机旋风般逼近李大云身后，连续施放两枚麻雀—3 型导弹。由于李大云正好侧身急转，这两枚导弹并没有击中李大云，却击中了前面的美 3 号机。美 3 号机当即起火，坠落于海南岛莺歌海地区。这时，传来了我师指挥所愤怒的声音：“坚决回击！”美机两架正成左梯队迅速向谷德台逼近，魏守信、李大云当即向美机扑去。美机慌忙中把剩下的导弹射出，导弹在离谷德台很远的地方爆炸了。魏守信、李大云乘美机发射导弹后，分别向左右转弯之际，准备实施截击，美机以大坡度下滑逃走。我地面指挥员考虑到飞机燃油剩下不多了，便下令返航。

这次空战，中美双方使用的兵力是 4：4，美机的性能和武器都占优势。谷德台中队始终坚持四机一体，集中兵力近战格斗，将对方四机分割为二，使其相互难以兼顾。在与美机周旋的过程中，谷德台中队既严格遵守对敌斗争的对策，又不给对方以可乘之机，未放一炮一弹，而美机连续施放导弹，反而击中了自己，在世界空战史上又加上了一段趣闻。

1965 年 9 月 20 日，美国一架 F—104C 型战斗机飞临海南岛西岸，向北移动。随后，在白马井以西领海上空忽进忽出，擦边挑衅。F—104 是美国当时的先进飞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设计制造。最大时速为 2400 公里，实用升限 17680 米，可以在空中加油，机上除机关炮外，还可携带 2—4 枚响尾蛇导弹。海航四师十团大队长高翔、副大队长黄凤生驾驶歼—6 型机起飞。狡猾的美军始终在中国领海领空时出时入。南海舰队航空兵指挥所机智地将高翔双机引导到加来地区，迷惑敌人。美机果然改变航向，横穿雷州半岛。指挥员急令高翔前去截击。高翔和黄凤生按照地面引导迅速折回，在距离目标 30 公里时，以最快的速度向正在爬高的美机扑去。高翔从距离 291 米处开炮，直打到 39 米，美机顿时凌空爆炸，向下坠落。高翔自己的飞机被美机爆炸的碎片击伤多处，一台发动机停车。高翔沉着冷静地依靠另一台发动机，驾驶着飞机同黄凤生一起胜利返回基地。被击落的美机飞行员菲利普·史密

斯跳伞被海南民兵生俘后，心有余悸地说：“这样近的距离开炮，太可怕了，这是一次我看也不敢看、想也不敢想的战斗。”

周恩来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接见了高翔和黄凤生等作战有功人员。周总理非常高兴地说：“仗打得好！希望你们打更多的胜仗！”

1965年10月5日，美军有3批13架次战术战斗机，先后4次入侵广西凭祥地区的领空。12时28分，空军第七军指挥员命令驻南宁航空兵第九师副中队长张运宝率4架歼—6飞机，以高度6000米隐蔽出航，到龙州上空待命。12时35分，4架F—4C战斗机掩护一架RA—3D侦察机在隘店附近入侵中国领空纵深达30多公里。我空七军令张运宝4机投掉副油箱，增速爬高，急取战术优势。36分，张运宝报告：左前上方5公里发现一架RA—3D型飞机。空七军指挥员命令：“后面没有情况，放心打！”张运宝4机随即拉开战斗队形，进行轮番攻击，将其击落。这是空军在西南边境打击美机入侵的第一次成功战斗。

1966年至1967年，美军扩大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入侵中国领空的战术战斗机增多。

1966年4月12日，航空兵第二十六师飞行员李来喜驾驶歼—6飞机在雷州半岛上空击落美A—3B攻击机一架。5月12日，第二十一师飞行员朱嗣瑜驾驶歼—5飞机在云南马关上空击伤一架RB—66飞机。9月9日和9月17日，第十八师飞行员高秀明、副大队长高长吉驾驶歼—6飞机，分别在广西东兴、友谊关以北各击伤F—105战斗机一架。12月中旬，空七军将高射炮兵第十师三十团调至靠近边境的峒中地区设伏，同时驻宁明、南宁的歼击航空兵采取在边境内侧20—30公里地区划分若干待战空域，适时地组织歼击机低空待机。以保证在美机入境时，能快速投入攻击。

1967年4月24日至8月21日，中国空军高射炮兵和航空兵部队打了3仗，3仗3捷，共击落美机6架。

第一仗是在4月24日17时左右，美机F—4B战斗机两架从板兴入侵中国领空，高度1800—2000米。被设伏在该地的空军高射炮兵第三十团击落一架；另一架投掉副油箱和火箭架准备逃走，被航空兵第二十六师中队长宋义民驾驶歼—5飞机击落。F—48飞机最大时速为2300公里，能携带4—6枚麻雀—3型空对空导弹，是美国当时先进的战斗机。而歼—5型飞机则是一种亚音速歼击机。这次战斗所以能击落美机，主要是指挥引导正确、果断和飞行员作战勇敢。地面指挥所通过对空引导，始终把歼击机置于有利的待战位置，当美机侵入中国领空时，即引导歼击机接近其尾后，发起攻击，使美机被动挨打，不能发挥它的性能优势。

第二仗是在5月1日12时50分左右，美海军的3架A—4B型战斗机从峒中西北上空入侵中国。空军高射炮兵第三十团集中人力，在50秒内打掉2架，另一架侥幸逃脱。

第三仗是在8月21日13时左右，两架美海军A—6A型攻击机从隘店附近入侵中国领空。航空兵第十八师副中队长陈丰霞、飞行员韩瑞阶各击落一架，美海军上尉领航员罗伯特·J·弗林跳伞后就擒。

于此同时，海军航空兵还在海南岛上空击落击伤敌机3架。

1967年6月26日14时51分，在海南文昌县东南135公里上空发现美F—4C型战斗机一架，高度8500米，时速850公里。海军航空兵六师指挥员立即命令十六团副大队长王柱书和飞行员吕纪良出战。双机起飞后，快速爬

高到 10000 米，只用了 3 分 33 秒，为迅速赶到战区赢得了时间。此时，战区气象复杂，9000 米上空有大面积的浓积云和积雨云，600 米低空雷丽交加。如此复杂的气象条件对指挥员和空地勤人员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王柱书在 10000 米的高空左转欲向美机发起攻击时，美机突然下降高度，溜出了中国领海线。王柱书便在领海线内巡航，严阵以待。几分钟后，美机从万宁以东又钻进了中国领空。王柱书第二次准备攻击时，美机又突然飞出了领海线。面对这种狡猾的擦边战术，领航员根据指挥员意图，灵活地采用“敌向外，我向内，敌反转，我拉出”的办法，引导王柱书和昌纪良在海岸线上巡逻待机。当美机在陵水 55 公里处右转侵入中国领空时，王柱书立即左转迅速逼近，在距离 250 米时 3 炮齐射，一直打到 204 米，将美机右水平尾翼打掉。接着吕纪良又补了几炮，美机当即爆炸坠毁。

1968 年 2 月 14 日，阴云密布，气象复杂。美空军 A—1 型舰载机 2 架，在陵水以东海面 230 公里处向中国领海靠近。

A—1 型舰载攻击机别名“空中袭击者”，专门用于特种战争。机上配备有 2 门 20 毫米人炮，12 枚 12.7 厘米火箭，还可投掷炸弹、鱼雷和小型核弹。A—1 型机擅长于低空、低速，而且盘旋半径小，机动性能灵活。

航六师副师长矫式峰判断：敌机可能在万宁和陵水之间侵入我领海领空，遂命令十八团副大队长陈武录和飞行员王顺义驾驶歼—5 型机起飞，到达万宁和乐会之间领海线上空巡逻待机。美机依靠低空、低速、灵活的优越性能侵入中国领空后，果然直扑万宁上空。航六师地面领航员根据美机的位置，将陈武录双机引导到与美机航线成 60 到 90 度交叉角，背向阳光占据内侧有利位置。陈武录在距离 15 公里处发现目标，但由于美机速度小，陈武录双机速度快，引导出击时机稍晚，不利于攻击。陈武录机智地让美机冲过侧后方，再向左急转隐蔽进入攻击，连续三次开炮，从距离 310 米打到 231 米，将美僚机击落，美飞行员跳伞逃命。王顺义迅速扑向美长机两次开炮。从距离 362 米打到 91 米。美机被击伤后逃不多远，坠落在南越岷港海面。

海军航空兵从 1965 年到 1968 年奉命到海南岛上空抗击美机入侵，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先后击落美机 7 架，击伤一架，自己却无一伤亡，创造了“8：0”的最佳战绩。

1968 年 11 月，美国被迫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中国西南边境的空中战斗渐趋缓和。

第十二章面对禁区和死神

超级大国企图挟“恐怖之神”以令“诸侯”

毛泽东：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四人家就不算数
穿越蘑菇云，飞机可能被焚化，核沾染可能会杀害飞行员的生命，可
什么也不能阻挡蓝天骄子义无反顾的赤诚
“穿越蘑菇云之后，白细胞一下子少了许多，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飞行员似乎在谈论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
总理也捏着一把汗，原子弹空投卡壳的时刻

1945年7月，战争狂人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日本经济已经无力支撑战争，其海军虽然已经损失殆尽，但日本本土上仍然有300万陆军固守，如果美国进入日本本土作战，那些“武士道”军人还真的够盟国军队打一阵子的。

在攻打日本冲绳岛时，美国投入50万兵力攻打只有11万日本军人守卫的冲绳岛，等到美军占领冲绳岛时，他们已经付出了牺牲5万官兵、84艘军舰的沉重代价。

美国军事指挥官知道，如果攻打日本本土，美国就得有100万官兵血染大海！

为此，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建议杜鲁门总统使用原子弹，以瓦解日本人的抵抗意志。

广岛，日本本州西南部的海港城市，是日本军国主义机械、造船工业基地。1945年8月6日，美国的飞机在这里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顿时，“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火球，刺伤了数万生灵的眼睛，天崩地裂的巨雷劈向大地，巨大的冲击波像狂风扫落叶下样，摧毁了地面的楼房和建筑，顷刻之间，秀丽的滨海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

生灵涂炭，血雨腥风，核裂变释放出来的可怕能量，毁灭了20多万生命。广岛上空的人光印出了一幅毁灭的画面。

三天之后，美国的B—29轰炸机载着死亡之神，又扑向了长崎……

长崎又有15万多人丧身！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签发了《投降诏书》。

战争结束了。

自此，核武器成为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象征。成为霸权的支撑，也成为和平的盾牌，二战以后，原子弹成了一个国家武装力量的标志，许多经济大国都在努力寻求和拥有它。

1949年8月29日，前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

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给英国以很大震动，上层经过激烈辩论，决定加快原子弹研究步伐。1952年10月3日，英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52年10月31日，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氢弹爆炸，当量约为1000万吨，比原子弹的威力大500倍。

1953年8月12日，苏联也进行了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

1957年5月，英国又在太平洋圣诞岛上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

1960年2月13日，法国在法属西非撒哈拉大沙漠成功地进行了第一颗

原子弹试验。

为了维持核天平的平衡，政治家们运筹策划，天空、大地、海洋直至数百米的地下，掠过一阵又一阵冲击波，闪烁着看见看不见的强烈光辐射。

一时间，美苏竞相开展了用于战争的大气层、地下、水下核爆炸试验……

仅1958年，美国的核试验就达66次之多，10月份竟试验了25次，甚至有一天在18个半小时之内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了三种方式的核爆炸。

严酷的现实使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不得不铸造自己的核盾牌。

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对搞原子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一年的国庆，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参加。10月3日，中、苏首脑在中南海进行会谈。

“你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赫鲁晓夫问。

“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毛泽东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你们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赫鲁晓夫愣了一会儿，很快做出了明确的拒绝。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以。”

于是，中国人民开始勒紧裤带搞“两弹”（导弹、原子弹）……

经过六年的奋斗，中国的“和平婴儿”已经是十月怀胎，即将分娩。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核试验场。辽阔的大戈壁，笼罩着一片紧张而又神秘的气氛。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张爱萍将军坐阵指挥。

准备穿云取样的飞机，在指定的位置待飞。郭洪礼机组的5名成员，关注着爆心。

随着电子表的显示，一个“起爆”命令声之后，一股庞大的蘑菇云旋转升腾，冲上苍穹……

“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张爱萍立即要通了北京的电话，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激动地对着话筒说。

“你们能不能肯定是核爆炸？”总理的声音也有些异样。

“我们看到了蘑菇状烟云。取样飞机已经进入烟云上空，正式结果出来我们及时报告。”张爱萍放下话筒，抬头望着天空。

飞机穿云取样，成为北京和核试验场关注的焦点。

郭洪礼机组驾驶着伊尔—12从7000米的高度钻进了蘑菇云……

地面上的许多人都捏着一把汗。飞机进入蘑菇云后，会不会被烧化？蘑菇云从戈壁滩卷起的沙砾和石头，会不会损伤飞机发动机？在强烈的气浪颠簸中，飞机会不会折断“翅膀”？蘑菇云中的核沾染，会不会伤害飞行员……

尽管科技人员对飞机穿云取样安全程度做过论证，指挥所也对飞机进云的时间作了限定，但这毕竟是第一次，谁的心里都没有底。因为，原子弹的巨大破坏作用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

眼下，空军的郭洪礼机组5名勇士，面对“骇人”的蘑菇云，冷静地操纵飞机，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蘑菇云内，烟灰弥漫，一片昏暗。飞机被猛烈的气浪抛上抛下，时而大颠大簸，时而乱抖乱跳，几乎失去控制。

郭洪礼和副驾驶李传森尽力保持飞机的平衡，继续向前冲刺……

收集到足够剂量的样品后，飞机钻出了蘑菇云。

飞机刚刚降落，防化人员便疾步上前，把取来的样品转送上另一架已经发动的运输机。运输机立即起飞，用最快的速度将样品送到北京。

原子弹爆炸后，地面有几十种手段收集样品，但只有派飞机直接进入蘑菇云取样，才能获得评价和分析爆炸效果的第一手重要科学资料。

面对凶猛的蘑菇云，是生与死的考验。担任穿云取样任务的空中英雄们，他们想的是：国家组织一次试验不容易，一定要圆满完成任务。

1972年3月18日，氢弹准时爆炸。

度过了难熬的等待后，陈富华驾机飞上10000米的高空。此时，眼前豁然一亮：发红的蘑菇云带就在前面。他担心云带跑掉，要求提前转弯进云。

“按原计划！”耳机里传来指挥员的答复。

陈富华真怕蘑菇云消散掉，他提前半分钟转弯，冲了进去。

蘑菇云内红光耀眼。陈富华紧握驾驶杆，保持好飞机的状态，盯着剂量指示表。指针噌一下指到了头，剂量超出许多。他一推驾驶杆，钻出了蘑菇云。接着俯冲穿过云下飞扬的尘上，把飞机改平，返回机场。

被送到医院后，高兴劲头过去了，陈富华有点不同寻常的感觉。面前放着许多水果却不想吃；几个战友可以打扑克但他不想打；航医让他出去散步，可他出了门也不想走；说回来睡觉吧，又睡不着，心痛。他心里直嘀咕：邪门！

科学家朱光亚来医院慰问，他抱歉地说，“沾染不好控制，让飞行员‘吃得更多了一点。”

“没有事。我尽了努力，完成了任务，超过一点就超过一点吧。”陈富华笑呵呵地说。

1973年6月27日，碧空如洗，阳光普照，氢弹于12时爆炸后产生的蘑菇云，像一条巨大的烟带，大圆柱似地竖在空中，并在继续上升。

就像发现敌机一样，飞行员高树发非常兴奋，他在11000米高空一按按钮，打开加力，飞机突然一窜，轻微晃动，明显增速，冲向仍在翻卷着的蘑菇云。

“要对准中间部位钻！”高树发心里想。起飞前，科研人员提醒过：“为减少损害，要选择边缘钻，一旦取够就脱离。”但此时他已把自己能承受多少照射量置之度外。他对蘑菇云的中部飞，而且宁高勿低，免得过早出云。

飞机从17500米高度钻入了蘑菇云，座舱外闪耀起金黄色的光斑。高树发有一种全身发热的感觉，好像血液在沸腾。他扫视剂量表，指针迅速上升……

“迅速脱离！”地面指挥所发来命令。

飞机已钻到蘑菇云的中间，剂量表仍在指示。高树发往前松松驾驶杆，使飞机转入下滑状态，迅速钻出蘑菇云，转弯向西返航。

1976年1月23日14时，原子弹在地下爆炸时，已于13时55分起飞的双机正到达距离爆心170公里的位置上。风景泉带着密封头盔，从余光中瞥见了爆炸的闪光。双机在闪光中形成了特殊的编队：飞在后面的僚机李国生，只能埋头看着仪表飞行，不能睁开眼睛；飞在前面的长机却要向后看，同僚机编队……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造成“闪光盲”。

“闪光盲”，就是核爆炸时高温火球辐射出的强光，直接照射人眼而造成的暂时视力下降。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者中，“闪光盲”或者烧坏眼睛

的不计其数。

避开闪光后，风景泉和李国生挺腰抬头飞向蘑菇云。

“进云前，注意山头，高度不得低于2000米！”话筒里传来了郭副军长的声音。

爆炸地区有一座1900米高的山头，要求不能飞得过低。但蘑菇云体积小，云底低，飞得过高又怕取不够样品。风景泉与李国生协调好后，避开山头，按1800米的高度钻进了蘑菇云。接着他轻拉驾驶杆，使飞机上升至1900米，由南向北按20度方向通过。出云后，一看指示表，剂量已经取够。

他想：科学家们都眼巴巴地等着样品，还是多取一点好！于是要求二次进入。得到批准后，他登舵往右转弯240度，由东向西再次从蘑菇云内穿了过去。

十几年后，已任师长的风景泉回忆说：“这次任务很有意思。”

翟守东现任师参谋长，是当年唯一没有结婚参加穿云取样的飞行员。按规定，必须成了家、有了孩子才能参加穿云取样，他可以不参加。可是，他毅然推迟婚期，全身心地投入了1977年9月17日的穿云取样。

“那天，氢弹空爆后，高空风挺大，蘑菇云在七八千米至万米的高空翻腾，远看是白的，到跟前看是红的。像哈密瓜里面的瓢，红黄色，很纯，”他拿起一块红瓢的哈密瓜指着说，“就是这个颜色！”

他由南向北穿过蘑菇云的上部后，已经取够样品。但向地面报告时，他没有说那么多剂量，指挥所只好同意他二次穿云的请求。他登转方向舵回过头来，由东向西压着坡度向二十几公里长的云带斜穿到底部，进行二次取样“原子弹这玩艺是厉害。过去我身体好像虎一样，跑一天不知道累。这次穿蘑菇云回来后，白细胞一下子就少了，浑身没劲。到杭州疗养时，头发一把一把地掉。”翟守东好像在谈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1965年5月14日8时13分30秒，于福海和他的5个伙伴，驾驶一架我国当时最先进的轰炸机跃上万米高空，向祖国西端的某试验场飞去。

飞机升空进入了航线，于福海顿时涌出有生以来最强烈的使命感：弹舱里挂着的那枚被称为“产品”的乳白色球体——我国第一颗空爆原子弹。此刻，投掷开关控制在机组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的手中。

此时此刻，国务院总理的热线电话直通试验场指挥部。这关系到国威振奋、民族强盛的试验，牵动着多少人的心。党中央的关注和期待，数以万计科研人员的血汗和巨大的耗资，都凝聚在这架飞机上，凝聚在机组几个人的一举一动中。于福海更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气象条件不好，能像往常投训练弹那样把这个“真家伙”准确地投向靶场吗？在火光四射、烟云升腾的瞬间，能把飞机迅速驶出危险的空域吗？空投是否成功关系到我国原子弹武器能否投入实际使用，能否拥有我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盾牌！……

于福海心潮起伏，想了很多很多。

向往和平，维护和平，是军人的价值所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类正义事业，空投我们自己的“争气弹”，纵有万千风险，也在所不辞。

十几分钟过去了，于福海的心情逐渐平静。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航程，他领航的这架携带“惊雷”的飞机，在茫茫的云海飞行，向西飞行……

航线上云浪翻滚，于福海心情却分外平静。他对今天的投掷充满信心，再不像训练阶段那么没底了。

两年前，他和王季南等同志一道，协助科研单位测试弹道，那时既无资料，又没经验，全靠自己摸索。于福海和战友们从飞行瞄准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经过反复协同论证，编制出了我国第一代空投核弹弹道表。

1965年春节刚过，上级就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进行空投核试验的命令，并确定李源一力机长、于福海为第一领航员的机组为空投的正式机组。

正值“而立之年”的于福海领受任务后，和战友们在戈壁滩风餐露宿，万里长空苦练精飞，历尽艰辛。

为了达到周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要求，投准成了关键。试验场区的局围，每隔一定距离，都修建、置放了诸如桥梁、房屋、火车、坦克、舰艇各种效应物。投不准，就难以准确检测冲击波、光辐射、政时性沾染等杀伤力，无法获得各种各样的数据。

万米高空往下看，直径200米的靶标，只有5分钱的硬币大小，在高空动态投弹，各层空间的气流变化无常，加上飞机设备有误差，空中差之毫厘，地面相距千米。一连几个训练日，训练成绩都不理想，有一次投下的炸弹差点炸坏效应铁桥。

“于福海技术有问题吧！”

“不行就干脆换人！”

于福海心情很沉重。训练成绩不好，关键在于没有制服高空气流这个拦路虎，如果留给别人就能征服吗？不换人，一旦“零”时投不好，自己这辈子可就窝囊了……

直接指挥试验的张爱萍将军平静地对大家说：“投弹时精神一定不要紧张，投到哪里算哪里。重要的是从中获得经验，为以后的试验打基础。”

副总长的一句话，给大家以很大的力量。高空拦路虎终于被征服了，训练成绩在不断上升……

航程已过大半，云浪渐渐淡薄。这是气象工作者精心捕捉到的局部好天气。

看见了！那5分钱硬币大小的靶标出现在瞄准具里！

于福海迅速求出投弹诸元，与机长李源一商定，爆炸“零”时定为10点整。

关键的时刻到来了！利用飞机最后一次进入靶区上空前转弯的机会，于福海精力异常集中地向机长报告：“接过飞机操纵。”

李源一随即打开自动驾驶仪，把飞机交给于福海：“沉着一点，瞄准时间长一点。”

“零”时在迫近，大家的心在紧缩。7、6、5、4“打开弹舱”。

于福海屏住呼吸，按动了投弹机关。随着飞机轻轻向上一蹿，机组人员的心“咯噔”悬起。于福海紧盯瞄准具十字标线，但见脱钩而出的原子弹直奔靶标。

轰隆隆……弹光闪现，惊雷震空……

于福海忍不住摇开遮光罩一瞥，只见靶标上出现的巨大火球，宛若太阳失落脚下。渐渐地，烟云幻化出酷似和平鸽的图形，仿佛在叙说我国进行核试验的严正立场！

据雷达测定，原子弹爆炸在据靶心40米处。这是一次非常准确成功的投弹。

这时，超短波电台送来地面指挥员激动的声音：“周总理刚才和指挥部通话时，让立刻转告你们，总理说‘你们工作很好。祝你们安全返航，回去后很好地总结经验。’中国沸腾了，世界震惊了。”

当天，于福海成了一等功臣。

几天后，于福海和机长李源一应邀与张爱萍将军同机到达北京，参加周总理举行的庆功宴会。

为了进一步提高核武器质量，增加投掷手段，1971年某部杨国祥同志进行了一次机载甩投原子弹试验，在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风险后，于1972年取得了圆满成功。

当合格的小型原子弹生产出来以后，周总理专门听取了飞机试投情况的汇报，提出万一投不下去，兜也要把原子弹兜回来！还指示空军要设想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要多准备几种方案。

1971年10月30日上午，科研人员将装填完毕的核弹装上飞机。飞机起飞前，某部司令员握着杨国祥的手说：“老杨，祝你成功！”

下午1时，杨国祥驾驶着飞机直冲蓝天，沿着预定的航线准时到达爆炸试验场上空，按程序进行投弹准备。原子弹在飞机上有5道保险装置：装上飞机时解除第一道保险；挂好挂钩解除第二道保险；打开加温开关解除第三道保险；打开时通开关解除第四道保险；按下投弹按钮解除最后一道保险，核弹脱离飞机。然而，当杨国祥做完最后一个动作后，原子弹却在弹舱内纹丝未动。

杨国祥一边报告，一边使用应急方案，未能奏效。紧接着，杨国祥第3次进入超应急方法投弹，仍未成功。此时，飞机的剩余油量已不多了，杨国祥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弃机跳伞，二是带弹着陆。杨国祥想，飞机上载着的东西是无数科研人员的血汗，弃机跳伞，不但会使所有的试验科目前功尽弃，还可能给地面造成难以想象的危害，所以他毅然决定带弹着陆。

飞机载着原子弹着陆，这可是前所未闻的。因为这不是一颗普通的炸弹，这是一颗能够摧毁一座中等城市的核弹，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原子弹没有投出的消息立刻传到北京，周总理指示：要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能力，一定要保证飞机安全着陆，基地人员马上钻地道！

一时间，机场的警报声刺破长空，所有人员包括家属小孩迅速而有组织地进入地下工事。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机场只留下一名指挥员和参谋，其余人员全部进入地道。

整个机场死一样的寂静，担任指挥的宋占元曾经指挥过上千个架次，处置特殊情况也有几十次，然而都没有今天这样的场面：一旦出现意外，飞机、飞行员、指挥员乃至整个机场将会在瞬间消失！

“杨国祥，我在塔台上，机场天气很好，你要沉着冷静，再检查一下挂钩是否确实锁死，一定要保证一次落地成功。”尽管指挥员宋占元心情异常紧张，但他毕竟是个有经验的指挥员，口令显得异常冷静。

“明白！”杨国祥沉着驾驶着飞机飞临机场上空。

“注意检查襟翼、起落架”，“注意调整速度”，“收油门”，“带一点”，“好！”飞机平稳地落地。

原子弹保住了，飞机和各种试验数据保住了，一场可能出现的灾难被避免了。

查明原因后，杨国祥于1972年1月7日，再次进行空投试验。当他熟练

地完成动作以后，明显地感到原子弹已经离机，于是他迅速戴好防护镜，关闭座舱防护罩。30 秒钟后，眼前出现一道强烈的闪光，紧接着是震天的巨响，戈壁滩又一次升起了蘑菇云。

第十二章 蓝天巾帼

约法三章：有男朋友的要断掉，5年内不准谈恋爱

姑娘们真的上天以后

她们穿云破雾，都能在蓝天自由地飞翔，却怎么也没能避开政治风浪。

周映芝，她不得不离开蓝天，折断了飞行的翅膀

她飞行了3865小时，宣布停飞那天她对领导说，外国不是有81岁的老太太还在飞嘛，我为什么不能再飞几年

新中国的诞生，使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劳动人民得到了解放，更使妇女的地位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就决定培养新中国的女飞行员，让妇女也飞上蓝天。

空军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从华东军政大学、航空预科总队选出55名女战士，奔赴牡丹江第七航空学校学习，其中41人学习空中领航，通讯和机械，只有14人学习飞行，她们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女飞行员。她们中有来自湖南的周真明、万婉玲、周映芝，来自上海的何月娟、黄碧云、施丽霞、阮荷珍、陈志英，来自浙江的戚木木、邱以群，来自广东的王坚、伍竹迪、秦桂芳和来自河南的武秀梅。她们14个人组成一个班，组织上任命周映芝为班长，并十分信任地对她说：“你当过女子中学的学生会主席，有管理经验，你不当谁来当？党组织相信你能当，也一定能当好。”

周映芝这位女子中学的学生会主席，是怎么成为解放军战士的呢？那是1950年的深秋，长沙女子中学的毕业生周映芝同时接到了3张录取通知书，一张是燕京大学的、一张是西北文工团的，另一张则是入伍通知书。刚满19岁的周映芝面临着3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燕京大学是人所共知的名牌大学，能成为她的一员是周映芝向往已久的。她也十分有文艺天赋，文工团员也是她很喜欢的工作。然而，她却毅然选择了应征入伍，并在陆、海、空三个兵种中选择了空军。因为她是一名共青团员，她有很高的革命热情，把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视作一种崇高的荣光。

入伍3个月后，正赶上空军招收第一批女飞行学员，她被选中，成为那55名学员中的一员。更令她兴奋的是自己又成为14名飞行员中的一员。她暗暗下定决心，男飞行员能做到的事，我们姑娘也一定要做到。

进入第七航校后，组织上要她们每人写一份保证书，约法三章：有男朋友的一定断绝恋爱关系；在学习飞行的5年内不准谈恋爱；25岁以后再考虑婚姻问题。当时14个姑娘中只有周真明有了男朋友，一下断绝来往她思想上很痛苦。但是，为了早一天能飞上蓝天，姑娘们一门心思地学习飞行，很快把个人的事忘在脑后了。

当时，第七航校的教员主要由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和日籍技术人员担任。使用的教练机是美制PT-19和日制的双发“九九”式，飞机陈旧，器材短缺，机场也被日本人轰炸得像废墟，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加上女学员生理、心理特点，她们面临着比男学员更大的困难。

姑娘们以中国妇女素有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着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但是，她们对日本人当自己的教官颇为不满。

“干嘛让日本人教我们？日本人侵略中国，强奸妇女，干了那么多的坏

事情。”

“我们不让他们教，不让日本人当教员！”

连长对她们说，“他们是日本投降后自愿留下来的，技术不错，经过我们党的教育已经认识到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听说中国要培养女飞行员，感到是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表示要好好教你们，为中国服务。”姑娘们只好接受了这一现实。

第一次上课，她们看到长谷川教官满脸的大胡子，一点笑容也没有，心里挺害怕的。可是一听他那结结巴巴的中文“你们的飞行，我们光荣的，你们好好地学习，奋斗，奋斗！”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14个女学员分成3个组，长谷川带一组，宫田带二组，中国教官赵志雄带三组。大家利用简陋的设备练习驾驶操作的要领，不仅白天练，晚上在被窝里也抓紧时间练。姑娘们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一定要在“3·8”妇女节那一天，自己驾着飞机通过天安门广场，为中国妇女争光。

日本教员不会说太多的中国话，只能用手来比划，主要靠大家自己体会、理解，这样学起来就很费劲。好在上理论课的是中国教员，有些不大明白的问题，再问他们。姑娘们靠自己刻苦努力，认真地学习着一个个的定理和公式。

一天，日本教员长谷川找到班长周映芝，对她说：“我要你做一件事情，把每个学员来月经的时间登记下来，告诉我，立即就去。”

周映芝一下紧张了起来，这个日本鬼子要干什么？她马上找到连长，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连长。

“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连长也没有向她作进一步的解释。她回到宿舍对姐妹们一说，大家都嚷嚷开了：“不告诉他，坚决不告诉他！”后来，她们才知道教员是考虑女同志在特殊时期飞行，身体能不能适应。

学习期间，有4个学员因家庭成员在土改中被镇压，而淘汰做别的工作去了。又从部队的女战士中选了4名补充进来。又经过一个阶段的训练，她们要在教员的带领下上天飞行了。第一次真的飞上天，大家可高兴了，早晨5点多钟就起了床。3个教员各带自己的学员飞行，学员在前座飞行，教员在座保驾。操纵杆是前后座连在一起的，有的学员动作不标准，教员就在后座纠正。

飞机上天后，姑娘们开始都是晕头转向，不知哪是哪。再加上身体不适应，有的一下飞机就吐起来了。尤其是身体比较弱的阮荷珍，下飞机后脸色蜡黄，连站都站不稳了。当时，女学员有一个口号：“决不让一个姐妹掉队！”大家一起鼓励阮荷珍，帮助她克服困难，继续训练。航校校长魂坚也来到飞行现场，鼓励阮荷珍：“只要你自己坚强，就能克服困难，组织上是不会轻易放弃一个学员的。”

姐妹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开始放单飞了。飞机一架架地离地而去，又一架架地安全返回，姐妹们兴奋地议论着在天空中飞行的感觉，可是对于自己到底飞得怎么样，能不能通过教员的考核，大家心中都没有底，一个个在焦急地等待着上级的裁决。

结果终于出来了，大家多数都通过了放单飞这一关，唯独黄碧云一个没有过关。看着大家都能单飞了，黄碧云难过地哭了。姐妹们也很替她着急，领导和教员把大家叫到一起，集体帮黄碧云分析问题，查找原因，并帮助她定出了克服方案，手把手地对她进行训练。为了能让黄碧云和大伙一起飞起

来，姐妹们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向她详细讲解操作体会，对她的弱点采取相应的办法来克服。黄碧云也知难而上，终于也能和姐妹们一起上天了。大家不仅较好地掌握了飞行要领，13门理论课考试，人人都得了满分，圆满完成了速成班的训练任务，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人员以无一人掉队的好成绩全部毕业，分配到空军某航空兵运输机部队工作。

在今天，妇女开飞机算不得稀奇，可是在40多年前，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来说，对于刚刚脱离旧社会苦海的中国妇女来说，上天飞行真是开天劈地的大事情。

当年11月，第一批女飞行员来到成都，正式改装苏式里2型飞机。当时，苏联老大哥送来了7架崭新的里2型飞机，个个银光闪闪。经过4个月改装训练，周映芝第一个放了单飞。接着姐妹们一个一个也都能单飞了。

1952年3月8日，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终身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首都各界妇女代表7000多人、50多个驻华大使偕夫人和中外记者等都来到京郊某机场，参加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起飞典礼仪式。

当时，有的教员还有些担心，要上飞机为她们保驾。班长周映芝当即告诉大家：“不行！你们要上去，别人会以为是你们男同志飞的。谁要敢上去，就把谁关进厕所。”

在盛大的典礼上，朱总司令讲了话，邓颖超大姐也讲了话。气氛十分热烈，欢呼声此起彼伏。

飞行表演开始了，女飞行员共分成6个机组。每架飞机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飞第一架的是周映芝和邱以群，第二架是陈志英和施丽霞，第三架是阮荷珍和何月娟，第四架是王坚和黄碧云，第五架是伍竹迪和戚木木，第六架是秦桂芳和武秀梅。下午1时左右，飞机正式起飞，在机场上空进行了表演之后，从东向西由芦沟桥经丰台、三河县、通县直飞城区，通过天安门广场。

正在中南海办公的毛泽东主席，此时也从屋里走出来，高兴地对在场的其他领导人说：“新中国的第一代女飞行员从我们头上飞过！”

表演结束后，朱德总司令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陪同下，接见了全体成员。朱总司令赞扬女飞行员是新中国妇女的骄傲，是妇女们学习的榜样。女飞行员人人都觉得十分光荣和自豪。在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时，邓大姐问：“刚才飞第一架的是谁？”周映芝立即站起来回答：“报告，是我！”邓大姐拍拍她的肩膀说：“好好努力，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我们女同志也一定能办到！”戚木木代表同伴们表示：“我们一定要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奋斗终身！”人们潮水般地涌过来，为女飞行员们献花，想一睹她们的风采。

当时，大家都有一个心愿，想见见毛主席。但又知道主席日理万机，哪有空闲时间。3月24日终于传来了好消息，毛主席要接见女飞行员。大家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兴奋地把帽子抛向空中，欢呼跳跃。

3月24日下午3点多钟，毛主席穿着一身灰色的便服，在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女飞行员中间。毛主席问站在身边的刘亚楼司令员：“她们都成器了吗？”刘亚楼向毛主席报告：“都成器了！能够独立执行飞行任务了。”

同恩来告诉毛主席，这些女飞行员都很要强，不要男教员保驾，都是自己驾驶飞机接受检阅的。她们还说，如果男教员要上飞机，她们就把他关在

厕所里。毛主席高兴地笑了。至今，第一批女飞行员每个人都保留着当年由著名摄影家侯波拍摄的毛主席兴高采烈地同女飞行员们在一起的照片，这张照片已成为她们一生中最珍贵的纪念品。

接见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她们说：“培养你们花了不少本钱，下一步该你们还本了。你们还得写出保证，5年内不准谈恋爱。你们团长于希河都三十好几了，不是还没有结婚吗，你们着什么急呀！”

刘司令员的话把大家都说得哈哈大笑起来，却把于希河弄成个大红脸。

女飞行员们经过复杂的气象训练后，开始独立执行飞行任务。第一个单独执行飞行任务的是秦桂芳机组。当时，秦桂芳感到责任重大，毕竟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啊！任务完成得好坏，将会影响到今后的女飞行员单独执行任务时的信心。姐妹们鼓励她：“你大胆地飞吧，发挥出最好水平，为咱女飞行员打响第一炮。”秦桂芳果然不负重望，顺利完成了任务。以后，她们都相继单独执行任务了。

那时，女飞行员的任务很多，东西南北哪里都去。有一天晚上，部队正在开节日晚会。突然接到紧急任务：乌兰浩特钢铁厂锅炉发生爆炸，急需焊接氧气，要求立即派飞机到包头装上氧气，转飞乌兰浩特。时间紧，任务重。上级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伍竹迪机组。当时，乌兰浩特机场上空的天气情况十分恶劣，机场通讯、导航设备也不很完善，跑道既短又窄。

伍竹迪机组根据所执行任务的特点，连夜做好准备。第二天黎明就驾驶飞机起飞了。飞机到包头装上氧气后，立即飞往乌兰浩特。途中重峦叠嶂，强大气流将飞机抛上抛下。伍竹迪和机组的同志们稳稳地驾驶着飞机，傍晚准时抵达乌兰浩特机场上空。在机场上空发现跑道太短，按正常着陆方法无法着陆。伍竹迪机组就采用小下滑角度、大油门、尽量减低飞行速度的办法，准确地在跑道头三点着陆成功。

飞机停稳后，早已等在机场的钢铁厂的同志见到走出机舱门的是女同志，就兴奋地大叫了起来：“女飞行员！快看，是女飞行员！”许多人围了上来，说：“钢铁工人向你们致敬！”

生活就像飞机在高空中飞行，并不全是明媚的艳阳天。1953年夏天，周映芝机组执行了一次部队紧急空运人员和战备物资的任务后，飞行大队政委找到周映芝谈话：

“周映芝，你要被调走了。”

“为什么？”周映芝不解地问。

“你要停飞，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请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问谁都是对她摇摇头。她实在想不通，整天躲在宿舍里哭，也不去吃饭。后来，团长来了，她连珠炮似地问团长：“为什么要调人走？为什么不让我飞了？是不是因为我的家庭成份不好，组织上就对我信任了？有的人亲属都被枪毙了也没让走，为什么一定要让我走？”

团长说：“说不信任吧，让你当机长，还老是让你执行任务。至于成份，我的成份也不好嘛。”团长的话似乎使她明白了什么，又似乎更糊涂了。

直到1993年12月的一天，周映芝再次见到她当年的团长时才得知，当时查出她的母校长沙女子中学有个反动组织叫“三靖团”，组织上怀疑她有这个组织有关系。老团长说：“当时，我们觉得你思想进步，技术好，也舍不得让你走。可是，终于没能说服上级。”

周映芝离开部队后，来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军工厂，她天天去问人事部门：“我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我飞行？”人家总是回答她：“事情会搞清楚的。”不久，全国开始了肃反，组织上先后派了3个人到长沙详细调查了她的情况，证明她的历史是清白的。部队派陈志英找到周映芝，说刘亚楼司令员让你去长春培养第二批女飞行员。倔强的周映芝说：“叫我回去就回老部队，别的地方我哪里也不去！”就这样，在蓝天才飞行不到1000小时的周映芝永远告别了她无限热爱的飞行岗位。

周映芝离开飞行岗位不久，同原来飞行部队的飞行员王育民结婚了。婚后他们过了一段安宁的生活，有自己的小家庭和孩子。但对倔强的周映芝来说，并不满足这些。她一直要求上进，迫切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因为那不明不白的原因，尽管她工作十分出色，却始终未能如愿。她爱人病故以后，她带着刚上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兢兢业业地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后，她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加入了党组织，并当上了北京市工商局的处长。

周映芝离开部队一年以后，周真明和戚木木因身体原因也离开了飞行岗位。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每来一次政治运动，女飞行员中就有因为亲属的政治问题，而像周映芝那样莫名其妙地结束了飞行生涯。剩余的几个经历了许许多多坎坎坷坷之后，逐渐地成熟了。她们尽最大的努力躲避政治风浪，坚守在自己的飞行岗位上。

飞行，无疑是一项随时需要付出生命的危险事业。1967年，陈志英机组在执行一次紧急任务时，在即将降落的一刹那，飞机轰然爆炸，机上无一人生还。已任团副参谋长的陈志英成为新中国女飞行员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英雄。

1987年的“三八”节，有关部门组织纪念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首飞典礼仪式35周年，当年的女飞行员们得以重新相聚。她们忘不了已故的姐妹们，她们为失去姐妹而痛哭，也为自己所经历的艰难和不幸而痛哭。正如周映芝所说：“我们第一批女飞行员最热爱飞行事业，也最能吃苦，可我们的命运却是那么不幸。”

不管怎样，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毕竟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她们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的发展、人民空军的建设尽了自己的责任。她们驾驶着飞机，先后执行紧急空运、空投物资、抢险救灾、人工降雨、航空测量、科学试验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专机的飞行任务，航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为新中国妇女争了光。

为了飞行事业，她们都是到三十岁才成家，她们中除一人外其余都选择了飞行员为自己的终身伴侣。最后一个离开飞行岗位的武秀梅，共飞行了3865小时。宣布她停飞的那一天，她上午还在带领新飞行员进行超低空课目的训练。她真舍不得离开飞行岗位，舍不得放下手中的驾驶杆。接到命令后，她曾多次找上级首长：“我的身体还好，技术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再飞几年没事的。听说，美国有个老太太部81岁了还在飞呢！在英国有个73岁的老太太驾驶飞机飞到了中国。别忙着让我退休，就让我做个试验吧，看看中国的女飞行员到底能飞到多大年纪。”

可是，领导没有同意她的请求。继她们之后，新中国又培养了第二批、第三批……许许多多的女飞行员，她们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的女飞行员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骄子。无论是

训练条件，还是生活环境，比起前辈们要优越得多。她们再也不会经历第一批女飞行员曾经经历过的坎坷和痛苦，她们会比前辈们飞得更高更远。

岁月的长河是那样从容不迫的流淌着。如今，当年的第一批女飞行员们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暮年。除了病故的周明真和殉职的陈志英以外，其他 12 名同志早已退休。她们或者回到了自己的原籍，或者随丈夫迁往他乡。虽然她们现在天各一方，但她们永远不会忘记她们在蓝天上结下的深情，不会忘记她们曾为祖国奉献了最美好的年华。她们曾两次在北京与当年的教官相聚。

第一次是在 1983 年 3 月，林弥一郎等来华访问，邓颖超大姐接见他们后，当年的学生们赶到他们下榻的宾馆，师徒亲切相会。

第二次是在 1986 年 6 月，空军在东北纪念老航校建校 40 周年，特邀当年的日本教官参加庆祝活动。周映芝等姐妹们在空军宾馆同长谷川等老师相会。谈到当年的情景，他们都十分激动，也夹杂着一些忧伤。是的，他们都老了。但他们都会记着当年共同度过的岁月。

第十四章 投诚倒戈天上来

从 1949 年 10 月 16 日至 1956 年 8 月 15 日，先后有 15 架飞机从台湾
飞回祖国大陆

徐廷泽驾驶 F—86 佩刀式战斗机在战术训练中突然降低高度改变方
向，指挥员连呼：方向错了！徐：完全正确

获悉黄植诚飞回祖国大陆，蒋经国气得摔了茶杯，台湾“国防部”部
长引咎辞职

冒雨驾机紧贴海面飞临宁德三都军港，警报声中舰艇开炮射击，李大
维迫降沙滩

驾机回归因地空有雾看不到机场，油料耗尽，林贤顺被迫弃机跳伞

1949 年 10 月 16 日，国民党空军第十八大队上尉飞行员江富考、机工长周震南、机械兵陈尚明、石健儒等共谋起义，自台湾嘉义驾驶 C—47 运输机飞往南京，并安全降落。

1949 年 10 月 17 日，国民党空军官校飞行生魏昌蜀自台湾冈山驾驶 AT—6 型教练机，飞往福州，并安全降落。AT—6 教练机是美国北美飞机公司 40 年代初期研制的高级教练机，世界上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该机。

1949 年 12 月 26 日，国民党空军第一飞行大队中尉军械官岳哲安，从台湾台中驾驶 PT—17 型教练机起义，安全降落于福州。

1950 年 1 月 3 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生李纯，自台湾冈山驾驶 AT—6 教练机起义，迫降于福建漳浦东湖乡海滩。

1950 年 1 月 9 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生黄永华，自台湾台南驾驶 AT—6 教练机起义，迫降于广东潮安。

1951 年 3 月 27 日，国民党空军第十大队专机组机工长史殿文，在台北上空夺取 B—25 型轰炸机飞往祖国大陆，在上海江湾机场安全降落。同机起义的还有该大队专机组少校飞行员戴自瑾。

1951 年 9 月 12 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生刘希尚，从冈山驾驶 AT—6 型教练机起义，安全降落于福建漳州。

1953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少校领航员叶刚，从金门驾驶 AT—6 型教练机起义，迫降于浙江上虞，参加起义者还有第四大队少尉飞行员孙志强。

1953 年 12 月 18 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生陶开府和监察总队第一测向台无线电见习机务士秦保尊，共同驾驶 AT—6 教练机起义，安全迫降于福建漳州。

1954 年 2 月 19 日，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上尉作战参谋黄铁骏，从台湾新竹驾驶 B—25 型轰炸机起义，迫降于浙江三门。同机起义者还有大队射击军械士刘铭三。

1954 年 10 月 26 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生胡弘一，从台湾冈山驾驶 AT—6 教练机起义，迫降于福建同安。

1955 年 1 月 12 日，国民党金、马前线陆空军联络少校作战参谋郝隆年，从台湾台中驾驶 C—46 型运输机起义，安全降落于福州，参加起义者还有二十大队少校作战参谋王钟达、机工长唐镜。

1955 年 2 月 23 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生刘若尤、朱宝荣共谋起

义，驾驶 PT—17 型教练机从台湾虎尾机场起飞，迫降于福建平潭境内。福建军区 3 月 13 日奖给刘若龙、朱宝荣人民币各 1000 元。

1955 年 5 月 18 日，国民党空军第三大队中尉情报参谋何伟钦，从台湾屏東驾驶 F—47 型战斗机起义，迫降于广东海丰境内。

1956 年 8 月 15 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少校教官黄纲存，从台湾冈山驾驶 AT—6 教练机起义，迫降于福建仙游境内。解放军总政治部于 9 月 26 日发给他奖金 8000 元。

5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定了一系列奖励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官兵起义归来。

1955 年 1 月 1 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发布对蒋军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及奖励办法，并命令全军切实执行对投诚或自动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的五条保证，还制发了通行证。

1962 年 7 月 25 日，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颁发通告，宣布对驾机起义的蒋军空军人员和驾驶舰艇起义的海军人员的奖励规定和联络办法。

1964 年 3 月 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发出通告，重申对驾机起义的蒋方空军人员的奖励规定，对驾驶 U—2 和 P—2V 型飞机起义的人员发给黄金 8000 两作为奖励，对其他各类机种也制定了不同的奖励标准，公布广东汕头、福建龙田、浙江路桥三个机场的航向、呼号、波长等。

上述政策和规定公布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60 年代先后有徐廷泽、赵宗礼、黄天明、朱京蓉等驾机、驾艇起义归来。

1963 年 6 月 1 日，国民党空军第二联队第十一大队第四十三中队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驶一架 F—86F 型佩刀式战斗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执行战术训练任务。在飞行中，徐廷泽突然改变高度和航向，直向祖国大陆飞来。新竹机场向空中疾呼，“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徐廷泽不予理睬，心想，我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他驾驶着飞机继续降低高度，飞越海峡，在福建龙田机场降落。

F—86 型佩刀式战斗机是美国最有名的高亚音速战斗机，产量高达 8000 架，装备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空军。50 年代，F—86 曾同我方战机多次交手。徐廷泽飞回来的 F—86F 最大速度为每小时 1110 公里，实用升限为 15200 米，航程 2030 公里。机上有 6 挺 12.7 毫米的机枪，并可携带响尾蛇空对空寻弹。这架 F—86F 至今还停放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供人们参观。

徐廷泽飞返祖国大陆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徐廷泽少校军衔，并按照规定奖给他黄金 2500 两。周恩来和叶剑英先后接见了，鼓励他好好学习，积极工作。徐廷泽后来担任了解放军空军某航校的副参谋长和副校长。

1969 年 5 月 26 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上尉飞行教官黄天明和飞行生朱京蓉，从台湾冈山驾驶 T—33 型喷气教练机起义，迫降于福建惠阳观音阁乡境内。黄天明、朱京蓉起义后台湾有关方面称，他们已在飞行时飞机失事遇难。19 年后，朱京蓉的母亲在北京与儿子相见时，朱京蓉已是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师职研究员了。

自黄天明、朱京蓉起义之后，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中断了 12 年。1981 年 8 月 8 日，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考核官黄植诚，驾驶 F—5F 型战斗教练机起义归来，这一事件使台湾当局大为震惊。

黄植诚祖籍广西横县，1952 年出生在台湾国民党一个飞行员家庭。1969

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

1973年从该校毕业，成为一名飞行员。后彼提升为分队长，先后驾驶过5种型号的飞机，累计飞行时间达2100小时。

自从决心驾机飞返祖国大陆后，黄植诚一直在寻找机会。他知道，即便是在空中，想返回祖国大陆也并非易事。台湾的雷达日夜监视着海峡上空，飞机一旦偏离航线，立即就会被发现。自60年代以来，国民党空军不断进行反劫机、反起义演练，空中防范极严。在一次训练中，曾有两架国民党飞机误入我沿海龙田一带，台湾的战管部队急令同在空中的另4架战斗机飞入我领空进行拦截，监护那两架飞机返航。

8月8日早晨，黄植诚奉命到五联队所属的五大队执行考核新飞行员许秋麟的任务。8时18分，黄植诚在前座，许秋麟在后座，驾驶着F—5F双座战斗训练机升空，考核飞机暗舱仪表课目，这对于黄植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过了10分钟，他们来到预定的空靶区。这里靠近台湾海峡中线，距台湾约有80公里。为了不让许秋麟觉察出自己的意图，黄植诚命令他把暗舱罩盖上，然后切断飞机与地面联系的无线电装置，并把飞机高度从5000米降到100多米，加速飞向祖国大陆。

国民党空军五联队担负的是攻击福州机场的任务，平时经常作模拟训练，黄植诚非常熟悉这一地区的情况。他紧贴着海面飞向福州。不一会儿，他看见了平潭，又过了几分钟，他判断到了尤田附近。但地不想在尤田机场降落，因这里离台湾太近。他记得“空总”一个长官的话：“即使降落到龙田机场，我们也可以用飞弹把飞机炸毁。”为了安全起见，他驾机继续向福州机场飞去。

F—5F很快飞临乌龙江大桥，黄植诚命令许秋麟打开暗舱罩。许发现情况有变，紧张他说：“教官，我们已到了大陆上空，赶快回去！”黄植诚告诉他：“你不要着急！”黄植诚在空中找到了福州机场后，许秋麟仍坚持要回台湾。黄植诚考虑到许秋麟的反对会影响安全降落，同时从尊重个人的意愿出发，决定把许送出境。F—5F来不及发出起义信号，低空穿场而过。

9时12分，黄植诚飞到有国民党军驻守的东引岛以西两公里的海面上，对许秋麟说：“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你跳伞吧！东引的人会发现你的。”许秋麟随即弹射出座舱，跳伞落入海中，被台方的船只救起。

许秋麟安全跳伞后，黄植诚驾驶飞机重新飞回福建上空。在福州机场上空，他按照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通告”中的起义信号做了一遍，然后开始着陆。飞机缓缓地在跑道一端停了下来，黄植诚打开座舱盖，走下飞机。此时是9时26分，他在空中飞了68分钟。

8月12日，福建军民在福州集会，欢迎黄植诚驾机起义归来。为表彰黄植诚的行动，以支票形式发给他奖金65万元，并批准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8月19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任命黄植诚为空军某航校副师职副校长。1986年，黄植诚被授予特级飞行员称号，后来升任空军司令部军校部上校副部长。

黄植诚开回祖国大陆的F—5F型战斗教练机是美国诺斯罗普飞机公司提供零件，并派出技术人员在台湾组装而成的，是台湾最先进的机种，号称“空军的支柱”，每架售价500万美元以上。当时，台湾国民党空军只有29架此型飞机。在福州机场的一个大厅里，不少人都参观了这架F—5F飞机。不久，这架飞机即运往北京，成为中国人民空军掌握美式飞机秘密的难得样品。

黄植诚飞返祖国大陆，同样在台湾产生震动。一向以沉稳著称的蒋经国“总统”闻讯后，气得摔了茶杯。1981年11月25日，台湾“国防部长”高魁元也因此事而引咎辞职。

进入1983年，台湾国民党陆军航空队第一支队观测中队一分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又驾机归来。

李大维从小生长在海峡彼岸的国民党军人世家。父亲早年在戴笠手下做事，后任阳明山警察分所所长，专门负责张学良的监护工作。继父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曾在“总统府”任职，中将军衔。李大维先后在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和航空训练中心受过正规训练，并两次获得“国军英雄”称号，受到蒋经国的接见。就是这样一位仕途顺利的台湾陆航飞行军官，心中却早已萌发了驾机起义的念头。

李大维深知，台湾当局对海峡的监视是相当严密的，而他所驾驶的U—6A却是加拿大早期生产的一种轻型侦察效用机，最大巡航时速仅225公里，凭这种飞机难以逃过国民党军队的雷达警戒线。

为了寻找机会，1982年李大维在金门航空分遣队驻防期满后，主动申请到台湾东海岸的花莲航空分遣队任职。当上级命令他到花莲分遣队任队长时，他异常高兴。在任职的8个多月里，他对驾机回归祖国进行了细心的筹划。

4月21日下午，李大维接受了第二天到宜兰外海执行代号为“ACp”的试通飞行任务。根据气象预报，22日花莲的天气良好，可准放飞。而台湾北部和台湾海峡的天气均不良。李大维于是决定借机飞回祖国大陆。当晚，他邀请队里的其他飞行员喝酒，一直喝到深夜。他谎称第二天没有任务，这些人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4月22日早晨，李大维像往常执行任务一样，不动声色地去机场办了放行手续。然后，利用分队长的身份顺利进入机场。按照他的吩咐，机场加油班的人给机上的各个油箱都加满了油。9时50分，李大维发动引擎，将飞机滑出跑道。

李大维很快飞到了台湾北部宜兰上空，这时天气骤变，云层密布。李大维立即下降高度，改变航向，绕过基隆湾，紧贴海面朝福建方向飞来。为了摆脱地面雷达的监视，逃避后面可能飞来的战斗机，李大维凭借自己11年来2600多小时的飞行经验，坚持作超低空飞行。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李大维的飞机辽在福建沿海上空盘旋。由于雨雾蒙蒙，他无法找到可供着陆的机场，所能看到的都是一些岛屿。李大维十分着急，竭力辨认着地面的情况。当他确认下面就是福建海岸时，便一面发出起义信号，一面寻找迫降的场地。

李大维飞临的地方是位于福建宁德境内的解放军海军三都港。由于天气恶劣，雨中的三都港能见度很差。半小时前，李大维的信号曾在海军某部的雷达上出现过，但很快就消失了。

听到港外突然传来的飞机引擎声，不少水兵正在猜测。一架飞机已冲破低低的云层，直向港内飞来。机身上的蓝色国民党徽和“陆军8018”的字样清晰可见，水兵们这才知道飞来的是一架国民党陆航飞机。

此时，李大维发现了港内的舰艇，他继续降低高度，并打开了航行灯，不断地发出起义信号，在离海面只有十几米的高度上盘旋。港内立即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防空警报声，一艘艘快艇、护卫舰、猎潜舰和辅助舰船纷纷起锚，

驶离码头，大小舰炮摇向天空，以防备国民党飞机的偷袭。

正在这时，一桩意外的险情发生了。停靠在码头上的X160船听到警报声误以为是敌机偷袭，炮手们便急忙向空中射击，岸上指挥所急令停止射击。

炮声一响，李大维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冒险飞行引起了误会，必须尽快降落。情急之下，他看到港内海堤外有一片稍为平坦的泥滩，便猛然把机头向下一压，飞机斜刺着冲向泥滩，着地后溅起一股股泥水。滑行了五十多米后，这架U—6A型海涅式飞机终于停住了。此时已是中午12点35分。

飞机停稳后，穿着带有台湾陆航鹰式标志服装的李大维走出飞机，向跑过来的人群挥手致意。

5月5日，李大维在福州停留13天之后前往北京。在此之前，李大维已被任命为解放军空军某航校副师职副校长，并为其颁奖15万元。1986年李大维升任空军学院指挥系副主任，后又升任为主任。

李大维驾机起义，在台湾军方也引起极大震动。当时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郝柏村甚为恼火，调陆军军官学校学生指挥部指挥马登鹤到陆航队进行彻底清查、整顿。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国共双方开始调整以往的策反政策。1988年9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发言人宣布，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国民党官兵给予奖励的两个《通告》停止执行。4天之后，台湾“行政院”核定所谓“共军官兵起义归来优待规定”修订办法，大幅度降低奖金。

就在我方宣布停止执行《通告》刚满5个月的时候，台湾国民党空军七三七联队五大队中校辅导员林贤顺，出人意料地驾机飞回祖国怀抱，在两岸都引起不小的震动。

1989年2月11日，农历己巳年正月初六。这一天，台湾地区的天气良好。林贤顺按时到达机场，准备执行空中核查任务，科目包括对地面雷达及通信死角的核检。也就是说，要飞入雷达和通信设备观测不到的地方进行检查。这对于想飞往祖国大陆的林贤顺来说，真是一次难得的好机。9时17分，林贤顺驾驶5120号F—5E型战斗机驶离跑道。起飞后，他先按航线往东南海域飞行，然后改飞西南，飞越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后转向西北。9时30分，林贤顺的座机突然高速冲向海面，从地面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看到这一情况，台湾战管中心认为林贤顺的飞机可能失事坠毁，曾紧急呼叫，但无回音。随后，战管中心呼叫附近海峡巡弋的另一批战斗机前往查看。此时，雷达又一度显示出林贤顺飞机的信号，但很快即告消失。战管中心立即呈报林贤顺有叛逃或者迷航的可能。海峡上空的另一机群已来不及追击。

这架F—5E飞越台湾海峡后，林贤顺打算在汕头机场普陆，后因低空有雾及航向偏差而未能找到汕头机场。机上的无线电系统也被他关闭，无法听到地面的呼叫及导航。在油料耗尽的情况下，林贤顺驾机飞至丰顺县境内，被迫弃机逃伞，飞机坠毁，林贤顺左臂也受伤，被送进空军广州医院进行治疗。

5日下午，林贤顺应新闻界的要求，在广州迎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了祖国大陆及港、澳、台记者的提问。以下是有关内容：

问：大陆已经停止颁发有关奖金，你这次飞回大陆的目的和原因是什么？

答：有关奖金，我没有想过。来了之后，有些首长已经告诉我了。目前出于整个国家的大目标，奖金已经不大合适了。我个人对此没有感到任何遗

憾，我并不是为这个而来。

问：你来的过程中，两岸防空系统有没有对你采取措施？

答：我飞的飞机本身是好的，是我把无线电通话线脱掉了，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我的无线电系统完全没有，对于两岸有什么行动，我完全不知道，我是以我个人的判断来操纵飞机的。

问：林先生今后有什么打算？

答：我是学飞行的，回到祖国大陆仍希望在大陆空军服务。

问：林先生，你驾驶 F—5E 型战斗机在飞抵大陆前，要经过台湾军方许多道防空网，这是否显示出台湾的防空系统存在很严重的漏洞和毛病？

答：存在着什么漏洞和毛病我不敢讲，我是抓住春节刚过这个时机，一般来说这时警戒性会降低。而我在行动之前，也没有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因而很从容地完成回到祖国大陆的行动。

问：你在祖国大陆上空飞行时，有没有发现中共战斗机升空拦截？

答：我个人没有发现。因为台湾方面亦派飞机拦截我，我飞过来后，这边也派飞机来迎接我。我在低空飞行，速度很快，所以大家都看不到。

问：从你原来的航线看，你的最终目标是否要飞回老家梅县去？

答：飞机起飞一定要降落，要有机场，所以我要找汕头机场。因为当时航线偏了一点，加上低空雾大，看不见地面，没有找到机场。

问：你能否谈谈对台湾空军的看法？

答：目前，台湾空军在素质上具有相当优势，装备上虽然不是很先进，但素质的优势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林贤顺驾机飞往祖国大陆事件，在台湾引起一连串追查责任的行动。2月14日，台湾空军总司令飞抵台东空军基地巡视，并听取事件报告。据当时台湾军方权威人士透露，空军总部政战部主任唐飞中将已被撤职。

对于林贤顺事件，台湾“立法院”表示，林自愿驾机投奔大陆，既非迷航也不探亲，而是叛逆投诚，显示台湾“天网雷达”的制空防御措施已出现严重漏洞。然而，在中共取消“起义归来奖励办法”后，仍有空军军官冒死前往，而台湾尚死守“中共官兵起义归来黄金奖励办法”，构成极大的讽刺。

按照林贤顺的意愿，中国人民空军于4月5日批准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任命他为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副参谋长，一年多后，林贤顺在祖国驾机重上蓝天，台湾报刊曾对此予以报道。

第十五章 中国第一代舰载机

没有舰载机，算什么海军航空兵

一次着舰就成功的人

仅用 5 分钟的时间就把运载火箭数据舱捞了上来，跟来的外国直升机只捞到一桶含有染色剂的海水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山本五十六袭击珍珠港以后，具有厚厚的装甲和上百门火炮的战列舰失去了人们的宠爱，而以航空母舰和舰载机为主的海军航空兵，渐渐得到战略家的青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标志。

一位权威的军事理论家指出：在现代条件下，没有舰载机航空兵的海军不是一支真正的海军。因为陆基航空兵有限的航程限制了飞机的活动范围，而只能在近海域活动的海军是不能有效地保卫自己国家海疆安全的。

由于种种原因，在解放后的三十多年里，我国海军航空兵在舰载机方面还是空白，在我国辽阔海域的上空，还有不少地方还没有留下海军航空兵飞机的航迹，更不用说更远的海洋天空了。

70 年代末的一天，海军航空兵某团郭文才副团长患严重感冒，正在家里休息，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叫起。

“郭副团长，北京来电，让你立即赶赴上海，飞‘着船’。我们马上来接你。”一个参谋在电话里说。

“快，帮我收拾东西。”郭副团长放下电话，对妻子杨树盔说。

郭文才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刚要出门，突然身子一晃，脑袋碰在门框上。

“他一直在发高烧，不去不行吗？”杨树盔对来接郭副团长的参谋说。

参谋为难他说：“这次任务很艰巨，他不去飞不了。是上级点名让他去的。你放心，路上我们一定照顾好。”

几分钟后，郭文才赶到机场，登上已经发动了的直升机，向东南方向飞去。

作为一名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郭文才懂得此行的意义。飞‘着船’，这标志着海军航空兵的历史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郭文才记得，1974 年，南越在我西沙挑衅的时候，我海军航空兵驻扎在海南岛最前沿的飞行师派出飞机到西沙上空巡逻，由于航程太远，装满油料的飞机飞到西沙后，余下的油量只能在那里飞行 10 分钟，超过时间就有飞不回基地的危险。如果遇上敌机，谁能保证 10 分钟就能打完一场空战呢？

郭文才还记得，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国北部沿海多次发现外国的潜艇。竟有恃无恐地跑到海港附近刺探情报。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先进的反潜飞机。

严酷的现实，让郭文才和他的战友们感到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我们是海军航空兵，不能老是趴在陆地上！”

他们在盼望我们也有能载飞机的军舰和能上军舰的飞机。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飞机一到上海，郭文才立即同王恽等同志一起开始了紧张的忙碌。他们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仔细研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反复推敲，这是海军航空兵历史上的第一次着舰，结果会怎样，谁的心里也没有底。

郭文才的身体很虚弱，每天还要打吊针，工作时还得罩个大口罩。航医劝他注意休息，他满不在乎他说：“没事，这种时候，休息更会急出病来。”

一些不了解他的人感到奇怪：一个团那么多飞行员，为什么偏偏选了一个病号？

飞着船，需要最优秀的飞行员。郭文才就是最优秀的飞行员。

略作准备后，他和他的三名战友开始在国外教员的指导下练习着船。

头一天理科考试，成绩不错。之后接到通知：明天到机场参观飞机。

到了机场，外国教员要他们实际操作，将飞机飞上天。他们已经有半年多没有摸过驾驶杆了，这又是新机种，几位中国飞行员当场怔住了。

这是一场充满危险的考核。在国内，按照规定，停飞三个月以上，必须经过座舱实习后才能操纵飞机。而教员，却不讲究这些。

郭文才走进座舱。

“给你5分钟时间，熟悉一下。”教员说，“5分钟够了吗？”这种口气让人不舒服。

“不用那么长的时间，现在就可以起飞！”郭文才扫了座舱两眼，稳稳把杆，轻轻踩舵，一串准确的动作，使飞机以漂亮的姿态冲向天空。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飞行员们开始在陆地上练习“着船”。他们在机场跑道上划出了与船上飞行平台完全相同的着船标志——一个直径8米的大圈里套着一个直径2米的小圈，中间一个大红十字。

有人说这个方法太土。郭文才回答：“土是土点，管用就行。”

看到飞行员这样练“着船”，有人风趣地称之为“套圈”。

8米的圈看上去很大，但要准确地套在中心位置并不容易……不久，机场跑道头上出现了一个近似舰上飞行平台的陆上平台，它标志着飞行员“着船”水平的提高。

据说，美国海军在实现直升机上舰过程中，共摔掉了近百架飞机。郭文才和王挥还亲眼看见，一名具有8000小时飞行经历的法国飞行员在中国飞着船表演时，把一只飞机轮子撞到甲板边界灯上，轮胎爆了，边界灯也坏了。飞行员顿时冒出一头大汗。事后他对郭文才和王挥说：“你们的甲板太小了，你们自己是不能干的。”

此刻，长江口笼罩在一片紧张、严肃，甚至有些悲壮的气氛中。

直升机微微昂着头，徐徐下滑。飞行平台越来越近，船上的高层障碍物迎面扑来。郭文才集中精力操纵飞机，王挥认真观察甲板指挥员的指挥。直升机以稳定的状态在平台前以1.5米的正确高度和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进入平台。历史性的一刻眼看在即。平台上的人比飞机上的人心情还紧张。

“虽然飞机下滑速度很慢，但我们感到飞机像一片沉重的云铺天盖地落下来。我们还担心那大刀片一样的旋翼会削掉船上什么东西。”一个平台工作人员事后回忆说。

在王挥和王世荣的紧密配合下，郭文才准确地将飞机操纵在平台的小圆圈上空，当飞机的高度降到0.25米时，郭文才果断地将变矩放到底，断开自动驾驶仪，飞机稳稳地停在飞行平台中央！

海军航空兵历史上第一次着船圆满成功了！

甲板上顿时沸腾起来。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郭文才感到眼角有些辣，用手一摸，原来自己满头大汗。这时，他才发现，衬衣已经湿透了。

郭文才和王恽下飞机，望着滚滚东去的扬子江，心中感慨万端……

他们已经获得消息，我国不久将发射远程运载火箭。他们的飞机将随我国的远洋舰队开赴南太平洋，参加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此刻，他们的心正随着奔流不息的江水流进东海，流向大洋……

继郭文才、王恽之后，又有6名同志参加了着船训练。他们是：杨守札、霍效才、吕蕴兴、陈金龙、于志刚、王书宪。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他们是我国第一批舰载机驾驶员。

几个月后，参加我国远程运载火箭试验的海上特混编队，从舟山群岛的海域启航，排成一条雄伟的长蛇阵，浩浩荡荡，向东，向着太平洋，奔驰而去。

海军航空兵的4架舰载直升机静静地栖息舰船上的机库里。

这是中国海军诞生以来第一次携带舰载机的海上编队。

水兵向往大洋，我们的飞行员也向往大洋，作为海军航空兵，早就应该到大洋上空去展翅翱翔。

然而，征服大洋的路并不平坦。飞行员吃尽了太平洋的苦头。

他们晕船了。郭文才晕得最厉害。这个空中骄子没有得到大洋的宠爱。他吐得吃不下饭，头痛欲裂。短短几十天，体重掉了22斤。

太平洋上风高浪大，上万吨的舰船在这里犹如一叶扁舟。舰船的颠簸、摇摆程度大大超过了条令规定的直升机起落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飞机无法升空，而飞机不能升空，就将危机整个试验任务的完成。4架舰载机在这次试验中分别担任航测、遥测、标校和打捞数据舱的任务，其中打捞数据舱最为关键。

这个数据舱记载着火箭运行中的各种数据，在火箭溅落前与箭体分离落海。飞机必须及时赶到现场把它捞上来，如果捞不到，运载火箭的工作情况就失去了科学依据，整个编队的万里之行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意义。

一架外国的直升机从编队上空飞过，隆隆的引擎声引起了正在甲板上观察海浪的技术中心主任白东风和飞行员们的注意，也引起了郭文才的注意。他艰难地走出舱室，仰起阴沉沉的脸。

那架外国直升机在我编队上空盘旋了一阵后，向航行在远处的母舰飞去，郭文才和白东风等人密切注视着它。

飞行员们从望远镜中看到，那条外国军舰也在涌浪中起伏漂摇，直升机飞临甲板上空悬停，像在等待什么，然后刷地落了下去。

郭文才眼睛一亮，立刻陷入沉思。他要从那架直升机着船动作里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

牛顿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发现了万有引力，瓦特从开水顶起暖瓶塞悟出了蒸汽机原理，郭文才此刻意识到，解决难题的途径还是在海浪之间。

于是，他和飞行员们全部爬在栏杆上观察海浪。白东风发现，每三四个海浪之后，必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平稳期，时间短的在30秒左右，长的可达一分多钟。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郭文才和飞行员们反复研究，认为这么长的时间，飞机完全可以起降。

飞行员们欣喜若狂。郭文才也宽慰地笑了。一阵充满生气的引擎声响了起来，郭文才第一个驾机跃上了太平洋的天空。

郭文才紧握驾驶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太平洋，我现在终于能够在你的

的上空欣赏你的秀颜了！

舰桥上，一位鬓发斑白的将军庄严地举起手向飞机敬礼。他曾经担任过海军航空兵的司令，飞向大洋是他多年的心愿。今天他终于在大洋上空看到了海军航空兵的英姿，他的眼里闪出了激动的泪光。

在我特混舰队周围，有几艘外国舰船在活动。郭文才飞向一艘外国军舰。近了，他一推操纵杆，飞机从它头顶上低空掠过。他要向世界宣布：中国海军航空兵只能在近海飞行的历史结束了！

编队到达试验末区，飞行员们在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5月18日，北京时间10点整，运载火箭在祖国西北部腾空而起。一瞬间，远在万里之外的试验末区就收到了发射的信息。行驶在太平洋上的每艘舰船上的测量仪器都转入了“一等准备”，朝着火箭即将飞来的方向严密地观察着，监视着，搜索着。

杨守礼驾驶的174号飞机、陈金龙驾驶的176号飞机、王恽驾驶的179号飞机，郭文才驾驶的172号飞机按照规定的次序先后飞上蓝天。

“雷达发现目标！”就在火箭飞出祖国大陆的一瞬间，经纬仪操纵手又叫起来。这时，火箭已经返回大气层。

“火箭飞来啦！”各个舰船上的人全部大叫起来。这时用肉眼就能看到，一颗明亮的火球，从一团彩云中钻了出来。先是桔红，很快又变成银白色，犹如一颗灿烂的金星，拖着一条白色的纱带，闪电般呼啸着，划破蔚蓝的天空，直奔落区而来。担负航测任务的王恽驾驶着179号飞机寻找火箭飞行的方向。

突然，他发现从火箭内弹射出一个红白相间的降落伞，上面挂着一个发光的金属盒，他立刻叫道：“发现数据舱，方位XX！”

担负打捞数据舱任务的郭文才一听到航测机的呼叫，迅速驾驶着172号飞机朝数据舱的降落点飞去。

突然，郭文才发现前方的浓积云挡住了飞机的去路。浓积云是飞行员的劲敌，那里面蕴藏着风雨雷电，随时可能将飞机击毁。但是，如果绕云飞行，时间怕来不及。

数据舱上有自爆的装置，超过规定时间将会自爆沉入海底。另外，天上还有外国飞机，海上还有外国舰船，动作迟缓，数据舱就有被其他国家捞走的可能，过去就曾发生过苏联的数据舱被美国捞走的事件。

可是，如果飞机穿云而过，那就要担被雷电击中的风险。此时郭文才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一心想的是要尽快把数据舱捞上来。

他果断地一推杆，飞机从1000米高空陡然降到500米，像一只搏击风雨的海燕，矫健地冲进云雨之中。超高频罗盘因受静电干扰，两次失去了数据舱的方向。郭文才镇定自若，把飞机稳定在原来的航线上。当他驾机冲出云层之后，迅速在7公里处的海面上找到了正在漂浮的数据舱。桔红色的染色剂在数据舱周围迅速扩散，从天上看去犹如开放在水之上的一朵绚丽的鲜花。

郭文才熟练地把飞机悬停在离海面30米的高度上。正准备放下潜水员打捞时，突然一个大浪涌来，把数据舱打到50米之外的地方，郭文才沉稳地修正飞机悬停的位置，放下潜水员，正好把潜水员放在数据舱上面，潜水员一把把数据舱抢在怀里。整个打捞过程仅用5分20秒时间。

郭文才驾机胜利返航。这时一架外国直升机飞来，见无利可图，便放下

吊桶，打了一桶含有染色剂的海水走了。

172 号飞机从编队上空飞过，几十艘舰船汽笛长鸣。宏大的声浪直冲九霄。

无线电波飞向北京。新华社播发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国第一代舰载直升机，已能在大洋上腾飞海空……”

一家国外报纸评论说：“中国舰载直升机在太平洋上空的出现，表明中国海军和空军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十六章 飞向 21 世纪的中国空军

当今世界强国的空军装备
海湾战争，空军大显神威
中国的战鹰何日登上自己的航空母舰
瞄准世界先进技术，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

人民空军建立四十多年来，经历了火的考验，血的洗礼，生命的奉献，托举起一代飞腾的天骄。在新的世纪，人民空军将以更加强健的身躯，独特的风采，屹立于世界空军之林。

在当今世界的战场上，空军作为一支独立的军种还只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它已经经历了多次严峻的考验，并向人们证实了自己的价值。现在全世界已有 127 个国家拥有自己的空军，全世界空军人数高达几百万。

美国空军现有兵力 605000 人，飞机 23708 架，其中作战飞机 7236 架，直升机 9839 架；前苏联空军有兵力 825900 人，作战飞机 8191 架，还有大量的直升机、运输机；英国空军现有兵力 93400 人，飞机 1400 架，其中作战飞机 600 架；法国空军现有兵力 95978 人，飞机一千余架，其中作战飞机约 450 架；印度现有空军兵力 113000 人，飞机一千多架，其中作战飞机七百多架；日本航空自卫队也有兵力 51489 人，飞机 857 架，其中作战飞机 345 架。一些冲突频繁地区的国家，其空军实力也相当可观，如伊拉克有空军 40000 人，作战飞机 500 架，武装直升机 100 架；叙利亚有空军 70000 人，飞机 802 架，其中作战飞机 483 架；以色列有空军 28000 人，飞机 941 架，其中作战飞机 629 架。

目前，歼击机的最大航程已达 2000 公里，带副油箱时可达 4000 公里。轰炸机、军用运输机的最大航程为 14000 公里，高空侦察机的航程超过 7000 公里。如果对飞机进行空中加油，航程可以成倍增加，至于飞行高度，歼击机的实用升限为 20000 米，高空侦察机的实用升限达 25000 米，用急跃升的方法最高能飞到 35000 米，甚至更高。现在世界上现役军用飞机多达 100000 架。

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黑鸟”式战略侦察机是世界上飞得最快的军用飞机。它的实用升限为 26600 米，在 24000 米的高空最大平均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 3900 公里。

在作战方式上，使用最频繁、杀伤力最大的恐怕就是空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已经领教了许许多多次规模不同的战略空袭。

现代空袭十分强调突然性。过去空袭多选择节假日前的午夜或当日的拂晓。天长日久，形成了一种刻板的公式，一到节假日，军队都要加强戒备。现在，人们已经不再如此循规蹈矩，只要对方处于麻痹和松懈状态，便开始攻击。军事技术的发展，也为空袭的突然性创造了条件。现代空袭兵器的纵深程度空前增大，战略轰炸机都可以跨越洲界进行空袭。有了空中加油机，即使是战术飞机也能在返上万里而下用着陆。这样一来，攻方根本不需要临战前调整部署，而且武器威力的提高又使其可以使用较少的兵力实施精确轰炸，而守方则对形势难以把握。

现代空袭十分强调速决性。为了在战争初期夺取战略主动权，必须争取在进行第一次打击时就达到预期的目的。现代战略空袭兵器威力大、速度快，

进行一次空袭战役，短到几分钟，长到数日，即可实现作战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攻守双方都必须对第一次打击格外重视。攻方力图对对方的战略军事基地、高级指挥机关、政治经济中心、军事工业和交通运输系统等“关系国家生存”的重要目标实施迅速而毁灭性的打击，在短期内摧毁对方的作战能力和战争潜力，瓦解对方民心和士气，为了己方赢得胜利创造条件。

现代空袭十分强调多样性。空袭所要突击的目标已经决定了手段不可能千篇一律。海空基地、指挥机关、重要城市、工业中心，交通路线不可能用同一种手段摧毁，需要的时间和兵力也不尽一致。也许是大规模集中突击，也许是小规模“外科手术”，或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或鸡鸣狗盗打了就走。参战的兵力也不仅仅是战略轰炸机、战略导弹、潜地导弹，战术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都可以执行战略轰炸任务。空袭可以是一个兵种独立完成，也可以是几个兵种联合实施。使用的兵器也多种多样，轰炸的方法可能是面积轰炸，也可能是制导武器的精确轰炸。

为了执行战略空袭任务，有些国家的空军专门组建了战略空袭部队。比如美国的战略空军是由战略轰炸机部队和战略侦察机、加油机等辅助兵力组成。统帅这支力量的是战略空军司令部，它在行政上隶属美国空军，在作战指挥上则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战略空军下辖第八航空队和第十五航空队2个集团军级规模的部队。第八航空队下辖4个空军师，3个加油机联队，2个中型轰炸机联队和3个战略导弹联队。每个战略轰炸机联队下辖一至两个作战中队，每个中队配备15架B1或B52重型轰炸机。

20世纪空军发展的成就，特别是战略空袭部队的成就，在海湾战争中得到了一次检阅，显示出其强大无比的威力。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科威特沦陷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国部队首先制定了“沙漠盾牌”计划，目标是谋求伊拉克军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为此，美军第八十二航空师在一周内被运送到海湾，数百架各种型号的飞机以及数万名地面部队很快完成了部署。空中和地面部队仍在源源不断地开往海湾。同时，美国分别在地中海、红海、阿曼湾部署了以航空母舰为首的特混舰队，共包括38艘舰只和270架舰载机，严密封锁了伊拉克所有的出海口。

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动了代号为“沙漠盾牌”的大规模空袭。零时50分行动，第一批飞机从沙特阿拉伯空军基地起飞，接着，一批又一批多国部队的飞机扑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突然，突如其来的爆炸声打破了巴格达黎明前的宁静，爆炸掀起浓烟巨浪，每隔15分钟就重复一遍，玫瑰色火光直冲云霄，将天空一次又一次地照亮。高大的建筑物不停地摇晃。巴格达的防空高射炮吼叫着吐出长长的火舌……然而，多国部队的飞机继续在巴格达上空来回穿梭，一颗又一颗巨型炸弹投向这座文明古城。

在海湾战争的第一天中，多国部队对伊拉克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空袭，使巴格达的通讯指挥以及其他重要设施完全陷入瘫痪。

从1月17日起，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多国部队出动飞机近10万架次，平均每天3000架次。不仅摧毁了伊拉克的作战司令部、武器工厂、导弹基地，而且严重破坏了其防空系统、机场和空军基地，切断了铁路网和公路网……

2月26日，伊拉克不得不宣布撤出科威特。2月27日，多国部队收复科威特，伊拉克军队全线崩溃。2月28日，多国部队进入伊拉克。伊拉克宣布

无条件执行联合国决议，交战双方宣布停火。

在这场历时 42 天战争中，多国部队空袭时间持续了 38 天，地面总攻只有 100 小时。伊拉克伤亡十万余人，其中死亡 2 万人，被俘 17.5 万人；损失坦克 3700 辆，火炮 2600 门，装甲车 2400 辆；其他各种设施损失达 2000 亿美元，相当伊拉克 10 年收入的总和。而多国部队的损失是：死亡 149 人，其中美国 79 人；伤 513 人，失踪 56 人，被俘 13 人；损失飞机 45 架，其中战斗损失 36 架。

从双方交战损失的数字来看，多国部队是以极其微小的代价，取得了巨大的战果。这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怎样取得的呢？

这就是：美国出动了当代最先进的战斗机、轰炸机、武装直升机，加上使用最先进的电子技术。参加第一批空袭的 24 架 F—117A 型“隐形”战斗轰炸机，每架飞机可携带 2000 磅激光制导炸弹。这批“隐形”飞机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伊拉克的雷达监视网，首先向伊拉克巴格达市中心的电报电话大楼打下了一颗颗激光制导炸弹，萨达姆的指挥系统陷入瘫痪……

海湾战争标志着一个新的空战时代到来。未来的天空不仅有新一代的战略轰炸机大显身手，而且将有各种各样的先进战术飞机配合作战。

人类是自然之子，又是超越自然的宇宙之灵。据未来学家预测，随着人类的繁衍，人口的“爆炸”，陆地上资源的枯竭，人类必将以新的形式走向大海。

进入 20 世纪以来，占地球总面积不到 30% 的陆地逐渐被瓜分完毕，陆地的资源趋向枯竭，所以，一些发达国家都把注意力转向海洋，并企图利用当前各沿海发展中国家科技落后、生产力低下、海军兵力鞭长莫及之机，通过其高技术优势和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加速掠夺、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以实现其经济腾飞的战略目标。

航空母舰，人们习惯地称其为“浮动的海上机场”。它是一种以舰载飞机为主要武器的大型水面舰只。它的最显眼的标志就是与陆地上机场跑道相似的飞行甲板。在一般军舰上，主甲板最长只有 200 米左右，最宽也不超过 40 米。而航空母舰上的甲板要比一般军舰的甲板大上几十倍。如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总长 332.9 米，飞行甲板宽 76.8 米，相当于 3 个多足球场地的面积。

航空母舰不仅身体庞大，而且对自己的“武器”系统、辅助设备、护卫系统要求也非常讲究。它需要配备各种舰载战斗机、轰炸机、反潜直升机、预警机和巡逻侦察机；需要航母雷达、导弹、各型火炮；需要驱逐舰、护卫舰、潜艇、登陆船、海军陆战队等给养船只和人员的保障等。所以航母特混舰队具有控制海域，控制空域的打击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资本主义强国已经建有相当数量的航空母舰。其中日本有 10 艘在役（另有 5 艘在建造中）；美国有 7 艘在役（另有 8 艘在建造中）；英国有 7 艘在役（另有 5 艘在建造中）；法国有 2 艘在役（另有 6 艘在建造中）；德国有 2 艘在建造中。这些“海上巨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局部战争中，大出风头。

早在 1921 年，意大利著名军事家朱里奥·杜黑就指出：“谁掌握了制空权，谁就能保卫自己的领土和海洋不受敌人的侵犯。”

对于杜黑的理论，开始许多人持怀疑态度：与一发巨炮炮弹重量相差无几的小型飞机能击沉一艘体态庞大的战舰？

事实开始说话了：1940年4月，德国超级战列舰“俾斯麦”号，在英国“大鸥”式飞机的轮番轰炸下，变成一堆沉入海底的废铁。这是飞机击沉的第一艘大型舰只。

1940年11月，英国用海军航空兵袭击了停泊在塔兰托港内的意大利舰队，一个小时之内，使意大利舰队陷入瘫痪，英国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地中海中部的制海权。这次战争表明，飞机可以成为支配海上战争的决定性武器。

1941年11月26日，日本海军中将南云率领一支由6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的特遣舰队，悄悄地向距日本本土上3500海里以外的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驶去。6艘航母共载机423架，其中用于突击的有水平轰炸机104架、俯冲轰炸机135架、鱼雷机40架、战斗机80架。

1941年12月7日6时，南云在距珍珠港以北230海里洋面的旗舰上，下达了起飞的命令。接着第一攻击波的183架飞机呼啸腾空；7时15分，第二攻击波171架飞机又轰鸣着跃上蓝天，向正在沉睡着的珍珠港扑去……

7时55分，日本俯冲轰炸机从天而降，炸弹如雨，整个珍珠港机场刹那间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就在美机场爆炸的同时，日本40架鱼雷轰炸机和49架高空水平轰炸机，从四面八方锚泊在港口的美舰扑去。这次1小时35分钟的袭击，日本仅以损失飞机29架、潜艇6艘及死亡55人的微弱代价，取得了击沉、击伤美各种舰船94艘、击毁美机389架，炸死炸伤美国官兵4575人，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陷于瘫痪。

美国人被日本的航空母舰给打糟了。美军统帅部震惊了，也清醒了。在此之前，他们对航母及其舰载航空兵能长时间远离基地实施独立作战的能力估计不足。从痛苦中清醒过来的美国人，立即在全国掀起了航空母舰制造热：国会立即批准了增加航空母舰的生产计划，建造中的战列舰被改成航空母舰，汽车工厂被改为飞机制造厂……到1945年初，美国服役的航空母舰达52艘，正在建造的还有18艘。

日本用航空母舰教训了美国。几年以后，也就是1945年5月5日，在中途岛海战中，美国又用航空母舰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

二战中，仅美国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就击毁敌机12000架，击沉敌舰168艘，击沉敌商船359艘。至此，航空母舰已成为海军的骨干力量，是名不虚传的活动的海上航空兵基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导弹核武器迅猛发展，常规武器一度被忽视，唯独航母却久盛不衰，从冷战时期到今天，它始终被各国视为局部战争的中坚，常规武器威慑的王牌。

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美国以5—7艘或11—12艘航母为核心，配以200多艘各型舰艇组成强大的海上力量，除封锁港口外，还对朝鲜内地实施空中攻击并护送登陆舰只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其中对战局起关键作用的仁川登陆，就是在航母飞机策应下取得成功的。

1964—1973年的越南战争，美国先后动用二十多艘航母与众多的水面舰艇，对越南内陆腹地、港口、基地海上目标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并进行海上封锁。据统计，在美国对越南空袭和轰炸的飞机中，舰载机占50%以上。

1982年4月的英阿马岛之战，英国依托“无敌”、“赫尔姆斯”号两艘航母，率一百多艘各式舰船远离本土一万多公里，同阿根廷进行背水一战。

经过对马岛半个多月的海上封锁和 23 小时的登陆作战，创造了当代以远制近、以少胜多的罕见战例。

1986 年 5 月，美国对利比亚实施“草原烈火”行动，以“小鹰号”等 3 艘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战斗群，毫无顾忌地在卡扎菲宣布的“死亡线”停留长达 75 小时，击沉利比亚海军导弹艇 5 艘，摧毁众多雷达站等设施。在一个月后的“峡谷行动”中，美海军舰载航空兵又摧毁了预定的 5 个利比亚目标，连卡扎菲本人也差点丧命。

1991 年 1 月爆发的海湾战争，多国部队总共动用了 7 个航母战斗群，飞机三千五百余架。1 月 17 日凌晨，多国部队的飞机从空中对伊拉克实施大批量、大规模、多波次的轮番空袭，陆上战斗尚未开始，伊拉克已经无法招架……

众所周知，南沙群岛距大陆约 2000 公里，而海军航空兵最先进的歼击机最大的飞行半径只有 1100 公里！

也就是说仅凭我们仅有的岸基航空兵，是控制不了我们广阔的海空的，因而，也就无力保卫 200 海里的领海。结果，12 海里仍然是中国海军的现实空间，200 海里还是一个遥远的梦。这个梦的实现，就依赖着航空母舰。

据说大庆油田原油的产量逐年下降。12 亿人口为了活命，正在毫无理智地盲目开发陆地上那有限的资源……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能源将越来越紧缺。据专家预测，几年内，我国就会成为石油进口国，“洋油”的时代有可能再次到来……

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海啊，那里是中华民族子孙的希望……

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美国西点军校宣称：尽管冷战的结束使国防开支大幅度减少，美国仍然要确保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总统指出：“在大力减少国家财政赤字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不能逾越限度。我们必须确保美国常备不懈，随时作好取胜的准备，优于世界上其他所有军队。”

五角大楼新主人切尼和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上将也多次宣称：为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美国保持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至关重要”。

美国现在正在服役 15 艘航空母舰，其中 9 万吨级以上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就有 7 艘，每艘的续航能力都达 100 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 40 圈。更重要的是，其装备之先进，攻击力之强，均为世界之最，是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今天拥有航空母舰已不再是某些发达国家的专利，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拥有航母或正在建造航母。

由于海洋资源的诱惑，亚洲的一些国家开始对航母发生极大的兴趣。

印度是亚洲唯一拥有航母的国家。印度海军于 1986 年 4 月以 6000 万英镑购买的英国海军“竞技神”号航母，经现代化改装之后，已于 1986 年 11 月以“维克兰特”号的崭新面貌开始在印度海军服役。印度海军的另一艘航母“维拉特”号也是英国“竞技神”级航母，于 1987 年 5 月交付印度使用。

目前印度对这 2 艘航母已经感到不十分满足。1989 年印度公开宣布了自己航母发展计划。1989 年初，印度公开与法国海军舰船局签定了价格为 5000 万卢比的航母初期研制合同，同时计划 1989 年在法国协助下完成航母的设计研究，1990 年转入由印度自行完成的工程设计阶段，1991 年在印度的克拉拉邦库钦造船厂开始航母的建造工程，1993 年下水试验，1997 年在印度独立 50 年时正式服役。印度自称此种尚未定型的航母建造周期为 7 年，将于本世

纪未投入使用。到 2015 年，印度海军将拥有 4 艘该型航空母舰。

日本的航母研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日本围绕发展航母的问题曾进行过广泛的舆论准备和宣传，其防卫厅装备局局长早在 1989 年就表明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反潜航空母舰没有法律障碍，并称日本将建造可携带直升机和垂直短距离起降飞机的反潜型航母。日本极力宣传这种航母的使命是防御性的，与攻击型航母截然不同。目前日本已进一步就航母设计问题与美、英、法等国的造船公司及工业界进行了会谈，其目的是希望得到这些公司的技术援助。同时，日本已和航母拥有国进行了微妙的接触，以解决日本一旦拥有航母所面临的敏感问题。

至于自行设计建造航母，日本目前优先考虑的方案是建造一种排水量为 1.5—2.0 万吨，可以搭载 10 架垂直短距离固定翼战斗机以及 10 架反潜直升机的轻型航母。据外电报道，这艘航母有望在 1994 年内开工，大约 8—10 年内建成。

此外，日本正在建造一种全新的大型两栖登陆舰，该舰长 170 米，排水量 8900 吨，上层建筑建在舰的右舷，甲板采用直通式，可供运输和舰载直升机起降，这实际上已经十分接近航空母舰了。

泰国于 1992 年 2 月与德国不莱梅·富坎公司签订了合同，决定由后者承担直升机航母的建造工作，并计划于 1994 年交付泰国海军使用。这项建造计划曾一度中断，后又重新开始。这艘正在建造中的航母，在泰国海军被称之为直升机支援舰，其主要任务：一是利用所搭载的直升机实施反潜和反舰作战；二是支援两栖登陆作战。该舰没有两个直升机起降平台，可搭载 12 架“海王”那般大小的直升机，舰首尾各装一座 8 联装“海麻雀”对空导弹发射架，一座 127 毫米舰炮，并装有 40 毫米近程武器防御系统。

在拥有海军正规军事部队的 33 个亚洲国家里，很多军事决策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航空母舰强大的攻击和防卫能力，都表现出了少有的热情并开始致力于本国航空母舰制造业的发展。

读者也许更加关心我国何时能拥有航母？

要知道，对于这一问题，西方国家比我们还要关心！

正因为如此，不得不给读者留下一点遗憾。

近来，西方舆论界不时传来“中国购买航空母舰”的谣传的同时，还别有用心地制造“中国威胁论”，其目的是想进一步挑拨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阻挠我国海上防御力量的建设，进而达到名正言顺地掠夺我海洋资源的目的。

1993 年 4 月 12 日，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封面文章，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雷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到水边看看那里的建设。港口建设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国已越来越快地进入世界航运队伍。回顾历史，任何国家都在这样做的同时建立一支海军来保卫其交通线。”

这篇目的在于兜售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文章，恰恰从一个侧面提醒了我们：外国人都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海军（当然包括制造航空母舰）！

是的，纵观我国十几年来沿海经济的飞跃发展，一幢幢大楼、一座座现代化工厂拔地而起，使得我国的经济重心、工业重心进一步向沿海伸展。几十个现代化的城市依次排列在约 18000 公里的海岸线上。

而我们海军的势力范围仅有 12 海浬，这就意味着战术导弹几秒钟就可以飞到我们的沿海国土上，并有效打击其战略战术目标。凭借 12 海浬的防卫空

间，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战略防御所必须的空间和预警机制！

是的，作为海洋大国的海军没有航母，就等于种田的农民没有犁头！

如果你在海军航空兵飞行部队中提到航空母舰这个话题，反映更加强烈。

可以说每十分配到海军航空兵部队的飞行员，都盼望着有一天能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着舰……

“也许在我们的飞行生涯中已经不可能看到我们的航母，但每次飞行，我们仍然把那长长宽宽的跑道，当成是一个窄窄、短短的航母甲板……所以我们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的着陆技术非常过硬。”这位年轻副团长的话，向我们描述了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们盼望航母的迫切心情。

1990年6月28日，《人民海军报》刊登了“中国海军的明日之星”的报道。消息说：“一批曾经翱翔在祖国万里海空的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经过百里挑一的严格筛选，受训于广州舰艇学院。他们将成为中国第一代既能驾机上天，又能率舰出海的新型舰长。”

据有关人士透露，这批飞行员就是为培养航空母舰舰长而挑选出来的……

中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在呼唤着航母，中国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在呼唤航母，中国的11亿人民在呼唤航母，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在呼唤航母！

中国的海军需要航母，这是没有争议的。

中国未来的海军肯定会拥有航母，这也是没有疑问的。

但什么时间有，却是说不定的。

中国空军经过40年的发展，飞机数量已经居世界第三位，已经具备执行空中突击、空中支援、空中运输、航空侦察和防空等任务的综合能力，在配合和支援陆上、海上的军事行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天的中国空军，已经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力量。

中国空军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取得的。如前所述，人民空军在创建初期，空军所用的飞机，除部分缴获国民党空军的以外，主要是从苏联购买的。后来，随着中国航空工业的建立和发展，空军装备很快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到了70年代中期，空军的飞机和地空导弹武器装备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目前，中国空军已陆续装备一大批自行设计制造的比较先进的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等各种飞机。中国目前自己设计生产的高空高速歼击机也具有世界先进歼击机的特点。经过改造的强击机，飞行性能有较大改善，作战能力有较大提高。

空军是一个复杂的技术军种，航空武器日益现代化，对纷繁复杂的各项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到80年代中期，各项战斗保障已由手工操作逐步向半自动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空军搞好各项战斗保障的同时，正努力提高战斗员的素质。

针对航空兵是空军作战部队战斗力主体的特点，提出了飞行人员必须具备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宽阔的胸怀、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严格的纪律、顽强的作风、强健的体魄等八项素质要求，实行飞行人员飞行等级评定、招飞制度等重大改革。现在，空军飞行人员全部达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全天候”飞行员数量大幅度增加。80%的飞行员已达到各类等级飞行

员水平。为了加强国际交流，中国空军已经培养懂英文的年轻飞行员。

中国空军十分重视各级飞行指挥员的选拔培养，航空兵部队所有的军长、师长、团长都会飞行，所有的飞行师长都能带队升空作战，飞行团团长基本能胜任三种气象条件以上的作战指挥和教学训练任务。

当前，人民空军正以积极的姿态，不断坚持深化训练改革，坚持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地位上，保证了中央军委的训练方针在部队贯彻落实，标志空军战斗力水平的航空兵甲类团成倍增加，飞行员射击、轰炸技术明显提高；航空兵全部战斗团只要一声令下，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一般气象还是复杂气象，都能升空作战；地面部队的技术训练也达到新的水平，空降兵部队达到了随时能飞能降，降即能打的作战水平；为了提高飞行人员战术水平，各部队积极开展战术训练，并对训练手段和方法做了重大改革。积极发展训练模拟器材。目前，已由机电模拟发展到激光、电子模拟，由技术模拟发展到战术模拟，由供战斗员使用的模拟器发展到战术战役指挥员使用的模拟器。部队歼击机激光射击模拟器和轰炸机对地面目标轰炸的电子模拟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部分机关院校还建立了航空兵战术战役指挥模拟系统。通过作战训练和各种演习实践证明，采用新技术改革训练手段和方法，部队战斗力成长快，既经济效率又高；飞行事故多少，是衡量部队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减少飞行事故，保证安全，各部队坚持以预防为主，维护飞行训练的科学性、严肃性，精心组织指挥，精心维护，严格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十年来，中国空军飞行员安全一直保持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空军瞄准世界先进技术、战术、管理，努力把中国空军过渡成一支强大的军队，牢牢地掌握制空权，保卫祖国的每一寸疆土。

